

目 录

谈谈柳州的地下斗争.....	陈 枫 (1)
回忆我在柳州的地下斗争.....	梁 山 (6)
龙城的黎明	
——一九四九年柳州市解放纪实.....	刘明文 (29)
我所知道的“反共救国军”——广西解放前后的一段回忆.....	叶瑞廷 (45)
天亮前后	
——柳州解放前后日记选片.....	谢汉强 (50)
解放初期柳州金银黑市斗争散记.....	万 流 (59)
解放前柳州土地测量和登记.....	方贵益 (66)
解放初柳州土地测量和登记.....	方贵益 (72)
“四一二”政变时谭均任在柳脱险记.....	谭履平 (76)
1935·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在柳州.....	
.....	陈铁生整理 (80)
柳州机械厂大事记略(解放前部分).....	柳机厂志办 (90)
我所了解的早期柳州机械厂.....	伍廷流 (96)
广西航校的自制飞机.....	朱荣章 (100)
机械厂自制战斗机“朱荣章号”.....	陆光球 (103)
柳州自来水小史.....	顾读云 (109)
柳州纺织业发展小志.....	刘悠音 (112)
在柳始创的黄宝善制药厂.....	刘郁卿 (115)
解放前的柳州药材业.....	刘郁卿 (117)
柳州的漆皮箱.....	刘郁卿、邹德荣 (127)
柳州橡胶工业发展概况.....	韦建章 (130)
新桂系在柳办军校之经过.....	梁志强 (137)

从《新华日报》看沦陷前和光复后的柳州.....	陈佚生整理 (143)
柳州复华旅社.....	
——中统在柳潜伏小组的掩护机构.....	王仁德 (163)
龙虎关实战纪实.....	秦永固、魏清议、马志武 (166)
抗日初期柳州日报的片断回忆.....	刘 雄 (173)
关于柳州邮政贪污案的补充资料.....	陈佚生整理 (180)
柳州青年学生抗议美军暴行	
——“沈崇事件”在柳引起的波澜.....	柯 阳 (182)
柳州“立法委员”竞选见闻.....	杨育晞 (186)
马平及柳州县易名时间及缘由.....	梁志强 (191)
一起官甚于匪的强抢豪夺案.....	梁志强 (194)
韩彩凤生平简述.....	
..... 韩少武、韩少芳口述，刘克武整理 (197)	
覃连芳小传.....	(200)
熊襄龙其人其事.....	罗怡林 (204)
当年柳州名士阙德轩.....	董咸熙 (207)
清末、民国时期柳州书画界简况.....	谢贤修 (210)
争取秦镇等人投诚的情况.....	高天骥遗稿 (222)
《假凤虚凰》引起的一场小风波.....	
..... 张正民 蒋 霖 (225)	
瞻仰烈士陵园回顾剿匪斗争.....	
..... 蒋宝礼 段润田 (228)	

谈谈柳州的地下斗争

一九八六年元月二十七日

在柳州地下党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 枫

我是一九四六年八月间由香港分局派来广西的。到桂林、柳州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及布置迎接广西解放工作。广西党一九四二年至四三年受破坏，与党中央失掉了联系。广西党在钱兴同志领导下做了不少工作。上级决定广西党的工作由香港分局直接领导。香港分局分三条线进入广西开展工作。一是派我和李福海同志到广西来建立中共桂柳区工委，领导桂林、柳州、来宾等二十多个县；二是粤桂边桂东南一线；三是左右江和桂滇黔一线。三条线的党组织进入广西，共同领导广西党的工作。目的、任务就是重建党的组织，迎接广西解放。

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到桂林、柳州任特派员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接收广东南委粤北区委受破坏后从广东到广西的党组织及党员；第二阶段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香港分局决定将魏南金领导的广东党组织和党员及钱兴同志所领导的广西省工委的党员关系交给我，由我、李福海、路璠三人组成中共桂柳区工委，负责桂林、柳州两地区的城市和农村党的领导工作，第三阶段

是一九四九年初，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桂柳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分~~开~~，~~李殷丹同志来广西柳州建立~~农村工作委员会和广西省城市工作委员会。由李殷丹同志任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我担任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但是工作还是互相联系的。组织机构是从四六、四七年的特派员制，到四九年后称为“工委”。

“五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组织发展快，损失少。开始只有几十个党员，到一九四九年底光是四个城市组织发展到四百三十多名党员，党的外围组织八百多名，共计一千二百九十多名。农村几个游击队也都发展很快。党领导的力量共有五、六千人。损失方面有桂林市的陈光同志和另一名党员牺牲了，柳州方面没有损失。党的力量发展快主要是抓了四条：一是严密组织纪律，建立了“秘工条例”，执行了单线联系。我住在柳州先后换了三个地方——东门、铁局街、西大路。我住的地方只有梁山同志一人知道，胡习恒同志也不知道。二是利用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培养、锻炼一批骨干力量。开展革命活动分为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公开的是一线，如爱青会就放在第一线锻炼，第二线作准备，一线的牺牲了，二线就补上去。第三线是广大党员和群众。三是抓思想建设，开办训练班，武装思想。通过训练，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如在柳江县成团乡举办“昆仑山”（代号）训练班和九月鸬鹚江会议。认真学习上级的有关文件，学习领袖著作，学习中共党史，分析广西形势，分析城市、农村斗争形势和学生运动，通过分析得出了党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是基本正确的结论，增强了斗争的信心。鼓舞

了士气，因此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四是总结经验教训。一九四八年我到香港开会，总结城市工作和农村武装斗争的经验及教训。城市工作要与农村武装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城市工作要配合农村武装斗争，城市的同志暴露了就立即向农村转移。“七九事件”和“一、一五事件”发生后，一些党员就没有及时向农村转移而受到损失。柳州鹧鸪江会议后，陈光同志不应该牺牲的，我已跟各市的领导同志打了招呼，要他们在市郊指挥作战，不要到城里去，避免暴露。结果陈光同志到城里去了，住在一爱青会员家里，被叛徒出卖了。还有一个同志也是一样。总的来说党的损失是少的，但有教训，也是深刻的。

第二个特点是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开展民主运动。统战是我党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利用这一法宝把一切民主力量团结过来，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壮大进步力量。在桂林我们做民主人士李任仁、陈劭先先生的团结工作，做国民党桂北军政区司令周祖晃的争取工作。还在张显龙家收听电台。了解国民党的动态。还做柳州龙中校长高天骥、陈如平，南宁的张家瑶，梧州民盟的黄半文，知名人士黄天泽等的团结工作，争取他们支持我党的工作，了解敌人的动向。还团结民主同盟在各地的盟员及广大的进步青年学生，使他们在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发挥骨干作用。桂林的西大、桂中、柳州的柳州中学、柳师、龙中，南宁的师院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个特点是宣传工作搞得好。各地地下党注意抓政治宣传工作，组织了几次大的散发革命传单活动，散布警告特

务书，对敌进行政策攻心，使敌人很恐慌，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这对迎接部队进城，打击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配合我党顺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第四个特点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敌伪机关工作。我们的一些党员、爱青会员，有条件的尽量打入敌军政机关，收集敌人军政情报，和争取敌伪人员为我党工作。如丘行同志利用特殊关系，对军统特务作争取工作。梧州地下党员利用知名人士黄天泽家作掩护，收听新华电讯和印发传单。

第五个特点是加强调查研究，摸清敌党政军各机关的具体情况。为了更好地迎接解放，每个城市都进行一次普遍地调查，通过调查对重要的机关、人员名单，各种物资设备、档案材料，武器弹药等重点保护下来，直到城市解放，顺利地让解放军接管，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四点希望：①老同志，战友们，在座的离休的同志可能多些。离休的干部要发挥余热，我已离休，但很多工作还要做。我在广西工作了十八年，广西是我的家乡。在广东工作十年，在国外工作二十年，加在广西的十八年，总共四十八年。我对广西很有感情，这里有我的老战友，我们共同度过了艰苦的岁月。我在组织上离休了，但思想不能离，还要发挥过去的光荣传统，还要为广西多做工作。

②要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广西地下党在过去做过不少工作，是有贡献的。“文革”中被打成“土匪党”，不少同志受到审查。我因在广西搞过地下工作，原来组织准备派我出任澳大利亚大使的，后因广西地下党的问题弄不清，我不

能出国了。一九六八年广西有一派人到北京要抓我，周总理说：“材料可以拿走，人不能带走……。”是周总理保了我。直到一九七一年我才能出国任大使。“文革”中刘少奇、贺龙、陶铸等国家领导人被搞死了，我们还活着，想一想我们受点冲击又算点什么？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振奋起精神，因此大家要解放思想。广西的工农业基础差，贯彻三中全会晚一步，处遗也晚，更要解放思想，把经济搞活。要发扬广西的优势，广西北海是特区，有对外海口发展的优势。柳州也有优势，这几年柳州的改革搞得不错，经济有很大发展，相信一定会赶上全国先进行列。

③站好最后一班岗，努力向党多做工作。未离休的战友同志，要发挥地下党的光荣传统，保持光荣，保持革命晚节，向党为人民多做工作，起好表率作用。

④要抓好自身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马列主义永远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永远是我们的思想武器，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离开马列主义，离不开“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一刻也不要放松。

（柯 阳、周砚冰记录整理，原载《柳州党史资料》第十一期，本刊转载时略有删节）

回忆我在柳州的地下斗争

梁 山

这篇回忆录，主要是记述一九四七年十月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在柳州担任地下党特派员和柳州市临时工委书记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由于当年我处的地位及环境所制约，对于基层组织及一些同志的具体活动，无法全部知道，这部分历史资料应由这些同志来写。

虽然我力图把过去的斗争历史都写出来，但是限于水平以及记忆衰退等原因，回忆录中难免出现差错的地方，敬希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到国民党统治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桂系军阀变本加厉地在广西各地加强特务统治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时候，这年的十月间，中共桂柳区工委把我从柳江县里雍乡中心小学调到柳州市工作。时值重阳节，我到柳州后投宿兴仁东路丽光酒家。经过联系，陈枫同志（中共桂柳区工委书记，后为中共广西省城工委书记）来接上我的关系，我属他领导，后来他分配我任特派员，最初是负责学校方面的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初到柳州之时，陈枫同志派杨林同志掩护和协助我工作。我们住在太平西街做大米生意，资金是陈枫同志给的。一九四八年春节前，陈枫同志以兴仁东路杂货店（即今曙光东路159号）作掩护，由于他的助手遇见熟人而搬了家，叫我去顶当。是时黄恺同志从里雍中心校放寒假来柳州看我。我俩在春节前夕便搬到杂货店里去，经组织批准我们结婚建立了小家庭，这就更便于掩护我的工作。那时我是党的专职干部，社会职业报作行商，改名周良，邻居们都叫我周老板。

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是比较困难的，来源一是靠党费，二是靠上级拨给，三是有时也做点生意赚点钱。我们也曾经通过柳州地下党另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胡习恒、熊元清同志在国民党柳江县政府任合作指导员的方便，假借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名义，向中国农民银行柳州支行贷款做洋纱生意。由于国民党货币急剧贬值，贷款期满时，只用少许现钞便可还清贷款的本息。我们用这个办法来筹集一些钱，解决了地下党的一些活动经费。我们的生活很清苦，每人每月生活费用大米九十斤，因物价上涨，增到大米一百二十斤。房租是实报实销。这些标准全由自己自觉遵守执行。记得在解放前夕的一段时间里，因人员调动较多，脱产人员增加，桂林还撤退一批同志到柳州隐蔽。活动经费不敷开支，逼得借钱来维持。我通过文惠小学何文同志向任校长的邓凡平同志从学校经费中借了五百元光洋来应急，解放后才由军管会拨款还给学校。

为了对掩护更为有利，我的住地曾多次搬迁，前后曾住过太平西街、兴仁东路、寿木街、西大路、公园路、武巷、

文惠路、窑埠村。

(二)

柳州地下党组织当时是分为两个系统进行活动的，即原来属于原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的党组织（柳州组织负责人为胡习恒、熊元清）和属于中共广东省北江特委一九四六年春在柳州建立和发展的组织（一九四七年十月以后该组织特派员为梁山）。一九四七年七月，省工委和北江特委在桂柳区的组织合并，建立了中共桂柳区工委，隶属香港分局。由于地下斗争的需要，柳州市的两个党组织在桂柳区工委领导下分线进行活动，彼此不发生横的关系。

一九四八年七月间，上级调来了黄绍亮同志，原定为副特派员，协助我工作。他住北大路，约十多天便被宪兵误捕，后转送法院，判为妄图贪他人财物被罚款释放。事情是这样的：当天桂柳区工委委员路璠放个小包在黄住房，当宪兵搜查时，黄以为小包里装有党的文件（其实小包里只有一套衣服和一本杂志），便把小包甩过隔壁房间被宪兵发现查问，黄称是在电影院散场时拾得的。黄绍亮获释后，上级即把他调离柳州。同年九月间，上级又调来了罗杰林同志任副特派员。他在龙城中学当教师，一九四九年五月因暴露从学校撤出到市郊隐蔽。八月间陈枫同志调他到梧州市工作。一九四九年六月起韦竞新同志协助我工作，到柳州解放。

解放前地下党严格遵守秘密工作原则，都是采取单线联系的方法进行活动的，一般是每周接头一次，汇报情况，研究工作或传达上级的指示。为了保密的需要，在柳州高中、柳庆师范、龙城中学的党组织都采取两线或三线配备党员，

分别活动，受市一级领导机关直接指挥。

地下党在积极发展党员这一工作中，发展新党员都必须经特派员一级审查批准才能吸收入党。在培养教育期间，依靠党员汇报，特派员就已经知道培养对象的情况了。入党审查的主要内容是本人的出身经历、家庭情况、对形势的认识、对国民党的看法、对我党的认识、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等。多数写有书面材料（即申请书）。经批准后即办理入党宣誓手续，自介绍人（一人）代表组织监誓。学生和教师成份的候补期为一年，工人和农民半年。由于白区地下斗争的特殊条件，上级党组织批准同意入党介绍人一人即可，在必要时候补党员也可以做介绍人发展党员。

初到柳州时，陈枫同志交给我领导的党员只有十三人，分布在柳州高中、柳庆师范、柳江县立中学、龙城中学、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实验小学、柳西小学、香山慈小、文惠小学。学校党组织关系变动比较多，有调进的也有调出的，特别是中学的学生党员多，毕业后都得离校或到外地去。随着这一情况的变化就得相应调整组织。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党组织也发展壮大，活动的据点也更多了。除上述单位外，还有中正小学、豫章中学、黄花岗小学、柳东小学、克强小学、屏山镇表证小学、屏山小学、窑埠小学、沙塘孤儿院等单位，都有了党的力量。我们还在铁路工人、码头工人、皮革工人、农垦工人及窑埠村农民中发展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柳州解放时，留在市里属地下党柳州市临时工委领导的党员共一百三十九名（其中属胡习

恒、熊元清同志负责联系的约六十多人，属我负责联系的约七十多人）。经我直接见面联系的各单线负责人有——柳州高中学生党员郭其中、韦助猷、康成禧、龙惠兰、龙淑媛、韦以雅等；柳庆师范教师党员韦竞新和学生党员郭桂兰、邱如岳、于月杏、罗震发、龚敬、郭展华；龙城中学教师党员丘行和毛恣观；中正中学教师党员陈乃麟；柳江县中教师党员丁为民；高工学生党员覃贤。小学方面教师党员与我直接联系的有——文惠小学何文、柳西小学李庚成、屏山小学吕立义和许菲、窑埠小学罗丽英、沙塘孤儿院杨若瑜；柳江县教育局邓程章、窑埠村周超铨等。

我党为了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教育和团结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积极贯彻实行党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根据各界各阶层不同的特点，经过桂柳区工委的决定和批准，柳州市先后建立了九个党的外围秘密群众组织——爱国民主青年会（爱青会）、湘桂黔铁路职工解放联合会、广西工农解放联合会、柳州学生联合会、广西妇女解放联合会、广西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亦称联谊会）、广西工商界解放联合会、广西文化教育工作者解放联合会、广西公务人员解放联合会。至解放时共有会员三百六十四人。这些群众团体，除了学联成立了一个三人领导小组外（由柳高的康成禧、柳师的龚敬、龙中的潘瑞才等三个党员组成），其余都没有独立的组织机构，由各单位的党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发展组织工作，在党的领导下采取单线联系的方法进行工作。会员同样可以做发展工作。在这些组织中，爱青会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桂柳区工委决定建立

的，她的任务是团结民主进步青年，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由于组建时间长，分布的面较广，会员较多，组织也很严密，入会的条件也高一些，所以很多爱青会员被发展为党员。其余的爱青会员，解放后党组织决定按团章规定，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省城工委“九月会议”的决定，开始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但时间太短，至解放时只发展了很少数的团员。

在加强党组织和外围群众组织发展工作的同时，柳州地下党也很重视统一战线工作。除了建立民主人士联合会外，还充分利用党员的社会关系做上层人士和知名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站到革命这边来。他们当中的吕昭仁（原国民党高级军官）、陈如平（原国民党县长、华中剿总上校组长）、高天骥（龙中校长）、黎达愚（龙中教师）、翟念劬（国民党立法委员、律师）、朱焕章（伪柳州警备司令部参谋）等人，是我党的朋友，他们当中有的人长期支持和掩护我党工作。我党通过他们又团结争取了一批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因此在国民党的军、政、警机关中，都有我们的耳目，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

我在柳州还担负省城工委书记陈枫同志交给的交通联络任务，有时还出差到桂林、忻城、柳城去完成联络工作。多数的时间是在市里处理一些过往柳州需找陈枫同志商量或汇报工作的同志的联络事务。此外，我与负责农村工作的路璠同志保持联系。还与省农委驻柳联络站直接发生联系。我认识的工作同志有江明、韦君毅、路以初等人。通过联络站处

理城乡之间的一些日常工作。主要工作多是转送党员和进步群众到农村去。有些事不必经过陈斌同志我便可以处理了。

我为了便于与下一级同志联系，也设了一些联络点，指定一些党员为联络员。如雷震东同志（住在黄竹巷，他同时也负责一些组织工作），曾淑莹同志（杨林同志的爱人，住在龙城路），胡雪痕同志（住在兴仁东路）。知道我的住址的同志必要时可以直接找我。其他同志有事找我就到事前约定的联络点去会面或转交信件。黄恺同志也担负市内的一些联络工作。这是地下党在日常活动中，除了定时定点的约会外，又一种上下沟通的联系办法。

地下党还设立了一个油印的印刷点，设在东台路省立医院附近。负责刻印的是黄志明同志，同住作掩护的是易元清，我们称她伯母，她的女儿是地下党员。还有卢九鼎，是伯母的十多岁的儿子。这个点，经常印一些宣传教育材料。几次散发的传单，也是这里印刷的。

（三）

柳州是广西反动集团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的心腹要地，有重兵把守，反动统治特别森严。宪兵、警察、特务、流氓打手作威作福，为所欲为，搞得满城乌烟瘴气。加上五户联保，十屋联防的保甲制度以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搜脂刮膏，使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怒火冲天。

在敌我斗争特别尖锐，情况异常复杂的情况下，柳州地下党在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经受了锻炼和严峻的考验，逐步壮大了党的组织，顺利地开

展工作，完成了地下斗争的各项任务。

一九四八年二月春节期间，桂柳区工委在柳江县成团乡水灵村熊柳生同志家里举办了学习班（又叫做成团会议、昆仑山学习班）。学员来自桂、柳、邕三市和桂东、桂西北农村党组织的负责人。我记得的人有我、胡习恒、熊元清（胡熊因在柳江县政府工作，不便请假，只参加二、三天学习即回柳州）、熊柳生、黄绍亮、吴师光、莫江白、何文、郭其中、韦纯束、韦勋猷、陈乐思等十几位同志（还有一些同志我不认识，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学习班由陈枫同志主持。后期路璠同志也来了，请他讲党史。学习班主要研究形势，讨论城市和农村的工作，学习党史，总结地下斗争经验，研究了建党问题及建立城市主力军（产业工人及城市贫民）和群众工作，同时布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学习班历时半个月，最后写成文件《一月（农历）决议》。我回柳州后即向我领导的组织分别传达贯彻。在《一月决议》的指导下，主要抓发展党组织工作，打开各阶层的关系，扩大活动面，建立新的活动据点。同时着手在码头工人和窑埠村农民中发展党员，在学校中发展爱青会员，为迎接革命高潮积蓄力量。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香港分局撤销桂柳区工委，成立了中共广西省城市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广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柳州地下党隶属省城工委领导。一九四九年一月省城工委在桂林市郊东江村高天梅同志住地，召开城市工作干部会议。陈枫同志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柳州是我、胡习恒、罗杰林，桂林市是陈光、韦纯束、黄昭亮，还有南宁的同志及广西大

学、师范学院的同志。会议总结了一九四八年的工作，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来党的领导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斗争等方面的成绩。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广西反动政权的基础及其本质是以李、白、黄三大豪门为首，地方封建势力为基础的封建军阀官僚地主法西斯政权，长期以桂、柳、邕、梧四大城市为反动的中心堡垒，用武力残酷地统治人民。但敌人的疯狂扑灭不了革命的烈火，摆在国民党反动集团面前的是将即到来的毁灭和死亡。会议决定了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党的中心任务：加强领导，大胆放手建立和发展群众组织，建立城市主力军组织，发动群众斗争。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干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准备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军解放广西。会议历时约一周，最后通过了会议文件《一月总结》。

同年二月春节期间，我在柳城社冲乡长漕村覃贤同志的家里召开我所领导的基层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桂林市工作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同志有：何文、雷震东、吕立义、康成禧、邱如岳、覃贤等。会议根据柳州的情况，布置了今后的工作。因为女同志不方便去柳城开会，我又在窑埠村召开了有许菲、罗英、郭桂兰等女党员会议，向她们传达一月会议精神。与此同时，罗杰林同志也向他所属单位的党员进行传达。

四月间，陈枫同志要柳州选派一名党员代表广西青年参加华南青年代表团，出席五月在北平召开的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经研究决定选派柳庆师范学生党员邱如岳同志为代表。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陈枫同志在市郊

社湾村地下党员明乐同志的家里，召开了桂、柳、邕城市工作会议。柳州市参加会议的有我和胡习恒、熊元清、韦竞新，桂、邕是谁来参加我不记得了。陈枫同志传达了我党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会议总结了自桂林会议后半年来的群众工作与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和成绩，交流了经验，并提出要继续深入发动工人、农民、学生，建立秘密的与公开合法的组织，开展护厂、护路和护校斗争，认真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各项工作。

为了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柳州市的两个党组织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会议决定将柳州市的两个党组织的领导机构进行合并，成立了中共柳州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柳州城工委）。工委成员和分工是：我担任工委书记，胡习恒同志负责组织工作，熊元清负责调查研究工作，韦竞新负责宣传工作。当时陈枫同志还就城工委的组织问题谈了一些原则：在组织上只是领导机关的合并，基层组织不合并，仍按原来的两个系统进行活动。因此我和胡习恒同志互相之间只知道对方的党员人数和分布的单位，党员姓名则保密。要上报的也是分别报给陈枫同志。属于全市性的工作由工委研究决定后分头贯彻。在一般情况下，我和胡之间尽量少来往，因为胡是国民党县府“官员”，我是个“商人”，免致互相影响。

同年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进衡阳，广西离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为了加强对敌斗争，加紧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准备工作，省城工委又召开了“九月会议”。会议地点在市郊鹧鸪江厚生公司的山岸森林中。会议由陈枫同志主持。出

席会议的人桂林是陈光同志，柳州是我和胡、熊、韦四人，南宁是谁认不得，梧州罗杰林因水涨没能赶来。担任会议后勤及保卫工作的是曾少庚同志。会议从二十五日开至三十日，连日阴雨，我们挤在一间临时搭盖的草棚里，任凭风吹雨打，在草棚里还要打伞，对我们这是一次短暂艰苦的锻炼。

会议首先检查总结了七月会议以来的工作，然后分析了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情况。大家认为形势很好，广西解放指日可望。随后接着讨论四大城市解放的几种可能性：一种是在广西外围经过激烈的战争，消灭敌人主力之后，李、白、黄走投无路，只得进行和平谈判，最后和平解放广西，但可能性不大。另一种是用战争方式解放城市，在这种方式下又有两个可能——一是解放军未到之前，国民党军队就逃跑了，这时城市会出现“真空”状态；一是在某些城市出现争夺战。会议决定不论用什么方式解放城市，都不要过早暴露党的组织，防止敌人的破坏。注意组织两线的力量，即第一线搞公开合法的工作，第二线是隐蔽力量。会议强调要放开双手，大胆发展组织，壮大革命队伍，要全面完成调查研究工作，为接管城市准备干部，做好里应外合工作，发动群众做好护厂、护路、护校工作。会议对迎军工作做了研究和布置。

会议结束后，大约十月上旬，陈枫同志飞港向华南分局汇报工作。走之前，他决定柳州城工委由我用“立鱼峰张明”的符号与解放军联络，解放军的符号是“鹧鸪江陈枫”。

十一月中旬，我在兴仁东路46号城工委委员胡习恒同志

住所（城工委重要会议都在此举行）召开了一次市城工委会议，检查研究和具体布置护城迎军工作。我们认为敌人溃逃的可能性较大，但要防备敌人纵火、屠杀、破坏城市后逃跑。我们必须从最坏的可能性来安排党的工作，并确定郊区社湾村为城工委的郊外联络点，以备战时使用。为了指挥全市地下工作者解放后迎军及欢庆解放的统一行动，决定在战局稳定之后在培新路与兴仁路交接路口碉堡上张贴“和平兄，我回来了”的海报，作为行动的信号。这是市城工委在解放前召开的最后一次工委会议。当时的工作很紧张，任务日益繁重。迎军进城的工作，正在炽热地展开。工厂、铁路、浮桥、机关、学校的地下组织成立了秘密的或公开的护城队伍。全市共成立了五十四个宣传队、八个服务站、八个茶水站。宣传资料、标语、壁报等也准备好了。对敌情的各项调查研究材料多已按照计划整理完毕。工作虽然十分紧张，但同志们的心情无限欢乐。

（四）

在形势急剧变化下，国民党反动派和桂系军阀妄图垂死挣扎，更加变本加厉地镇压人民，他们起用土匪队伍，在柳州成立“华中剿总第一纵队”，统一警保指挥，加强特务活动，实行戒严宵禁，企图用各种手段来防止和破坏我党及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但是不畏艰险的柳州地下党善于掌握一切有利的时机，灵活运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的斗争策略，团结和依靠群众，英勇地开展了对敌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经济上已面临崩溃边缘，一贯不收学杂费的公费学校——柳庆师范在开学时竟要学生交学杂费后才给注册。从而激起了全校学生的愤慨。我党掌握这个时机，通过该校的学生党员邱如岳、秦敬、麦超、罗震发、骆启寰等，召开各班学生代表会议，充分发动群众，拒绝缴费注册，进行坚决斗争。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全校学生团结一致，学校当局理屈词穷被迫取消学杂费，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三月间，该校又无理停发教师工资和学生伙食费。我党再次发动柳师学生举行反饥饿罢课三天，派代表向伪柳州专署请愿抗议。在全校师生的坚决斗争下，伪专署和学校当局被迫恢复发给教师工资和学生伙食费。在这场斗争中，有个别党员和部分群众不懂得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在罢课斗争开始时竟提出无限期罢课的口号，在客观上授与敌人镇压学运的口实。我听了汇报后立即纠正和制止，使斗争免遭失败。柳州党的组织通过两次斗争，提高了威信，壮大了组织力量。

四月二十一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南下，形势大好。为了迎接解放，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我们猛烈地开展了宣传攻势。在省城工委的统一布置下，于五月十四日晚上八时，桂、柳、邕三市地下党同时行动，散发和张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黄绍竑致李宗仁的公开信》，柳州还散发了《警告柳州特务书》等传单。地下战士们发挥了高度的勇敢与机智，沉着而迅速地在灯光明亮、游人拥挤的庆云路、正南路、小南路、沙街、鱼峰路、谷埠路、驾鹤路一带，散发和张贴了这些传单。这次斗争显示了党的力量

，鼓舞了群众，震慑了敌人。有些特务受到警告后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随着斗争的胜利，敌人对我们的迫害更加紧了。作为我党重要活动据点的龙城中学，早已成为敌人的眼中钉。敌人多方面对它加以监视。当我们从内线情报得知和龙中党的负责人察觉特务即将捕人的态势后，陈枫同志召集我和胡习恒同志于五月十八日碰头研究应变措施。我们决定将龙中较为暴露的党员教师罗杰林、方宏誉、丘行、毛恣观、唐美真，在十九日晚上晚修后秘密撤出学校。罗杰林和唐美真同志是由我安排撤退的，我得到该校教师黎达愚（民主人士）协助，先安置罗、唐在窑埠村黎家暂住两三天（因为当时还考虑让罗、唐留柳隐蔽继续活动）。不料，罗、唐二人被该村伪甲长监视，于是我和雷震东同志在河西渡口租得一间房子，迅速将罗、唐二同志转移那里。

龙中的五位教师撤退之后，为了打击敌特的凶恶气焰，激化特务派系之间的矛盾，揭露反动派迫害进步教师的阴谋，省城工委指示柳州地下党发动学生开展寻找“失踪”教师的运动，公开提出“还我老师”的口号。通过斗争掩护同志安全撤退并教育群众、锻炼群众和组织群众，也发展壮大党的力量。这个“寻师运动”主要由胡习恒同志领导的龙中党组织进行。他通过该校学生自治会理事中的周民震、明乐、潘瑞才、刁蕴冰、周民霖、刘明文等学生党员联合各班学习代表，成立了寻师委员会，公开领导运动。他们带领同学分头到伪专署、县政府、参议会、警察局去质问，要求归还老师。五月二十五日“寻委会”巧妙地在伪广西日报（柳

州版)刊登了寻师启事,扩大了影响。地下党还发动柳州各中学声援龙中的斗争,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斗争坚持了十多天,“失踪”的五位党员均已安全转移后,陈枫同志认为“寻师运动”已经达到保存自己和打击敌人的目的,决定不再与敌人纠缠,指示龙中党组织胜利结束这场斗争。

罗杰林转移到渡口村之后,仍继续与原来领导的关系接触,进行工作。一天,罗过河去黄村和约定的同志联系,途中巧遇龙中一进步学生。那学生见罗时很惊喜,以为罗不知道龙中情况,对罗说了寻师运动情况。还问罗从哪里来?我向陈枫汇报了这一情况,认为罗不能继续留在柳州工作。不久,陈枫决定把罗、唐调梧州工作。八月间,由我派雷震东护送罗、唐乘轮船离开柳州前往梧州。

龙中寻师运动之后,被打痛了的反动派凶相毕露,兽性大发作,伪广西省政府于七月底撤掉高天骥的校长职务。继而在九月十四日以“历年底纵匪党”的罪名,强行解散了龙中。我党为了防止敌人进一步对学校党员和群众组织成员的迫害,立即决定将他们疏散转移,除了留下一部分未暴露和有条件留在柳州坚持斗争的同志外,其余的或到柳北、都宜忻、桂中等游击区打游击,或回原籍参加斗争。由于措施得力,不仅有效地保存了党的力量,而且为党在农村的武装斗争输送了大批生力军。

龙中校长高天骥是柳州的上层人物,是一位进步人士。从抗日时期开始他便与我党及进步力量有来往,他办学比较开明,积极支持学生的抗日活动和反对国民党的爱国民主运

动，龙中的班导师及重要的教学岗位，多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所以龙中是一所进步的私立学校。龙中开展寻师运动时，高天骥表示同情和支持，并对国民党反动派表示不满，因此遭到反动派的忌恨，所以先撤了他的职而后解散龙中，并阴谋加以陷害，置他于死地。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我们研究决定，由胡习恒同志派两个党员于九月十八日掩护高天骥撤到市郊隐蔽。后来高天骥同志在鹧鸪江隐蔽时毅然地参加了党。柳州一解放，党就安排他在市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当主任委员。

如前所述，七月下旬我们正在社湾村开城工会议的时候，负责联络工作的曾少庆同志报告了一个紧急情况：伪柳州专署、警备司令部、柳江县府、警察局、柳江县党部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决定在八月一日在体育场召开万人反共大会，会后举行反共大游行。这是反动派的垂死挣扎，也是他们一个极为反动的措施。当时我们即决定赶在他们开会之前，再散发一次传单。传单由韦竞新同志执笔拟稿，我们共同讨论通过。内容是号召全市人民拒绝参加反共大会，拒绝使用国民党反动政府七月二日决定发行的银元券，以揭露反动派溃灭前在政治上欺骗人民和在经济上搜刮民财的阴谋。

七月二十八日晚上八时正，全城的地下工作者又在大街小巷散发了传单，给敌人当头一棒。八月一日，反动派仍然硬着头皮在体育场召开反共大会。但是，敌人的阴谋破产了，被迫去参加大会的只凑得几百人。反动分子见状恼羞成怒，拉出一个蓬头垢面的“囚犯”，声称此人是“散发传单的共匪”，当场枪杀示众以吓唬群众（其实，此人并不是

地下党或我外围组织成员)。游行开始，只有反动分子、伪军警及各单位扛牌子的人，稀稀拉拉大约两三百人的队伍，垂头丧气地从大街溜过，活象一群俘虏。街边的行人议论说：

“城隍庙里鬼唱戏，鬼看。”

十月底，城工委又领导全市地下工作者散发了《告职工书》、《告各机关负责人书》等传单，号召全城职工和敌伪机关负责人要认清形势，组织起来保护工厂、学校、铁路、浮桥、邮电交通设施、物资仓库、防止敌人掠夺和破坏。各机关负责人要看清前途，向人民靠拢，保护好机关财产和档案，准备清册，等待解放时接管，争取立功赎罪。这次传单没有张贴，而是采取散发和投邮的方法。给各机关负责人的传单是用盖有国民党县党部长条的信封邮寄的。

在地下斗争中，胡习恒同志领导的党组织曾于一九四九年春季和八月间，先后四次发动柳州铁路机务段、水电厂工人和路局职员包围路局大楼，开展反饥饿的索薪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十月间，城工委决定派丘行同志利用亲戚关系对军统特务冯晋章和范裕齐做策反工作。先是胡习恒同志与丘联系，后经我改派杨若瑜（女）同志去联系。策反取得进展，冯、范发生动摇，先后几次交出几十名特务名单（多数故特姓名已为我党掌握）。后来要范搞一些国民身份证，大约交来了五、六份，是从柳西镇公所要来的，但证件重打上了号码，我们怀疑内中有问题，从来不使用它。最后要他搞了十多支枪存在冯家，解放后才缴出来。范裕齐解放后仍继续搞特务活动，被我们镇压了。

在地下时期，与敌人周旋中，有时也遇到一些麻烦的事。记得在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我还住在北大路武巷的时候，反动派为搜集反共兵源，大肆征兵，搞民团集训。当年我正二十七岁，是适龄壮丁。我的房东姓张，是个菜农，在街上当甲长。他通知我已被抽了了。他见我是早出晚归跑生意的忙人，加上我们平日与他家相处很好，便对我说：

“不去集训的话，可以交五十斤大米给上面雇人顶替就可以了。”于是我当即按市价折款交了钱给他，这才避免了集训。旧社会国民党里贪官污吏不少，有些事花上一点买路钱，他就让你过去了。我当时是处于无法中的唯一办法，花钱免训，对地下斗争还是有利的。

(五)

临解放前的几天，人们互相传告解放军即将到来的消息，人民喜气洋洋，而反动派则是风声鹤唳，兵慌马乱，开始狼狈逃窜。柳州城处在暴风雨的旋涡中。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我离开住地窑埠村进城布置工作，忙了一天，晚上我不回村里去了，就住在东台路河边巷我们的印刷点里。晚间和黄志明、易伯母一起紧张地赶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城市工商业政策》等宣传资料，准备解放后作宣传用。我们紧张地干了一个通宵。天亮了，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机枪声和清脆的步枪声，还断断续续地响起榴弹炮声。我们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高喊：“解放军进城了！我们解放了！”这个伟大的时刻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许，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天津部队——三十九军——五师三四四团粉碎了敌人在火车北站等地的抵抗后解放了柳州，宣布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

解放军先头部队马不停蹄地继续追击向南逃窜的残敌。接管和守备柳州市的任务由三十九军一五二师四五六团担任。

解放后，据同志们的汇报，敌人溃逃的二十四日晚上和我军开始攻城的二十五日清晨，我党领导的护城组织和人民群众与妄图毁城逃跑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电厂的护厂队和爱国职工用武力与金钱相结合，收买了贪财怕死的敌人工兵，搞了假爆炸以蒙主子，从而保存了电厂。受党的影响，江汉广播电台和斜阳路邮电局的职工，也是用光洋收买了敌人，搞了假爆炸，保全了电台和电讯设备。在鸡喇小学校长、广西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会员曾鼎的策动下，鸡喇的三十兵工厂的进步职工打开军械库用枪支武装起来，赶跑了来炸厂的敌军。柳州铁路机务段、水电厂、材料厂、路局机关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职工，夺取敌人的枪械实行武装护路，有效地保护了铁路重要设施，并迫使一个排的敌人缴械投降，缴获了几个车皮的弹药。贯通南北两岸的柳江浮桥，也是我党保护的重点。由于党员雷震东同志认真发动桥工做好护桥工作，使解放军能顺利地通过浮桥追歼逃窜之敌，而南北交通也不致中断。

二十五日当天，城工委的同志分别在各自岗位观察战况和指挥下属做迎军的准备工作。当城里的枪声刚停，一些学校的青年学生情不自禁地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二十六日，

我们聚集在兴仁中路四十六号胡习恒同志住处开会研究布置解放后的工作。立即决定出“和平兄，我回来了”的接军行动信号。信号发出不久，早已组织和待命行动的宣传队、服务站、茶水站遍布南北市区，迎军的标语和欢庆解放的壁报到处张贴。在宣传队的鼓动下，居民们纷纷上街加入欢庆解放军的行列。各商店陆续开门营业。人们的脸上都浮现着兴奋的微笑，自在地观赏解放后的新天地。

二十七日，城工委仍紧张地继续开会。但是还无法与解放军领导机关取得联系，我们正为这件事着急。会议在进行中，曾少庆带着两个解放军战士跑上楼来，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们地下党城工委的同志。”并一一作了介绍，解放军同志也作了自我介绍，大家高兴地握手就座。接着，曾少庆同志解释说：“我带着枪回来，遇着这两位同志盘查，我说明是地下党员。他们为了弄清情况，便一同来找你们。”我对解放军同志说：“我们城工委正在开会，曾同志是从乡下带党的文件回来的。他带的枪是个多月前由曾同志领导的地下工作者在郊外伏击国民党军官时缴获的。我们用来保卫领导机关。”解放军听后说：“都是自己的同志，你们的斗争太艰苦了。”我要求会见解放军的领导同志，以便联系今后的工作。于是他俩便领我到中山东路伪交通银行三楼的会客室里，由政治部的沈铁兵同志接见我。我说明了自己的身分，并将随身带去的地下党文件给他审阅。他一面看一面笑着说：“梁同志你们辛苦了！”这次虽未能按原定符号接上党的正式关系，但总算是与解放军领导机关联系上了。接着，我介绍了柳州地下党的情况和一些敌情，并提出考虑到

支前任务及维持地方秩序，恢复生产及市场供应，安定人民群众的情绪，我们必须及时有组织的开展各项工作。根据城工委的意见，建议成立柳州市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以担负上述各项任务的完成。沈铁兵同志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决定派一位赵团长（可能是四五六团）直接与我们联系并协助开展工作。随后工委全体人员集中到罗池路的一幢洋房办公。赵团长为我们架设了直通电话，有工作便可以及时联系了。

二十九日柳州市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城工委决定派高天骥同志任主任委员，沈章平为党代表兼副主任委员，商会会长刘郁卿为副主任委员。治委会直接受城工委和解放军的领导。部队亦派干部和战士来指导和协助开展工作。治委会成立后，很快恢复了生产。当时过境部队多，支前任务特别繁重。市场上的粮食、木柴不够供应我们就派人和私商到乡下采购了大批粮食，保证了部队的供给。治委会协助解放军收容和遣送了大批国民党的俘虏兵以及散兵游勇。总之，在解放军的支持下，经过治委会的努力，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恢复了生产，维持了地方治安，稳定了社会秩序。解放后的第三天（二十八日），九个中等学校迅速复课。十二月一日，全市小学一律复课。党接管城市的各项政策得到认真的贯彻，治委会起到了应起的作用。

十二月九日，先期在武汉成立的柳州地专党政机关到达柳州。一天，我和胡习恒同志应约到他们的驻地——中山东路美丽川菜馆，会见了军管会主任刘随春同志，柳州地委书记兼市委书记李一平同志、专员兼市长魏伯同志、组织部长

孟广平同志。我们以“立鱼峰张明”的联络符号，正式与柳州地区、市委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同时汇报了工作，他们也谈了有关成立军管会的事宜，决定在十二月十二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柳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如期成立，该机关设在交通银行原址。十二月十九日，柳州市人民政府（地辖市）正式挂牌办公。作为过渡时期的政权机构——治安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宣告结束，大部分工作人员分配到军管会和市政府工作。在市政府的一次会议上，专员兼市长魏伯同志对治委会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治委会作为临时政权机构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市人民政府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十二月十五日，地、市委在伪柳江县政府礼堂举行地下党与南下柳州工作党员胜利会师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开幕。第四野战军宣传部长王兰西在讲说中说明了这次胜利会师的伟大意义，然后报告了国内与国际的大好形势，最后要求全体党员要达到思想上的会师。军管会刘随春主任、栗在山副主任号召大家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政策，严格组织生活，团结群众。克服一切困难，在市党委会统一领导下共同为建设新柳州而奋斗。我代表地下党城工委向大会报告地下党的壮大及长期地下斗争的经过，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对今后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希望。十七日，全市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成员三百多人在柳庆师范礼堂，举行胜利会师大会。我代表城工委讲话，首先报告外围组织的斗争历史，号召全体同志在新形势下，建立新的工作作风，保证柳州市的接管工作顺利完成。继由地、市委负责人李一平、

彭涛两同志讲话，号召大家共同努力，做好接管工作，建设人民的新城市。工会代表沈超、工人代表陈聚魁、学生代表谢伟良、妇女代表于月杏、公教人员代表魏斗英都在会上讲了话。

会师以后，地下党城工委和各外围群众组织正式撤销，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分别参加了地、市党政机关和各单位的工作。我被分配到中共柳州市委担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市委书记由地委书记李一平兼，彭涛为第一副书记），原工委委员胡习恒任市政府秘书长，熊元清同志调地委工作（后又调市委任副秘书长），韦竞新同志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柳州市工委副书记。城工委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市委党史办供稿

龙城的黎明

一九四九年柳州市解放纪实

刘明文

一

1949年9月的最后一天，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湖南省衡阳、宝庆地区的桂系主力第七军和四十八军展开攻击之际，中共广西地下党城工委在柳州市郊鹧鸪江雁头岭秘密举行的省城工会议已临近结束。天气阴沉多雨，山风呼啸。地下党员曾少庆、梁华才手持武器，冒着风雨在会场周围巡逻警卫。密林中一座人字形的草屋里，矮小精干的省城工委书记陈枫压低嗓音在作总结：“从最近湖南的战况来看，广西的解放，不会超过今年冬季。为了配合大军解放广西，我们城市工作的紧迫任务是健全领导，大胆进行组织群众与发展党的组织，加强统战工作，积极布置迎接我军入城的一切准备工作……”陈枫还就组织、宣传、统战、策反、调查研究、护城、接管、紧急状态应变等工作，作了周密的部署。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召开的地下状态的最后一次省城工会议的与会者——桂、柳、邕三市地下党负责人（因江水暴涨停航，梧州地下党负责人未能出席），在狭小的草屋里不禁欢欣雀跃起来。陈枫发出警告：“注意安全！到胜利的那一天再笑吧，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老虎的嘴巴边战斗。敌人是不

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作垂死挣扎，我们必须坚持隐蔽斗争、保存力量的方针，开辟工厂、城郊的据点，作好进攻和退却的两个准备。

二

10月10日，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国庆节”。衡宝战役刚结束，不到十天的战斗，桂系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的四个整师共四万余人被我军歼灭，第七军副军长凌云上高级将领被俘。我军重兵压境，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乱了手脚，急令张淦、鲁道源、徐启明、黄杰等兵团司令带领残部十多万人龟缩广西老巢，妄想依靠美帝的援助，负隅顽抗。10月16日，白崇禧在桂林召开了军政紧急会议，给在广西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输血”打气，布置实施他的反共总体战：下令在全省搜罗炮灰，收编土匪，实行“一甲一兵一枪”办法；将广西划为六个军政区，共辖十五个行政专员区；规定各军政区司令官负责指挥正规军在本辖区作战，正规军撤出本区之后，一方面监督各县实行坚壁清野，一方面展开“游击战争”，等待美援的到来。会议期间，白崇禧分批召集与会人员到他的公馆密谈，要他们填表参加党务整理，刺血宣誓效忠党国，和共产党斗争到底。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头目为了开辟财源，筹措反共经费，竟下令全省种植鸦片，开办赌馆，大征烟税赌饷，全广西一片乌烟瘴气。

人口仅十余万人，城区面积才四平方公里的柳州市区，成了国民党残兵败将的避难所。上自总统府警卫队、陆军总司

令部，联勤总部，下至柳州警备司令部，宪兵团等师团级以上的指挥机构一百多个，塞满市区，许多学校被挤占，连柳侯公园也成了兵营。国民党第三兵团副司令兼桂中区军政区司令官王景宋和柳州警察局局长王景宜，成了柳州的土皇帝。由柳州地区大土匪头林秀山、刘栋平所属部组成的桂林绥靖公署第二、第三支队驻扎柳州城乡。这些鼠头獐目的“国军”们，一方面在城市加强法西斯统治，实行“五户联保”和“行政机关员工联保”，“凡同组具结人员须互相监察，如发现有通匪济匪类及其他反动行为等情事，各负检举之责。倘有共同隐瞒秘不揭报者即予依法严办。”（引自1949年9月《广西省各级行政机关员工联保办法》）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发出10771号《切实加强反共宣传》的命令，“共匪吃人肉，喝人血”，“共产共妻”等无耻谎言，通过柳州的特务报纸，党棍流氓的嘴里喷撒出来，企图煽动人民跟随他们“反共到底”或流亡逃跑。一方面派出武装向我党领导的桂中、柳北、都宜忻游击区进行“清乡”、“围剿”。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十字街头，柳江浮桥两端，悬挂过不少血淋淋的“土共”人头示众。每到晚上十一时，全城戒严，凄厉的警笛声划破龙城上空。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焦急地盼望古城黎明的到来。

三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住在铁局街以行商张老板身分为掩护的地下党省城工委书记陈枫，10月14日从香港向华南分局汇报请示工作回柳。他向柳州市地下党城工委传达了加紧

迎军护城工作的指示，并留下“立鱼峰张明”为城工委与南下大军党组织会师的联络符号后，又匆匆地在20日乘飞机赴港转穗，参加华南分局主持的配合大军入桂接管的准备工作。

距离国民党柳江县政府和柳州警察局不到百多米的古香中路（今曙光中路）东成秤厂，是地下党城工委的秘密机关。从1941年起就在柳州搞地下工作的城工委委员胡习恒、熊元清住在这里。他们受党派遣，打入国民党柳江县政府，当了八、九年的县府“官员”。每周定期来秤厂楼上作“客”的是古香东路杂货店（今曙光东路159号）“周老板”——城工委书记梁山和负责宣传工作的失业教师韦竞新。就是这四个青年人，分线领导了近两百名地下党员和三百六十四名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成员。党的指示、决定、命令从秤厂的小阁楼发出。散布城乡的四十多个党的战斗据点的地下工作者，积极贯彻执行省城工会议关于护城迎军的决议。

地下尖兵们不畏艰险，要从虎口里拔牙，纷纷打入国民党的军政机关、事业团体、工厂企业的要害部门，调查敌情，猎取情报，为解放后接管准备资料。在铁路局当秘书的地下党员江滔和宁宗萼等，利用职务之便，将铁路人事和技术方面的机密档案弄到手。打入警察局的地下工作者胡恩朗，编制了《柳州市区机关团体调查表》。在柳州航空站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梁仕臣、罗鸿坤、罗洪亮、蒋玉昆、蒋海清等，更是“胆大包天”，连飞机的型号、起飞架次、人事等绝密资料和机场的平面图，都当成“废纸”混过哨卡送到东成秤厂。

按照城工委的决定，铁路、电厂、水厂、兵工厂、江汉

广播电台、电报局、柳江浮桥等部门，是城市的重点保护对象，派了许多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到这些单位发展组织，发动群众成立护路、护厂组织，坚决与敌人的破坏活动作斗争。为了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城工委指定了一批有管理才能和技术专长的优秀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为工矿、交通、文教、财经、治安等部门的接管干部。为了迎接解放军和庆祝解放，城工委将全市的地下工作者按活动地区组成服务工作组六组，学联宣传队二十四个，妇女宣传队十四个，文教工作者宣传队五个，工农解联宣传队三个，茶水站数十个。迎军欢庆解放的标语、壁报、红旗等宣传品，亦分头秘密制作。《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在地下工作者和进步群众中秘密练唱。为了防备战争中可能出现的拉锯战和真空状态，地下党在郊区鹧鸪江、柳城县的山田、西鹅乡的都湖等村庄，建立了有武装保卫的战斗据点，还在平川乡的杜湾村建立了城工委的备用指挥所，用来掩护、隐蔽、保存革命力量和指挥战斗。我党的统战、策反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铁路局的一些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交警头目被争取过来。我党在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柳州警备司令部安下了“钉子”，发展了民主人士联谊会的组织。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丘行，奉党的指示，利用亲戚关系，打入军统组织，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争取了军统小头目冯××和军统广西组人事科长范裕齐反正，先后交出八十多个特务名单和长短枪十五支。正面战场鏖战急，地下斗争的烈火也在愈烧愈烈。十月中旬，城工委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政治攻势，数千张《约法八章》、《粤桂边纵队司令员

梁广致各机关主管先生书》等传单，象千百颗无声炸弹，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粉碎了反动派诬蔑我党我军的无耻谎言，扑灭了敌人裹胁群众逃亡“避难”的妖风。

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在湘西南战役后，经过深入的解放广西的战斗动员，士气十分昂扬。“打到广西去，消灭白崇禧”已成为部队中一个普遍的有力的口号。11月6日，我军从湖南武冈出发，即楔入湘黔边境的五岭山区，执行解放广西的战役迂迴任务。部队连日来顶着连绵的秋雨，没膝的泥泞，攀越了陡峻的枫门岭、武胜关，穿插在五岭山脉的群峦中。11月11日，我先头部队一一六师一举解放通道，我军即分两路直捣广西。西路一一六师进入黔境，解放从江后插入广西，取道罗城、三岔、拆城，切断黔桂交通线，扫清柳州外围，并向宾阳、南宁进击。东路一一五师及一一七师并肩分头沿融江和柳长（柳州至长安）公路向柳挺进。18日，一一五师进占八江夺取古宜。一一七师和一一五二师随一一五师前进。22日，守敌望风而逃，我军跟踪追击，解放了融水。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粉碎了白崇禧集团死守广西等待美援的幻想。身陷重围的白崇禧于20日从桂林仓惶逃到柳州后，决定放弃柳州，急令所属部队向中越边境和北部湾海岸逃跑，企图在越南和海南岛落脚栖身。23日，一一五师和一一五二师前卫团围攻太平圩时，与我党领导的游击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二大队胜利会师。二大队配合大军作

战，消灭了国民党桂中军政区的第十五专署和保安团。当天，国民党柳州警备司令部犹垂死挣扎，实行全城戒严，搜捕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由于在该部的我地下工作者朱焕章和曾美川，事前将情报报告我党，我党人员及时隐蔽、转移，敌人阴谋没有得逞。

24日，我军一一五师解放了柳城县沙埔，打开了屏障柳州大门的消息，似一声巨雷震破了敌胆。这天，秋雨朦朦，寒气袭人。城里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喊马嘶，呼爹唤娘，乱成一团。敌军政机关和部属涌向市区南岸夺路而逃。小南路车渡码头挤满了等待渡河的军车，柳江浮桥几乎被成千上万的逃亡者踩沉。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急忙将下榻处从中国银行（今中山东路财政局）移到靠近飞机场的新兵训练处。晚上八时，他接到三门江和沙塘“发现共军”的情报后，急忙带领李品仙、夏威、黄旭初、海竞强等军政头目，仓惶乘上飞机逃往南宁。树倒猢猻散。桂中军政区中将司令官王景宋与柳州警察局长王景宜这对难兄难弟相率逃命。接着，敌柳州警备司令秦镇在晚上十时，召集参谋长郭秉洪和副官主任朱焕章商量对策。秦镇想毁城逃跑到农村“打游击”，但是已成为地下党外围组织民主人士联合会成员的朱焕章和与国民党起义将领王汉昭（解放军派入广西搞策反的同志）有联系的郭秉洪，共同对秦晓以大义，劝阻毁城，主张不抵抗，让柳州和平解放。子夜时，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秦镇硬着头皮乘吉普车巡视市区一周后，便独自往里雍逃遁（解放后于1949年12月5日携黄金三十两向我投诚）。这样，留在柳州的敌人只是一批逃走不及或被迫留下

来掩护撤退的部队，以及直接受白崇禧、王景宜指挥的工兵破坏队。城内家家户户紧闭大门。商会自卫队荷枪巡逻警戒，防备溃敌纵火劫掠。我地下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通宵达旦地进行护城斗争和作迎军的准备工作。

黎明前的天空是最黑暗的。白崇禧和王景宋逃跑前，曾下令组织工兵破坏队，要用四十吨TNT烈性炸药，毁灭柳州城。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在24日晚上进行了一场搏斗。天刚黑不久，我军一支三十多人的便衣侦察队潜入市区水南街，在夜色的掩护下，地下党员陶渲带领他们到达鸡喇街侦察农械公司和三十兵工厂的动静。十时许，一小撮担任破坏的敌人，分头钻进电力公司、江汉广播电台、电报局、柳江浮桥。早已严阵以待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群众，机智勇敢地以金钱收买与武力威慑相结合的办法，迫使敌人搞假爆炸后逃走，从而保存了电力公司、电台和电报局。进步桥工毅然剪断安置在浮桥上的炸药包导火绳。铁路、水厂、农械公司、三十兵工厂、各中学的护城组织，通宵达旦地巡逻放哨……东台路河边巷的一间民房里，在微弱的灯光下，城工委书记梁山、油印员黄志明和房东易伯母，紧张地用土油印机赶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城市工商业政策》等宣传品，迎接龙城黎明的到来。

五

11月25日清晨六时，天空还是黑糊糊的，毛毛细雨时下时停。我军一一五师三四四团奉命由本队改为师的前卫，二营为前卫营，从沙塘向柳州市区挺进。在沙塘活动的地下党

员刘用章、周静芳、覃贤等，组织群众慰劳部队，并派人作向导随军出发。二营在途中俘敌一名谍报组长，据供称：白崇禧已下令撤退向南逃走。不久，团派出的便衣侦察队也回来报告，柳州敌人开始溃逃。洪有道团长立即命令二营：卸下背包米袋，以最快的速度向柳州急进，占领火车站，切断敌人的交通命脉。政委韩明曾亲自骑马到二营，对营长戴书德、教导员代科说：“你们要在两小时内占领车站！”随后又派骑兵传达命令：一营直插柳江浮桥；三营肃清市区残敌，保护车站。团指挥所带着警卫连紧跟在二营后面。一路上，战士们飞跑前进。大军进抵市郊白露乡双冲村时，与地下党员欧敏士领导的游击队会师，游击队员沈志刚和覃恩贤随军向导攻城。

这时，天已大亮，太阳冲出黑云，射出万丈光芒。由副团长徐鹏率领的前卫营，四十里的路程只用了一点四十分，就抵达黄村头。柳江环绕半岛形的城池，巍峨的马鞍山和鱼峰山展现在战士们眼前。驻守火车北站的敌军困兽犹斗，用猛烈的火力阻击我军。我军分成两翼，沿江岸和公路逼近车站，以勇猛的动作击退了敌人车站前沿的抵抗。侦察员张传发，单身冲入敌人阻击阵地的侧翼，表现了人民战士无比勇猛向前的精神。在车站纵深处，突然驶来一列装甲火车，吐出炽烈的火舌阻击我军前进。副营长王秉和带一个班在铁轨一端阻击敌车，不幸中弹牺牲。徐副团长怒火冲天，指挥战士爆破列车。随着几声猛烈的爆炸，装甲车象条死蛇瘫在铁道上，冒烟的车门挂出白旗，残存的敌军和官太太们成了俘虏，原来他们是敌十四军十师师部以及二十九团残部的一

部。解决了装甲枪，火车站全部归我控制，敌人铁路联络完全被我切断。与此同时，一营长孙辅臣带领部队由柳江沙角攻入东门，粉碎了零星敌人沿街抵抗（在古香中路，商会自卫队开火误伤我军2人）占领了柳江北岸的大部分市区，接着抢占柳江浮桥。南岸敌人，仓惶万分，见我军来势勇猛，掉头就跑。驾鹤街上整车整车满载物资的汽车和司机，成了我军的战利品。孙营长带领全营战士乘上刚缴获的汽车，一直往南追去，截获了百余名逃敌。在城南十公里的拉堡一带，与敌一个掩护营接上了火，孙营长大腿上负了重伤，还坚持坐在地下指挥，激战十五分钟，歼灭了这个营的大部。

在我军攻打车站和甯清市区残敌的同时，在柳江南岸的鹅山铁路地区和龙泉山下的鸡喇街，地下党领导的护路、扩厂武装力量，在晨曦中和敌人的破坏队作英勇的斗争。以铁路的地下党员周正、温桑恒、陈明德、陈汉清、谢友泉、陈聚魁、李克勤、张豪等人和百多个铁路职工解放联合会会员为骨干组成的护路队，冲进铁路警务处，夺取数十支枪武装自己，他们分头行动，保卫路局机关大楼、水电厂、机务段、车站重要设施。打入敌人应变组织的职工福利会的地下党员张豪，机智地动员十多辆汽车的司机带着车的钥匙分散隐蔽，致使铁路特警头目史铭带队逃跑时无车可乘，被迫丢弃五十多支步枪和大批弹药，狼狈逃跑。敌交警第一大队撤离鹅山后，途中与解放军遭遇，原来已被我地下党教育争取过来的该大队大队附胡久守，即率部向我军缴枪。护路队发现一长列弹药车在敌军押送下，在鹅山道口等火车头拉走，

立刻将列车包围起来，喝令敌人投降。走投无路的敌人看见工人们手上的一束束手榴弹揭开了盖子，害怕引爆弹药车送他们上西天，于是敌中央军械库少校主任何传文带领一排敌兵向护路队投降，十一个车皮的弹药和四千个银元成了我方的战利品。另一股敌人此刻在火车城站（今东站）爆炸弹药车，炸声隆隆，弹片横飞，火光冲天。铁路职工解联会员林荷达、赵文榜等人舍生忘死冲上前去，摘掉所有车皮的挂钩，将未爆炸的车皮推离爆炸区，保护了车站一带建筑物和群众的安全。距离市区五、六华里的鸡喇，是柳江通往下游的一个港口，是国民党国防部兵工署三十兵工厂和桂系官僚资产广西农械公司所在地。我地下党在鸡喇小学建立了战斗据点，据点负责人是曾鼎，他在农械公司和兵工厂发展了组织，成立了护厂队。从24日到25日上午，农械公司的利鸿燕、裴林昌、潘云、陈文禧、程辉、郑耀宗、王鸿绪、贺超等外围组织成员和其他进步工人一道，分头隐蔽在各车间及档案室周围巡逻警戒。在兵工厂，民主人士联合会成员唐述尧以该厂第六所所长身份为掩护，串连发动群众保护工厂。25日九时左右，敌工兵四团破坏队乘着两辆满载炸药的汽车冲进厂里，企图炸平该厂。在这紧急关头，李贵山、戴云华、安常荣、高鸿禧等三十多个职工挺身而出，他们高喊：“工友们！工兵来炸工厂啦！保护工厂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大家快拿枪跟他们拼了吧！”这一喊，被激怒了的职工们从车间和宿舍里冲了出来，一部份人堵住汽车，一部份人打开兵器库。一霎时，用轻重武器武装起来的三百多人的护厂队，枪上膛，手榴弹揭开盖子对准破坏队。敌工兵见势不

妙，急忙掉转车头逃之夭夭。十点多钟，解放军进厂接管，工人们兴奋地说：“我们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三营肃清了市区的残敌。疏落的枪声刚停不久，在培新路一幢高楼的屋顶上，地下党员沈章平和曾公朗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象征着古老的龙城迎来了黎明，获得了新生、解放！

从清晨战斗打响，不到半天时间，我军一一五师在市区内外共歼灭敌四十八军、十四军、二十九军残部二千多人（其中毙伤敌一百一十五名，生俘一千九百二十名），缴获各种炮一百三十五门，各种枪支一千七百七十六支，另冲锋枪半车皮，火车头三十七台，车皮一百四十三节，汽车二百五十辆，各种舰艇船只十五艘，兵工厂两座以及大批的各种弹药和卫生、通讯、汽车器材。

黑暗消失，光明来到。市民们纷纷涌向街头，围观俘虏和战利品，与解放军亲切交谈。成群的青年学生走出校门，自发地欢迎与慰问解放军。豫章中学的校门虽已封锁，但锁不住学生们欢快之心，纷纷爬出围墙欢迎子弟兵。柳江县一中的工友们熬了一大锅粥，慰劳过境追击敌人的战士。枪声刚停，地下党城工委四个负责人，按照计划，分头到各据点布置统一迎军庆祝解放的活动。解放军后续部队一五二师、一一七师相继入城。一队又一队雄赳赳，气昂昂，军容整齐，扛着日式和美式武器的解放军，高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经过街道时，人民群众夹道欢迎，整个城市欢乐得沸腾了起来。一一五师除留一个团带电台留柳州维持秩序看守仓库外，主力沿铁路南下直取来宾。一一六

师扫荡柳邕公路残敌，经拉堡、大荣、里高向南宁挺进。一一五师司令部入城后，师长王良太骑着紫骝马向三四四团部奔驰而来，他那坚毅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见到团长和政委，第一句话就是：“这一仗打得漂亮！部队打出了一个‘快’字……”

六

11月26日清晨，地下党城工委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局势已定，敌人已彻底失败，没有反扑的可能，决定发出预定的“和平兄，我回来了”的统一迎军庆祝解放的行动信号。上午十时许，迎军信号传遍全市。早已待命行动的宣传队、服务站、茶水站遍布南北市区。人民群众又掀起了欢迎解放军和庆祝解放的热潮。一面面小红旗迎风招展，一碗碗茶水送到解放军手上。大街小巷贴满红红绿绿的标语和庆祝解放的墙报。歌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龙城上空。家家户户敞开大门欢迎子弟兵住宿，间间商店开门营业。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自由地欣赏解放后的新天地。

27日，地下党城工委主动与接防驻军一五二师取得联系，部队的城工委与地下党城工委协商同意成立柳州市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作为临时政权管理城市和支援前线的机构。29日，治委会正式成立，地下党员高天骥、沈章平和柳州商会会长刘郁卿担任治委会负责人。地下党员、外围组织成员、民主人士、各界进步群众共二百二十七人参加治委会工作。治委会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协助部队和军管会按照地下党提供的档案调查资料，接管了全市的仓库物资和军政

文教机构；整理城市户口，收容和遣送了成千上万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全市中小学12月1日一律复校上课；为过境的四野、二野部队采购军粮数百万斤；社会治安良好，没有发生杀人和抢劫案件。12月9日，先期在武汉成立的柳州地、市党政领导机构及领导人李一平、魏伯等到达柳州市。12日，柳州市军管会、柳州专署、柳州警备司令部成立。地下党城工委与南下的党组织对上联络符号，正式接上组织关系，两条战线的战友禁不住热泪盈眶，热烈拥抱。15日，中共柳州地、市委在原柳江县政府礼堂举行南下党组织与地下党胜利会师大会。17日，全市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成员和地下党员，在柳师礼堂举行胜利会师大会。19日，柳州市人民政府挂牌办公。会师以后，地下党城工委、临时治安委员会和各外围群众组织正式撤销。中共柳州市地下党光荣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历史任务。在解放了的土地上，数百个秘密工作者和南下的同志一道，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以崭新的战斗姿态，投入人民政权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古城柳州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1988年8月20日）

本文资料依据：

- 1、广西档案馆藏：中共柳州市委著《中共柳州地下党发展简史》（1950年9月）
- 2、广西档案馆藏：广西地下党文献《广西省城市工作委员会九月会议纪要》（1949年9月）

3、广西军区档案：《广西军区司令部1949—1950年作战剿匪记录本》（1950年）

4、解放军三十九军军史《二十八年间》，孙耕华著《我军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广西经过》、韩明增著《解放广西的心脏——柳州》

5、《柳州市党史资料》第一期：胡习恒著《我所知道的柳州市地下党情况》

6、《柳州市党史资料》第九期：中共柳州市委党史办、柳州市人民武装部合著《一九四九年解放柳州市的斗争》（专题报告）

7、《柳州市党史资料》十一期：梁山著《回忆我在柳州的地下斗争》，曾少庆著《回忆我在柳州地下斗争的二三事》

8、《广西文史资料》第二辑：莫树杰著《解放前夕新桂系在广西的反动措施片断回忆》

9、《广西文史资料》第五辑：张文鸿著《白崇禧败回广西后的混乱情形和华中部队被歼经过》，凌云上著《衡宝战役亲历记》

10、1949年12月4日 广西日报：《解放柳州战果辉煌》

11、1949年12月9日 广西日报：《伪柳州警备司令携金投诚》

12、1949年12月26日广西日报：《柳州中共党员及进步团体，分别举行胜利会师大会》，常工著《与白匪破坏作斗争——记中共柳州工委领导下各厂职工英勇护厂经过》

13、1949年12月28日广西日报：阳地著《保护工厂，就

是保护自己——记柳州三十兵工厂员工武装护厂斗争》

14、中共柳州市委党史办资料：朱焕章著《解放前夕柳州一些情况》（1964年5月），朱焕章著《解放前夕柳州 敌军布防情况》（1983年10月）

我所知道的“反共救国军”

——广西解放前后的一段回忆

叶瑞廷

一九四九年四月广西省政府顾问、越南复国党主席黄南雄到龙州视察中越边境的越南形势。广西边防督办姚槐（少将）接待他们。同来的有黎越强、裴泽民、武廷岂、赖炽臣、关云汉、关秉彝、叶瑞廷等。督办姚槐奉白崇禧之命，请越南复国党主席黄南雄拟定成立越南反共机构方案，经费由华中长官公署核拨报销。我是黄南雄的中文秘书，也是越南复国党中国支部党员（总部在日本东京，中国支部在台湾）。拟定反共机构方案，我自然参加。最后定名为“越南各民族人民反共大联盟”，宗旨为对内联合中越反共人民大团结，对外扩展为国际反共联合阵线，以彻底摧毁国际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机构有会员大会（设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秘书处、宣传部、组训部、行动部、筹款部、粮食部、交通部、建政部、祖国统一部、发展部、妇女运动委员会、财政金融发行员委会等。呈文请白崇禧审核。

一九四九年七月底，白崇禧电请黄南雄等去桂林出席紧急秘密会议。黄南雄率我和苏植芳及越南国民党书记长武鸿卿、黄启武于十月中旬来到桂林，白崇禧安排我们在桂林乐群社住下。十月二十日白崇禧在桂林榕湖路四十号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出席人员有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广西省主席黄

旭初、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上将、华中长官公署秘书长何孝元中将、桂绥秘书长张俄遐少将、桂绥参谋长张任民中将、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雷殷、国民政府参军杜从戎中将、桂北纵队司令莫敌少将、越南国民党驻桂联络专员邓紫峰、越南国民党书记长武鸿卿、越南复国党主席黄南雄、中文秘书叶瑞廷、国大代表满景云、越南革命大联盟主席刘德忠（保大皇帝发言人）、秘书黎某、广西省政府秘书长黄中廛、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梁学基等人。

白崇禧讲话大意是：这个大会决定成立“越南反共大同盟”、成立中华剿匪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以施鼎昌中将为总司令、严智仁为少将副总司令、叶瑞廷为上校代参谋长。下辖第一、二、三、四纵队，以陆建屏为第一纵队少将司令，梁炳臣为第二纵队少将司令，雷达也（雷达也）为第三纵队少将司令，黄曼流为第四纵队少将司令。邓善宏两个建制师，改称越南反共救国军，统归越南反共大同盟正副主席指挥。

反共救国军是坚持持久的敌后战斗队，是以战养战的胜利法宝，是恢复敌后政权的别动部队，以金秀大瑶山为中心，但根据形势要求，可以采取灵活运用原则。要同越南反共大同盟保持密切联系。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初，第十战区少将分监林绍裘，由安徽窜回广西，要窃据并巩固在柳州黑社会的黑帮大哥的地位。柳州市的黑里手及一些落后工人均为林绍裘所掌握。他在十一月初，由柳州天外天旅社经理刘福海邀请林军侠、刘福海、刘冠堃、刘日胜、汪肇甫、赖华庭（赖和平的弟）、叶瑞廷、林绍裘等人，斩鸡头、饮鸡血酒、宣誓效忠大哥、

结拜为兄弟（这是一批国民党在乡军官的中坚骨干），继而四出活动。林绍裘通过海兢强，要求白崇禧批准成立广西别动军，自己任指挥，在敌后执行白崇禧的使命，保证不辱使命。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日，是林绍裘五十寿辰。刘福海、林军侠在柳江大酒家设宴五十多桌，为林大哥祝寿。林大哥在宴席上公开透露他已通过海兢强，得白崇禧任命为广西别动军中将司令。他说现在广西交我们治理了，今后我们要共同负责保卫广西。根据我们的情况，不一定反对共产党，但我们要求共产党，不要来分我们这块肥肉，我们就能和他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他还说：“我们的实力和人事部署，有新由台湾派来的担任桂南反共救国军中将司令甘定谋、少将副司令戚方利为正副司令，桂东金秀大瑶山广西警保处长、桂东军政区司令军政长官甘兢生中将与韩蒙轩少将。桂西南有白崇禧直接指挥的华中区反共救国军、施鼎昌中将总司令。因为已经开好进入国际通道的越南反共大同盟的成立，同法国和越南保大皇帝下的联合战线的形成，因此黄海帆和邓股蕃两位正副指挥的责任特别重大。这条国际交通孔道将必由两位来巩固。姚槐督办新任第一方面军中将司令，是白崇禧的化身，我们必须真诚拥护、服从指挥。华中区反共救国军在代参谋长叶瑞廷的精谋策划下，屡得白崇禧的赞赏。他是我们十兄弟中的老稳，我这个老大哥，在将来责任艰危的日子里，还得靠老稳运筹。我们还有猛将杨毅，他是将门之子，是杨俊昌将军的哲嗣，共军一进我们广西，我们将从四面八方而起拱卫

你们，看共军能呆得下吗？（热烈掌声）今天我谢谢大家给我祝寿，深领情义，我誓和大家共同振兴广西而奋斗！”（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前，林绍裘曾以越南复国党的名义部署，由贺匪罗山在柳州通穿山的地段内活动筹餉（拦路抢劫形式），林绍裘的别动军组织来完成 任务，而接到海兢强的通知，白崇禧认为，时间已来不及，你号召得多少就使用多少，尔后逐步完善，你们赶快转入地下，以免被共军消灭。共军新到士气旺盛，锐不可当，应暂避其锋以自保，以执行长远的使命为好。

白崇禧于十一月二十日由桂林抵柳州，二十四日晚，偕同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国大代表王赞斌等飞往台湾。

柳州市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解放。我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报请共产党请准我参加革命工作。十二月十三日柳州专员兼市长魏伯召见我，并指定一位女同志（姓名记不起）和我联系，她带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联络站介绍给王树人。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树人主任派我到南宁第十三兵团保卫部范仕民部长处，在当时的广西省委统一领导指挥下做“清匪建政”工作。华中区反共救国军及林绍裘的广西别动军，通过我的工作，均一扫而光。反共救国军中将总司令施鼎昌、少将副总司令严智仁、上校代参谋长叶瑞廷、第一纵队少将司令陆建屏（陆荣廷第三子）、第二纵队少将司令梁炽臣、第三纵队少将司令雷达宣、第四纵队少将司令黄曼流、中校联络参谋陈育夫、特务黄建福、少将高级参谋杨崇

等十人中,除上校代参谋长叶瑞廷一人外,其余九人于一九五零年三月十九日在广西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中在南宁被枪毙。

林绍裘、杨毅、罗山等反革命首恶分子,则在柳州枪毙。

天亮前后

——柳州解放前后日记选片

谢汉强

这些日记是从我在柳州解放前后所写的日记中选抄的。
为真实反映原貌，除错字和标点外，未作改动。

——作者

六月六日 星期一

今是“工程师节”，但柳州一点动静也没有。街上壁报见不到好多张，报纸上也没有显著刊登这方面的文章。

大概里这不需要工程师，或者现在不需要工程师了。看来，如果到了豪门节，热闹不知会到何程度！

六月十三日 星期一

纪念周会上，校长（指我当时就读的柳州高中校长黄公健——作者）宣布：从二十一起考试。

越早越好，免得在学校里活受罪。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很早，我就到县图书馆里去。本来准备温习自己的功课（生物、农业）的，但结果还是借了馆内的一本《现代中国经济学教程》来看。

“图书馆”是这座巨大建筑的名称。但它不只是个图书馆。里面还有“教育局”、“华中军政办事处”等等，图书报章缺乏得可怜。这也是无新书及报纸杂志到来的缘故。案台上摆的十分零乱，那些报纸杂志都是可当史料研究的了。

“研究室”有“多”到八个座位，光线空气都还好，里面也相当整洁。可是，研究者却不能够在此真正作研究功夫，因为三楼频频传来什么东西与楼板摩擦发出的声音。这声音的力量之大，足以把每个想研究的人静静的心扰得很乱，很乱……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街头街尾乞丐很多。他们对于那些擦胭脂涂口红的小姐、贵妇和她们身旁西装笔挺的先生们，并不敢大胆伸手乞求，而对我们这些差不多和他们一样穷的人，却常常哀声相讨。

这是为什么呢？他们那些富人不是很有些银毫和铜仙吗？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学校早上无水供应洗面。

也许是学校当局暗示我们：节省一些的好。然而，同学们却不得不从口袋掏出铜仙到外面买一瓢水。真是又“折损”了许多！

学校的歌咏比赛决定不举行了。这是不足为奇的。这年头，在我们这里，谁能够自由地高声歌唱？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读史书，见秦汉时代的封建义务很有些名目，除田赋而外，有口赋、更赋、税捐、均输、输捐、力役等等，史家大呼繁重。

从历史看来，社会制度是逐步进步的。现在的社会制度比秦汉时代是进步了。但是人民的负担呢，却随着统治者们私欲的扩大而又加重了不知几许倍。田赋呀，地租呀，在土地上巧立名目加征的税捐，真是数不胜数；商业的营业税，所得税，直接税，还有什么遗产税、人头税，也有了更多的名目。最近要领取“国民身份证”，形式上说是取回工本费，但工本费哪用这么高？所以本质上实际是一种人头税的。

下午请假回家。

家乡的田亩已着上了金黄色的衣裳，有些稻谷已割去了，零散的一小块赤裸着的土地却又象穷人衣服上的补丁。村里的人都为即将到来的劫难而恐怖着。明白的人偷偷地说：

“共产党倒不用怕，我才不信他们会有乡长讲的那样毒；怕的是‘国军’，怕他们没有乡长讲的那么好啊！拉堡的事（指国民党军队抢劫居民财物一事——作者）你难道还不晓得？”

然而惶恐也只有惶恐而已；他们并想不出避祸的办法来。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三

补收证章费三角，并规定只数东毫；柳江县的同学得要写五封信，规劝亲友交纳军粮——这些都是学校的命令。

对校方命令的冷淡，在许多同学中已渐成习惯。

近两日，很多兵到柳州。他们带的都是使人害怕的银元券。市场很紊乱了，很多店铺迫得关门，纠纷层出不穷。关

门尤以今晚为多且早。

“国军”正在“争取”着民心啊！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四

报载，贵阳“陷落”后“共军”北进指遵义向重庆，川东则由彭水推进。

中国的全面解放已将成为事实。美帝国主义为了要顾及苟延气势，积极地在准备着建筑“防御工事”，对日和约会议的召开就是这样产生的。他想使日本作为他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对我国的台湾，他也很想使能附属于他，作他在远东的“屏障”。然而，爱自由、爱独立、爱民主的人们总不肯让他得逞的。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美共和党参议员诺兰来华，在台会见“国人”，谓天亮前必更黑暗。中国奋斗必获胜利。

中渡县城居民财物被过境“国军”掠劫一空，前几天四十八军过拉堡时亦强夺民食，走时亦有掠衣物者。这些都可算是黑暗吧！天亮前，人民的天亮前是更黑暗的，奋斗必然胜利的。诺兰说得很“对”！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下午五时许，又回到了我可爱而也可悲的家乡。村里的人都注视着局势的发展，若喜若惊地眺望着，想着那不平凡的日子是怎样个来头。

一回来就和××一块到孔屋去，老王诸兄均在此。

（注）我准备在村中逗留一段时间，和他们一块做我应该做的工作。时局已经趋于极度“紧张”了，柳州的解放也许不会出半个月之外。必须在这很短的时间里尽我的力量为革命效劳，那怕一点点仔也好。

老王他们搞来的那个小型收音机还是不响，真是急煞了众人。我和××自告奋勇，由我们两人到基隆村的通讯学校去，找那个教员帮助检查修理一下。

注：这里的“××”和末段的“××”，是指龙城中学学生、爱青会员谢志雄，“老王诸兄”是指化名为王平的地下党员谢贤忠和柳师的学生、地下党员韦熊长（现名荣章）、罗俊义、郭展华、爱青会员周顺杰，和进步学生杨石嵩以及由桂北游击队转来以杨石嵩的妹妹身份出现的“小杨”蒋国秀。一九四九年八月间，他们到今柳江县进德乡的塘头、槎山、基隆、拱桥、大塘等村以举办成年农民夜校（俗称成人班）为掩护，开展群众工作，并以塘头村农民孔子德家为据点。当时，我和休学在家的谢志雄、柳高学生、爱青会员覃焕明（现名覃非）商量，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后，在不暴露身份的原则下主动配合他们工作。他们也逐步将我们当做积极分子加以培养和使用，在村内做适当的宣传、社会调查和迎接解放的工作，一些重要会议是在我和谢志雄几家共住的大屋内的密室召开的。一九五〇年夏陈枫、胡习恒、熊元清、韦竞新集体回忆，邱如岳记录整理的《中共柳州地下党发展简史》稿中曾提到：“七月会议之后……群众工作重视组织城郊农民，黄村、塘头、思贤、洛满……等郊区据点先后建立，以后在掩护干部，迎接解放军

入城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上午十一时许偕××（即覃煥明——作者）等五兄往柳，准备明天把被子取回家来。

踏进了姑丈的家门，就见他们一家人都在忙乱地捆绑东西。听说柳北沙塘已很“吃紧”。街上的人也很慌乱，有的忙着准备“疏散”。

城里的空气一时紧过一时。晚饭后听说夜十二点柳州要成“真空”，街上的人更加慌乱了。我心里激动得很，这时刻确是太不平凡了。不知是由谁建议，我们竟在电灯光下玩起扑克来。国民党军队在逃跑前的慌乱之中还来拍了一阵我们的大门，我们不予理睬。大概也是由于胆怯和急于逃命，所以扰了一下就夹着尾巴溜走了。

我们依样玩着扑克。在这最紧张的时刻，就是我们感到最“安闲”的时候，最兴奋的时候。

我好象一个被黑暗苦得要命的人隐隐看见火光一样，惊喜地等待着那些执火把的人们。

一点多钟，我们四人共挤在一床被窝里睡觉。我做的梦特别甜蜜。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一早，我们就赶着回村。公路上许多慌乱的逃兵，也有不少老百姓。我们走得比他们更快，但心情和表情同他们都不一样。我心里想：柳州就要解放了，真是天亮了，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为什么还有这许多老百姓也慌慌张张地跑

呢？其实，这里边没有几个人是愿意跟着国民党军队跑的，只是因为国民党反动的宣传太凶，毒害太深了，使很多人现在还被蒙着眼睛，看不清善恶。但是，这种情形不会长久了，过几个钟头，解放军赶到之后，许多中毒的人就会醒悟过来！

不知妈妈是高兴还是什么，今早竟舍得杀了个鸡。正要吃饭的时候，便听到了柳州城郊传来的机枪声。我对六叔（即谢志雄——作者）说：“这比我们过年放的鞭炮声还好听呢！”

下午，我们一群青年夹着准备好的壁报和标语——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宣传品到柳市去。走出村背不远，就可以遥遥望见一里外路上向西挺进的解放军队伍。我们的心乐得开花了，发自内心的激动使两眼滴出了热泪。我们不约而同地奔跑起来，挥动着手中拿着的红绿纸和各种物件，喊着“欢迎解放军同志”的口号，迎上前去。解放军看出我们是欢迎的人群，有的也遥遥向我们招手。一会，我们就靠近了，看清了解放军战士，有的穿着绿色军衣，有的穿着黑色便衣，一个个都雄赳赳的。我们又挥起手中的东西对他们喊道：“辛苦了，解放军同志！”队伍里有一个同志安慰似的回答说：“老乡们，你们等久了！”

傍晚，我和志雄两人先后在谷埠街、鱼峰路和驾鹤西路贴了标语。

街上的空气是新鲜的，和谐的，老百姓围观着在唱歌的解放军。解放军唱了很多支歌，其中有两首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前几天才从

老王他们那里学得半熟，但是在外面却不能唱，今天一听到这两首歌就感到格外亲热，我们一面贴标语，一面也高兴地哼了起来。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刚天亮的柳州城，很宁谧。街道上行走有依稀的百姓和军队。这些百姓的面部却与昨天早上见到的大不相同，一个个都堆着欢欣的微笑。

我们踏着轻快的脚步，冒着细雨和寒风赶回村上，知道粮仓没有谁敢去动过。我们交代贵廷（注）严加看守。

下午又赶出柳州。见街上行人很热闹了，大家都欢欢喜喜地看新社会的来临，以前压在身上的冤屈消除了，今后，自由才真正属于大众。

五花十色的壁报和标语贴遍了全市各街的空壁。以前不能做的现在做出了，以前不能说的现在也响亮地说出来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

国民党的飞机来骚扰了一下，市内不少人被吓慌。嘿！现在还示什么鸟“威”啊！

学校决定后天复课，一切都安全。

注：贵廷，为谢贵廷，在谢贤忠、郭展华等同志入村后，积极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后被吸收为工农解放联合会会员。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昨晚开夜车至二时，壁报（在本村张贴——作者）大致完成。因缺乏经验和能力，所以弄得并不好。但我们想，多

弄一些，总会好下去的。

柳州解放了。几千年来专制枷锁也借助人民解放军的威力被粉碎了。从此，这地方的，曾经受尽压榨、痛苦的人民，可以呼吸新鲜的、自由的空气了。从解放的第二天起，许多跑出外面的市民都纷纷归来。乡下的农民们也高兴地跑进来玩玩，看看！炫目的布告、墙报、标语，使他们更加兴奋。我见到了每个人堆着微笑的面孔，浮现着愉快的神色，我意识到，我现在才是一个人，才是一个生活在人群中的人，以前的一些人就是狼，是虎，另一些人就是猪、羊、牛、马，对立得十分紧要。现在，我是人，旁边的人也都是人了，我们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街头上拥着一堆堆的人群，在愉快地谛听着宣传队报告关于人民解放军的故事和道理，或者是听解放军同志介绍他们英勇战斗的经历。

晚上，以解放后第一次拜访和贺喜的心情，见了金门戏院的银幕。见到了尹老师（龙城中学教师尹曲），他们和一些朋友也来看解放后的戏（电影——作者）。彼此都说：“很好，很好！”

解放初期柳州金银黑市斗争散记

万 流

解放初期，中国人民银行柳州（中心）支行曾经有过一段和金银黑市作斗争的小史。这场斗争，我是直接参与者，所以我知道得比较详尽，现凭回忆，姑妄记之。

伏 线

事情还必须从解放前说起。

解放前我们曾以“龙城中学”作为活动基地，以“广西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的名义，在中共柳州城工委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我与龙中教师胡敬之单线联系。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搜集有关国民党金融机构的内部情况，诸如组织人员、金库地形、电台设施、撤退动向等等。龙中被国民党政府勒令解散后，我则以“单帮客”身份为地下党作掩护，来往于广州、柳州之间。所以当时我经常出入国民党的“四行一库”、沙街“九八”行和其它一些商家，也少不了与当时的政界、文化界有联络。总之我对当时社会上三教九流都有往来，认识很多人。

为了工作需要，我们故意与一个开百货商店的特务周旋交朋友，并和他的弟弟合伙开了一片寄卖商行（解放后已关闭）。还和一家叫“金豹行”的小型百货商店的老板打得火热，帮他借款，一同到广州办货，一起回来销售。我们利

用这家商店作掩护，了解到许多情况。没想到这些都为后来开展金银黑市斗争工作埋下了“伏线”。

解放初期，国民党的法币、金圆券、银元券已成为一堆废纸，而人民币一时还不能迅速占领流通市场，柳州也和梧州、桂林、南宁等市一样，群众市场交易仍以洋纱、银元、港币等作为计算单位，农村圩场则以大米、东毫、银元、铜板为主要流通媒介。因此，投机商人炒卖金银、港币、美钞的不少，而且极为猖狂，国民党暗藏特务更乘机兴风作浪，进行骚扰，市场混乱程度可以想见。面对市场如此复杂情形，中国人民银行责无旁贷的任务显然就是全力以赴展开货币斗争，让人民币迅速占领流通市场。当时，我被分配到地区银行工作。

措 施

1950年2月初，我们根据省分行的指示，并请示柳州市军管会批准，制定了如下紧急措施，立即对金银黑市采取行动：

根据省分行转发的告示，以“柳州市军管会”名义在市内大小街道公布张贴，声明人民币是人民政府唯一法定货币，一切公私交易、债务往来、纳税等一律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严禁一切外币、黄金、银元、东毫在市内买卖流通。

由市军管会出面召集工商界各阶层有代表性的知名人士开会，说明当前国内外形势，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说明人民币有雄厚的物资作后备，绝对可信可靠，消除他们对人民币的疑虑。还希望到会的人以身作则，

并对群众广泛宣传，遵守人民政府法令。

银行和贸易公司、工商局、公安局密切配合，运用经济手段巩固人民币阵地。以贸易公司为主，控制大量物资及时投放市场，严格监视，只准用人民币交易，提高人民币在群众中的信誉，从而排挤银元在市场流通买卖。

打入黑市建立据点，参与黑市活动，摸清情况，见机行事予以狠狠打击。

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制群众使用人民币，但是解放初期的社会情况复杂，残渣余孽兴风作浪，外币、金银黑市非法活动仍然猖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组织上决定把建立黑市据点、打击黑市、消灭黑市的具体工作交给了我。因为我解放前在党的领导下搞过地下工作。旧社会留下来的熟人多，以“灰色”面孔混入黑市，不易为人识破，便于开展工作。同时胡敬之在公安局搞侦察，联系方便。因而我又恢复了解放前的老样子，西装革履，整天出入商家店铺，和老板们喝茶聊天，悠悠荡荡地“混日子”。

行 动

货币斗争这项工作，是由省分行直接领导，柳州中心支行经理杨振铎亲自指挥，副经理黄岩光具体掌握。我白天不进银行坐班，内部活动如请示汇报、开会布置、运送金银等，一般只能在晚上10点钟以后进行。我对这项工作是生疏的，无先前经验可鉴戒，且政策性强，既不允许却又很容易出差错，风险大、责任重，虽然我知道自己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但是那时候讲的是组织纪律，服从分配，从不考虑个人

得失，干不了，硬着头皮也要干。现在回忆当时那股“初生牛犊”的劲头儿，真觉得有些过分“勇敢”了。

我们行动的第一步：先物色一个可靠的黑市据点。解放前我和几家商店有往来，结识几个老板，经与黄岩光同志商量，决定从两个认为比较可靠的人中间挑选一位姓王的商店作为黑市据点。他在培新路开了一片夫妻商店，店名叫做“金豹行”，做百货生意。只是门窗半开半掩，柜台货物稀稀落落，好象要倒闭的样子。我们把任务要求直截了当地对老板说明以后，他们表示愿意接受，不过只是货源不足，铺面到期，如继续租赁，扩大营业，必须请求贷款。我们考虑，这个铺面地点离银行很近，运送金银很是方便，而且老板为人老实，有靠拢政府的意愿，又是一家老铺子，地面熟人不少，经领导研究决定：乃以“金豹行”为黑市据点，并同意给他们无息贷款，黑市工作结束后归还。随后他们到外地进了一批百货充实柜台，铺面焕然一新。

我们行动的第二步：要开展工作，仅有“点”不行，还要有“线”，信息网络是至关重要的。要打入黑市，必须先了解黑市情况，比如早晚行情、沟通渠道、黑市组织、规律趋向……这就很需要人员协助。时间异常紧迫，一时去哪里找到合适的人呢？于是我只好去公安局请教胡敬之，正巧他们刚在市场上抓到两个捣卖银元的家伙。据了解这两人原来是沙街商行的九八佬，现在为了谋生不得已重操旧业，年纪不大，态度还好，经研究这两人大可利用起来，一方面把没收的银元、东毫如数归还他们，一方面做他们的工作，晓以大义，只要他们悔改，不予惩办，并由他们写了保证书，争取

立功赎罪，今后要为我们做事，每天早晚把黑市情况向我们汇报，后来这两人果然每天把金银黑市行情以及活动情况告诉我们，根据线索我们也去作过了解，基本属实，并非假报。半月以后这两个人逐渐来得不那么频繁了，但始终还保持着联系，后来又请了一位“临时工”——过去他也是个九八佬，我们便多了一个跑腿的。从这以后我们对每天黑市交易情况可以说知道个大体。

我们行动的第三步：抛售硬货来压低金银黑市价。稳住人民币。金银黑市活动猖獗，无视政府金银禁令，它似股潜流，强行压制难以堵塞，唯有树立人民币信誉，提高其“身价”方可奏效。当然根本的办法在于政府有雄厚物资作为后盾，使群众对人民币达到完全信赖的程度，自然而然弃金银而不谋。然而，刚解放不久，群众对人民政府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再加上物资欠缺，物价上涨，坏人从中兴风作浪，造谣中伤，金银自然值钱，人民币相对贬值。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暗中配合抛售黄金、银元是必要的手段。压低金银黑市价格，使它们和人民币的比价，始终保持在人民银行收兑牌价上下，浮动不大。市上抛出大量金银，黑市价格自然就涨不起来了，从而稳住了人民币。抛售硬货又不可盲目从事，否则将得到相反效果，必须以大量调查数据为基础，摸到规律后，既能计算出涨跌比率，又能摸到涨跌时间，准确估算抛售数量。终于达到早晚黑市价格能为我们掌握、听我们调度的目的。

我们大量抛出黄金、银元都是头一天晚上10点钟以后，由黄岩光副经理从银行库中提取出来亲自用车一箱一箱运到

“金豹行”后门口，我们再一箱一箱抬进去。一天的兑换情况，当晚结清，制表上报，金豹行铺内没有另立帐册。

我们行动的第四步：配合公安局开始有重点地对非法买卖金银的商家进行搜查逮捕或拘留，这是到了必要时不得不采取的强硬措施。根据我们事先掌握到的情况，与公安局配合作好准备，在买卖双方进行交易的时候，破门而入，人赃俱获。最多一天可查获二一起。

记得有一次，时间好象在春节以后，那几天物价猛涨，消息说有盘据山上的土匪，入市抢购物资，买卖金银。事先得到情况，地点在沙街一家商行，老板正是“炒卖”黑市金银的头头。我们得到消息，全体出动，记得副经理庄东月、黄岩光，秘书李明以及其他几位南下同志都带了枪支一起去了。我们行动迅猛，敌人措手不及，银元、黄金到处收藏。我们在箱柜、篮筐、以至蚊帐竹竿内搜到金条，在花盆下面搜到金银首饰，连地下都可以捡到金戒指。这次查获了大批黄金、银元、东毫，并将现场交易的人由公安局拘捕。这一件事使柳州金银黑市受到惊震，开始逐渐收敛。

经过几个月的金银黑市斗争，随着1950年春节的到来，柳州贸易公司到外地组织大批货源陆续运到，对巩固人民币阵地增添了物资力量，市面商品交易皆以人民币为计算标准。群众拿黄金、银元、东毫到银行兑换人民币的日益增多。此后，随着政府掌握的物资增多，商品销售流通扩大，人民币信誉也就升高了，人民币在人民群众中扎根也就越来越深。

尾 声

1950年第一个春天，柳州非法金银黑市活动基本销声匿迹。

金豹行贷款如数归还后，王老板考进了柳州市油脂公司工作。我也回银行上班。

解放前柳州土地测量和登记

方 贵 益

甲、土地测量方面

①测量机构及工作：这项测量工作，初为广西陆地测量局派员组成的“柳州市土地测量队”进行；后为广西省地政局派员组成的“柳州市地籍整理处”进行。

广西陆地测量局（以下简称测局）原以办理大地测量、三角测量、图根测量及搞军事地形测量图为主的测量，但后来鉴于省当局对土地管理的重视，故也由测局办理户地（地籍）测量。嗣因测局于民31年（1942年）3月10日裁撤，广西省地政局于同年同月同日成立，以接管测局的业务。即成立土地测量队5个队，以负担测量任务。当测局未裁撤前，依据国家《土地法》及《各省市地政施行政程序大纲》的规定，在省内尽先就交通要冲工商业繁盛的地方如邕、梧、桂、柳等城市，着手进行土地测量。始初测量柳州市土地，系测局派员组成“柳州市土地测量队”进行，已见上述。其组织如下：

队长1人，审查员4人，均分别以测量资历深或较有测量经验者分别充任。测量员40人，由测量学校出身的人员充任。事务员3人，分别办理总务财务保管等工作。

其中有：关开元、唐郁芳、苏挺松、陆洗容、杨树发、谢化民、周志俊、何振通、徐树霖、何仁杰、何学迈、李禄洲、吴荣绪、梁禧香等（均系笔者于测校时同学）参加过当时柳州市土地测量，其余名单已忘记了。

柳州市区土地测量，系于民国26年11月着手，至民国27年6月完成，仅费时8个月。其成果有：三角点29点，多角图根点1528点，水准点12点，测得五百分之一图452幅（其图廓为 $40 \times 32\text{cm}$ ），有经界成丘形状而求积者20716亩（还有山地河流及荒旷地未办编号者933亩），编列地号共15470号。均以每一丘编一地号为原则。

此外，于测量时，一面绘具测量总图、地版图和图幅接合表，以便随时能查到所在图幅和土地坐落，一面按图逐号逐丘计积，并分别登记入地积册中，此册计有地号、业主姓名、土地面积、地类、土地坐落，地价等栏；还搞出土地分类统计表和公私土地统计表等，而后把它们全部移交给柳江县政府接收。由于当时柳州还未单独设市，系属柳江县政府管辖，且柳江县政府地政科系于测量队结束半年后即到民国27年12月才成立，故该项测量图册表据，是由县府发交地政科办理。

②、土地测量的作用：土地测量，因已测出土地经界丘形图，复逐丘编号计积登记，故属较为理想的土地的科学管理方法，一如管理人口户籍之需编列门牌号数，则对土地管

理，可谓严密。这既可防止土地兼并、纠纷，又可防止滥用、侵占和盗卖盗买土地，亦可防止于公地上乱搭乱盖发生。同时，也为了便于征收地价税。

③、再次土地测量：柳江县政府地政科成立后，原已按测量成果图册，办理第一次土地登记，和办理移转变更分割合并及他项权利登记事项，但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形势紧张，时局动乱，图纸有致散失，且市区工商业日益发展，建筑不断扩大，丘形变动尤多，都需把市区土地再进行重测，并办理扩大市区测量，故于民国34年10月，又由省地政局派员组成“柳江县地籍整理处”，又进行柳州市区和扩大市区的测量。其组织如下：

处长1人，由县长兼任（当时杨义兼处长，后为陈与参），以利工作之推动，副处长1人（苏世荣任）。下设总务、审核、测量三课。总务课4人，办理会计出纳庶务印信公物保管等项。审核课4人，办理对图纸审核更正及测量技术之指导和测量工作之安排布置事项。当时任审核的有刘炳南等。测量课40人，系对土地之施测、绘图、计积、统计等事项。当时测量员又叫“课员”，计有李楷贤、李文灿、廖世业、梁卓权等。

该处（简称地整处，下同）对柳州市区及扩大市区的测量，系于民国35、36及37年先后进行。于民国35年重测柳州市河北的柳东及柳西两镇；于民国36年测市河南的屏山镇及思贤乡部分；于民国37年测平川和广源部分。

其成果为：共分45地段，每段图幅约17~36幅，计共测得1215幅，土地面积共43,588亩，较第一次测得的多出

22,872亩，并完成应办的地积册及其他图表等，又把市区和郊区应办第一次土地登记办理完毕。地整处于民国37年6月结束。

为争取登记征税，地整处测得的图幅与地积册和第一次土地登记表据等，都在结束时及结束前先后移交与柳江县地政科，以续办各项土地登记和办理土地估价、计税等项。

在民国35~37年6月测量登记阶段，柳江县地政科长初为梁宗歧，嗣为李静华（荔浦人，系笔者测校同学），后为袁启超，于民国27年时系王伟。

乙、土地登记方面

（1）、工作的进行：柳江县政府地政科开始办理第一次土地登记，系根据市土地测量队移交的测量图册等办理。所谓第一次土地登记系区别于以后需续办的土地移转变更分合割并等项的登记。当时广西办理土地登记，仍依《土地法》及《各省市地政施行政程序大纲》和《广西省土地登记施行细则》之规定办理。

在开始办理第一次土地登记时，地政科人员的配备是：除科长1人外，计职员43人，雇员33人，工人15人。在办登记的区域中，依照列交的测量成果：面积20,716亩，地号15,470号，已见上述。第一次土地登记时，经费由省拨给，以后续办移转等项登记时，才由县支付。当时省拨给的经费为24,910元（国币，下同）则每亩平均费用为1.20元，每个地号平均费用为1.61元。

首次登记于民国27年12月开办，民国28年8月结束，仅需时9月。计接收申请登记案为15,470件，发出权状为6,051件。当第一次土地登记结束后，虽仍需续办土地移转等项登记，但工作量已大大减少，故工作人员需大大缩减。计除仍设科长1人外，仅置科员2人，测量员2人，办事员2人，雇员1人，工人1人，已可应付。迨至民国35年以后对扩大市区部分因地整处已办第一次土地登记，故地政科的工作人员，虽经减缩，而仍可以进行续办土地移转等项的登记工作。

(2)、关于业权的确定：依照《土地法》规定：所申请登记的土地，一经审核属实，准予确定业权并发给土地所有权状后，即具有绝对效力。故办理审核登记案件时，必须认真地郑重地审查，并深入调查了解，认为确实无误后，才付诸列榜公告，以征询对所列土地有无异议，如有异议，应由公告之日起两个月内报请有关地政单位复核，否则不予确定业权，发给土地所有权状。

(3)、关于申请登记的手续：于土地登记期限内，申请（也叫声请）登记人应填具土地登记申请表连同契据及其他有关证件送地政收件部门收受办理。于申请表中列有：业主姓名、地号、土地面积、土地坐落、土地四至及有无他项权（指地上权、典权、抵押权等）关系，和证件名称数量等项。

柳州市区及扩大市区由地整处再办第一次土地登记时，共申请权约22,993件，核发所有权证未详。

(4)、关于地价：土地登记的作用，除保护公私业

主产权外，还在于征收土地税。由于业主申报地价时，多以多报少，又未能做到“涨价归公”以打击垄断土地者，所以地价需由政府估定并编制地价册，以定征收地价税的税额。此项工作，原应由税务机关办理，不在地政机关登记范围之内，但当时广西当局为使能迅速征收地稅，故确定于办理第一次土地登记时并为办理。再者，省府又见各市对市地地价估定偏低，所以干脆来个“规定地价”。在民国31年以前及由民国31至33年办理登记的，地价总额均由省府规定。

柳州市方面，接民国27年至28年的测量，以 20,716 亩计，改良地部分为33,061,885元，未改良地为200,000元。对税率根据孙中山先生在其《民生主义》中指示。为使业主充分的积极的利用土地，对荒地或空旷地（未改良地）征税要重，否则较轻，故改良地税率定为1%，而未改良地税率定为1.5%。计省府定地稅共为333,618.85元。于民国32年4月开征。于民国32、33年规定的地价，仍按第一次测量面积2,0716亩计算，但地价总额共为207,796,373元，税额共为3,127,806元，增加几近十倍。盖因当时通货膨胀，币值低落，而才发生税额增加逐高的情况。

1988年12月25日于柳州

解放初柳州土地登记

方 贵 益

柳州市解放后，已从原柳江县分出而单独设市，所属专区后直辖于省。市人民政府成立后，鉴于解放伊始，百废待举。为配合农村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的土改，认为在城市方面，搞房地整理，办理土地登记，保护公私合法房地产以繁荣城市经济，提高城市生产力，系有必要；再就是对逃亡地主、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财产情况，也需清查。市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柳州市土地登记办法》，并利用解放前原图册为依据，重新进行柳州市区的土地登记。

此项登记工作，于1950年5月起，至1950年12月底完成。1951年6月底以前所有权状和他项权利证发放完毕。

办理机构：市府于1950年2月成立“柳州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处”（地址在培新路）。设处长1人（先是纪文，后为全文华，均系南下工作团干部），下置公地、代管、登记三股，各股设股长或副股长一人。当时登记股系方贵益以副股长名义负责主办全市土地登记业务。股内除副股长外，设测量员2人，系赖腾兴及黄隶昌充任。审查员3人系覃伟君充任和由方贵益、赖腾兴兼任。收件员3人，系韦

翠熙(女)、黄河年(女)、黄怡书充任。这等于以7人干解放前数十人所做的工作。查解放前柳江县府办理柳州市土地登记时,共用91人。而于解放初期搞同样的工作,仅用7人,所以工作是很紧张的,确无拖拉推卸现象。

工作进行程序

①订颁土地登记办法 和 登记须知。

②宣传,大张旗鼓地向全市业户及各界人士宣传。对为什么要办土地登记?业主所得利益在哪里?如何申请土地登记,究竟手续怎样?都以问答的方式,在《柳州日报》上发表,使能家喻户晓,收效很大。故对繁重工作,能以少数人于短期内完成。

③申请人填报申请表并附同契据或其他证件申请。

④收件审查,由收件员收件后,再由股发交审查员审查。

⑤列榜公告。待审查得一批后,才列榜公告。

⑥确定业权。

⑦颁发土地所有权,和他项权证书。

登记区域:东至窑埠,西至五里卡,南至依山村,北至白沙村,即过去的以柳东柳西及屏山三镇为范围。计地号约为15470号,面积约为20,716亩。收受申请案约为12,000件、填发权状约6,000张,他项权证约200份。

登记的规定

1、申请土地登记时,申请人先领申请表式填就,连同契据及其他有关证件送请登记收件处办理,已见上述。如所送证件系白契等(即未经过政府验印的)要补纳契税。

2、凡设有典权抵押权之房地，由原业主申请登记。如原业主不在，得由权利人代为登记，但不得变更原业主姓名。

3、凡关于房地产之取得、设定、移转、变更者，新旧业主均须于三个月内携带全部证件向市房地产管理处申请办理登记或注销登记手续，未经房地所有权之登记，不得办理他项权利登记。

4、凡业主不在柳州时，得由代管人代为申请登记，但须有委托书。未经委托他人者，得由现使用人申报备查。

5、如房地产有纠纷未决，不论民事、刑事，暂不予登记，须候法院判决或调解确定后，再行办理。

6、登记费，如为第一次土地登记和以后买卖移转登记者，按房地产价千分之一征收；如系变更（如分割、合并）登记和他项权利登记者，分别按房地产价或权利价值的千分之零点五征收，并酌收书状工本费。

7、登记公告时间定为两个月。逾期如无人提出异议者，而送审证件又属确实时，准予确定业权。

土地估价

于1953年3月，成立“柳州市土地估价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各1人，主任委员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天骥兼任，副主任委员由房地产管理处处长金文华兼任。设委员5人，市税务局派出一人，由邱济贤（女）充任，地方人士4人，计为陈显扬、吴志刚、杨义、马正贵等充任。委员会任务：把在解放前所定的地价作参考，以解放初期各街道土地买卖价格为凭藉，再按各街性质和工商业交通等情

况，从新估定每地区每亩标准地价后，便据此以造具土地税册，由市税务局征收地税。税率，仍以改良地和未改地两种。前者为1%，后者为1.5%，至税额系由市税务局掌握，未

1988年12月25日于柳州

“四一二”政变时谭均任在 柳脱险记

谭履平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形势日趋紧张；当时柳庆党务整理处也成立清党委员会，共产党员唐崇敏、陈岳秀先后被抽离柳，我大哥谭均任仍坚持工作。但那段期间他下班后，常与卢种德（共青团员）等人密谈当时的形势；有一次被我二叔谭昌遇见，二叔已知大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了共产党，就告大哥要注意，形势很不好。当时大哥说：“不怕，有我们的人卢东山在清党委员会任要职，有情况会告知我的。”二叔说：“两党斗争是很复杂的，说不定他们还有人打入你们之中，总之要提高警惕。”过了几天，阳历九月十三日，大哥下班后，见家中晚饭未做好便离去；刚走不久，陈略匆匆赶来找二叔说：“二舅，我见到清党委员会今夜逮捕人的名单上，大表哥谭均任是第一个名字……。”陈叫大哥赶快躲避，并说：“以后我就不便再来了，这些老表今后在街上碰到我也不要打招呼，以免被人怀疑……。”陈是谭家在思恩县（环江县）远房的外甥，过去由于长期不往来，外人不知

陈与我们的关系，因此陈在柳庆党务整理处党训班毕业后被留用，并派到清党委员会工作。据陈讲当天清党委员会秘书梁琼通知他，下午不要出去，有重要任务，并出示逮捕名单。陈看到名单后暗中着急，便借口到柳侯公园取照片（当时清党委员会设在粤东会馆，离公园很近），然后赶到天星巷家里报来讯。

陈走后，二叔叫我立即设法通知大哥，我先到三角地马平县县党部，正好碰到洪惠周（县党部常委），他告诉我大哥吃完饭已去北门外雷王庙农所了；我当即赶到农所，见大哥正洗完澡，准备到黄村农民协会开会。我将情况告诉他，叫他马上离开，当时他尚犹豫。我说：“二叔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二叔交待你可暂时到桃花村佃农何木佑家，因为辛亥革命时大舅宋新洲（又名宋洪，同盟会会员）因进行革命活动被迫捕，也是何护送出境到思恩县避居，此人忠实可靠，并告诉大哥除了重要的保密材料销毁和带走外，其它东西尽量不要动，以免被别人察觉走漏了消息。”大哥当时即从农所走雅儒村渡河到桃花村。我回到家后，二叔要我同三哥（谭健）趁事变未发生前，将大哥所需衣物送到桃花村，并吩咐今晚我们跟往常一样出去玩，以免引人注意，同时交待家里人作好思想准备，不要惊惶……。果然，深夜三时左右，住宅已被军警包围，并进屋搜查，把我、三哥、二叔三人带到潭中路警督处传达室，当时我们还见到陆续带了约百余人进来。拂晓时，军警督察处处长黄勉来了，见到二叔，因黄知道二叔系同盟会老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并早已认识，黄即表示歉意，亲自送二叔出门。

并说：“这事与他们二人无关，下午就能回家……。”等到下午三点，分别把我们喊去，我是由卢东山亲自问话，谈话内容很简单，仅问了我与谭均任的关系，然后说：“此事与你无关，以后知道你哥在哪里就来报告。”然后就放我们回家。事后外面纷纷传说大哥当夜搜捕时是躲在住屋左侧大水沟里，其实不是如此。

此后一段时间里，何木祐怕大哥在桃花村住久了走漏消息，经常将他转移到附近竹鹤村一带贫雇农家暂住，有时我也偷偷去看他。有一次大哥叫我转告二舅娘王受祺及莫美初、陈宏藩三人，叫他们放心！他们加入共产党的材料来不及转移出去，已经销毁了。大哥在何家住了约月余，由何木祐和表姐夫董子轩二人送到思恩县六叔谭展文家中，又住了半年多。

一九二八年六月份，大哥偶然被黄公吾（为雒容黄仲达）碰见，黄即回去告密，当时思恩县县长张达材接到上级电报后，事前曾对六叔暗示说：“传说本地有反动份子……”六叔也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曾与二叙在香港进行革命活动，因此是当地有名望的士绅，一般人都比较尊重他，六叔认为这些人不敢在他家中动手的，所以没有将大哥转移。没想到过了几天，县里趁六叔到丹池公路督促筑路工程之时，到六叔家里把大哥拘捕。六叔闻讯后连夜赶回，并非常震怒说：“谭家的人参加革命的多得很，是杀不绝的……。”张知道后感到此事很棘手，亲托当地士绅叫来说：

“他不知道是六叙的侄儿，事已至此，只有上报时措词温和些，另外报请当局要求将大哥留在当地关押……。”六叔即

派人专程来柳州给我们报讯。二叔闻讯后即去军警督察处见刘克初，据刘说因大哥被捕后未暴露真名，黄勉叫他拟电报到宜北县叫县长余建中前往核实，是否其人？如是，就地处决（余原是马平县公安局长，大哥曾领导柳州郊区农民抗拒苛捐杂税和反对公安局的欺压，进行游行示威和罢市，故余认识大哥）。刘说：“我怀疑是你家的人，因此将这电报压了几天未发出，现在这件事你只有去找黄勉才能解决。”及见黄勉后，黄说：“既然是你令侄，希望你到上面去打通，此事就好办了。”家中如是将所有祖遗存的一点产业变卖，由我母亲两次抱病赴邕，找大舅娘刘家桐等人活动（刘原为廖仲恺秘书，当时任广西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部长），这样事情才能有所缓和。在这期间，省令把大哥押回原籍，六叔闻讯后以为有变，准备武装在押解途中营救，后来听到事态有所缓和，并接到柳州家中消息后，才停止活动，并亲自护送大哥回柳。

一九二九年八月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发动政变，释放政治犯，我大哥始获释放。

中国工程师学会

广西考察团在柳州

(1935年)

陈 铁 生 整 理

一九三五年夏，中国工程师学会应广西当局的邀请，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广西各地进行考察，也到了柳州。本文根据有关资料，将这次考察团柳州之行的情况及其影响加以综述，以供存史修志之用。

资料来源：

一九三八年版《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报告》；

《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

一九四三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柳州分会编的《柳州一瞥》。

一：考察团组织缘起

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于一九一一年，一九三四年八月该会在山东济南举行年会，广西会员参加的有何栋材、张文奇、叶彬等人。会议期间，以上诸人代表当时的广西省政府

向学会提出：拟请明年的年会在广西举行，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会后不久，广西省政府化学试验所主任李运华致电国立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说，省政府准备聘请他赴广西指导工作三个月，顾认为个人力量有限，建议改请中国工程师学会，由学会组织专家对广西作较大范围的考察和设计。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覆电赞成这一办法，于是经中国工程师学会董事会讨论并同意，在一九三五年组织成立了广西考察团。几经磋商，决定考察的内容为化工、电力、电讯、机械、公路及桥梁、水利、市政、土地测量、矿冶地质、桐油 共十项。代表团人选为：

恽 震	电力	建设委员会全国电
		气事业指导会委员主任委员
胡博渊	矿冶	实业部简任技正
		前矿业司司长
何之泰	水利	全国经济委员会
庄效震	公路桥梁	江苏省建设厅技
		正前中央大学土木系教授
赵曾珏	电讯	浙江省电话局局
		长兼总工程师
贺 闾	桐油	实业部汉口商品
		检验局技正兼组长
张洪沅	化工	南开大学化学工
		程系教授
方颐朴	土地测量	国立北洋工学院
		木工系教授

沈乃菁 地质矿冶 四川省建设厅技

正前北洋工学院教授

庄前鼎 机械 国立清华大学机

械系主任

顾毓琇 电机 国立清华大学工

学院院长

以顾毓琇为考察团团长，考察时间暂定为一个月，考察结束后就地参加当年的六个学术团体（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国化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联合年会。

二：在柳州的考察经过

考察团成员分散于京、津、宁、汉等地，学会通知他们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九日到梧州集中，成员齐集梧州那天，由马君武等人陪同参观了广西大学、榨油厂、硫酸厂，二十日参观了电力厂和自来水厂，当晚乘轮赴邕，二十三日晨到邕后，受到雷沛鸿等人的欢迎和李宗仁、黄旭初等人的接见，以后的两日内各成员均在邕参观及讲学。二十九日考察团到了柳州，当天即参观了电力厂、电话局，三十日参观了酒精厂，并实地研究鸡喇附近的水电设计情况。三十一日到沙塘，由伍廷飏带领，参观了当地农村建设试办区，下午实地研究了沙埔河水电设计情况。

八月一日考察团到桂林，七日又返柳州，八日参观柳州航空学校及机械厂，后即离开柳州回邕参加八月十二日在那里举行的六个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十九日离开广西，时间恰

好一个月。计这次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共两次到柳州，对柳州市政、水利、工厂、农产等情况作了较深入的考察，提出了在当时具有相当参考价值的意见。

三：对柳州的考察情况

考察团各专家在广西的考察后均有报告。

广西电力的情况由恽震执笔，其中柳州部分摘要如下：

柳州官商合办电灯公司创始于民国五年，厂址设在斜阳路，厂长杨逢倡，机力甚小。至十六年，机量九十瓦。建设厅长伍廷飏氏收回官办。十七年柳州大火，公司产业几全毁。十八年电灯改为地方维持。二十三年，地方维持之力亦穷，县政府及公司皆愿广西电力厂接办，旧机由公司自行处置出售。电力厂出资五千元，旧公司股东出资一千八百元，付还地方了结债务。电力厂由梧州移来二百瓦柴油机一座（三汽缸、立式、德制，已用七年）于柳州西门外雅儒村西来寺东面设新厂……大部分负荷即在城中过江用英规七根十六号铜甲电缆一千八百尺过柳江供电。油机估价毫洋五万元，新厂及外线设备投资六万元，共计十一万元。

新厂于二十四年五月间发电，八月初已有电表用户二百五十户，不久可再加六十户。包灯制完全取消。路灯已有二百五十盏，拟再加一百盏。每日平均发电六百度，线路损失15%。七月间收入已达三千五百元。支出甚省，仅二千五百元。营业章程分厂与总厂（按：指设在梧州的广西电力厂）完全相同。电气方式为交流三相五十周波。用户电压三相四线二百二十伏及三百八十伏。与中央标准相符合。

分厂设经理兼工程师一人，由梁君鸿飞担任。此外会计

员一人、出纳兼收费一人，簿记员、文书员、材料庶务员、稽查员兼抄表员、书记各一人，工匠及学徒七、八人，共计十六人，薪工合八百元。如此组织简单、效率甚高，商办公司实所罕见。装灯商店现有四家，由电力厂监督，柳州虽预定为工业区，但用机械动力者绝少，故电厂亦无电力用户。

〔按：《从柳州一瞥》一书中“工厂概况”一节亦有关于柳州电厂情况的简介，可作上述的补充：该厂民二十七年增装二百五十和二万马力油炭两用机一部，抗战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广西省政府为应需要起见，联合办该厂，于三十一年一月成立，接收前厂继续营业，并择地建厂，筹装二千瓦透平机一部。土木工程于三十一年十二月动工、装机工程于三十二年六月开始，预计年底装成发电。厂长为宋廉生。〕

恽震在谈到柳州动力资源的开发时设想道：柳江东北流去，绕一百七十余里之大湾，此大湾水急滩多，如于陆地上划一直线，由太平圩至鸡喇约六公里，或通沟管、或开河道，上游设坝，下游建厂，水力当有可观，此一直线之捷径，现为牛车道，两旁石灰岩峰耸峙，中间广阔平坦，工作不难，又三都流入柳江之小河，在鸡喇附近已有人建一拦水坝，冀作大规模舂米厂之用，但因不识工程原理，设计施工均不妥善，以致水冲坝倒，前功尽弃。据云已耗去二万元。伍廷颺先生导往沙塘六十里外视察沙埔河之上游急湍，其地曰白马山，河床倾斜度甚大，筑坝引水工程皆较易。

广西电讯考察由赵曾珏执笔，其中柳州部分摘要如下：

柳州电话局交换机系200门单式磁石机，军政机关28户，普通用户28户，总计在河北之用户129户，河南之用户47户。

军政用户月纳租费八元，得自由接通长途电话，不另收费，普通用户月费六元，如接长途电话须每次另行纳费。据二十年份以来统计，柳州电话局利用长途及乡线电话转递电报的年总字数为六百二十四万余字，其中年商报字数为四百四十余万字，年官报字数为一百七十八万余字。商报占发报总字数的71.5%。柳州至南宁、桂林、桂平、长安镇有长途电话可通。桂省现有之长途电话网，似以柳州为中心局。南宁虽为管理局所在地，但照目前线路之布置实失去其省中心局之资格。

另外赵曾珏对柳州的人口、工商业情况也进行了考察：

据统计一九二七年柳州每平方公里人口数为72人，一九三二年为49人，五年内人口呈减少状态。工厂数为318人，商店数为622人。

广西机械情况由庄前鼎执笔，其中柳州部分摘要如下：

广西机械厂设于柳州鸡喇，内部工作分飞机修理与装配，发动机修理，炸弹制造三部分。计有接焊部、翻砂部、金工部及木工部。机架用美国及土产桧木制造，设计参照英国式，螺旋桨即用桂省所产之苦楝木制造，发动机购自国外。所制空袭炸弹计有二十磅、五十磅、一百五十磅数种，全厂资本四十余万元，工人一百七十八人，自备有一百马力之蒸汽机及五十四瓦发电机一座。〔按：《从柳州一瞥》中“工厂概况”一节亦有广西机械厂的简介，可作上述的补充：该厂于民国二十五年由广西省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实验工场改组而成，原名南宁机械厂，直属广西省政府，后迁柳改名广西机械厂，三十年冬拨归广西企业公司。该厂设备有车

床十九部、刨床二部、万能铣床二部、大钻床四部、锯铁机一部、企部铣床一部、火石机二部、冲床螺丝机、刨板机、飞车锯、带锯、熔铁炉各一部，木工车床二部、鼓风机二部、发动机方面有柴油机三部。出品有各种车床、企头铣床、牛头刨床、各种钻床、手摇钻床、手摇双同气泵熔铁炉、鼓风机、批士钳、榨蔗机、手摇面条机、手摇水泵等，经理为罗赞之。〕

广西酒精厂民国十六年起即行筹办，二十年开工，为中国创办酒精事业之大而最早者。厂址设于柳州鸡喇，资本三十八万元。内有四十马力蒸汽机一座，十二瓦柴油机一座。酒精制造部分机械有洗薯机、压麦机、蒸煮及糊化锅、初溜机、精溜机及分离机等。制成酒精即装诸酒精桶内或存储仓库，酒精桶亦在本厂制造。有制罐机器数具。此外尚有冷藏机为调节发酵温度之用。制造酒精原料为糖渣、桔水、糖蜜、蕃薯、玉米及小麦等，大部在柳城附近采购。每日工作十小时若需蕃薯一万斤或糖渣数千斤，制成酒精一千二百斤，每月出品约三万余斤。从前大部出品运销广东，但至去年正月广东酒精厂完成开工后，铁路断绝，存货日增，现存酒精十五万斤。厂内技师现正提倡试用亚可林，系以酒精70%和以汽油30%而成。广西道路局亦增拨车试用亚可林，成绩极佳。但因现在用蕃薯制造酒精之成本甚贵，比之市价汽油相差无几，故未尝普遍试用。〔按：据《柳州一瞥》中对酒精厂的介绍与上述大体相同，不同者记正式成立营业时间为民国二十一年。有补充者为：三十年十月广西企业公司成立，省政府将该厂全部财产价拨公司接管。抗战军兴，因

出品关系国防需要，制成品剧增，大部分销售于省内外军事交通机关，有供不应求之概。该厂经理为刘伯文。]

广西化工考察为张洪沅执笔，其中柳州部分摘要如下：

广西农村建设试办区为桂省营之最大农场，占地二千一百余方亩，初名广西垦殖水利试办区，办事处设于柳州附近之沙塘，由前广西建设厅厅长伍廷飏主持。试办区中办有各种农场，规模宏大，成绩卓著。此外尚有学校、工厂、公店、仓库、金库种种组织，二十三年复移他县过剩人民二千余口分驻区内从事垦殖，试办区中经费多可自立。区内主办之糖厂、油厂共有四处，俱系土法榨取。柳州及其附近为广西产糖区，本地所产竹蔗，不如台湾、南洋糖蔗之佳。区内农场雇有台湾技师三人，试种台湾蔗、成绩良好。广西糖厂原拟设于柳州，并拟在试验区内种蔗万亩以作原料之需。今年前降霜，蔗农稍有损害，遂迁于贵县。然因区内产糖甚富，现方筹备在无忧（地名）建一较小糖厂。

广西桐油考察由贺国执笔，有关柳州部分摘要如下：

柳州除省政府经营之柳州林场外，私人植桐公司不少，统计如下：

民生公司在柳州陇浪水山植桐四十万株。

六合公司在柳州三门江西岸植桐二十六万株。

厚生公司在柳城长塘凤凰岭植桐二十万株。

茂森公司在柳城长塘梳妆岭植桐二十万株。

广林公司在柳州林场前及立冲对面试植桐二十万株。

祝成公司在柳州水槐地方植桐十万株。

共和公司在雒容十二湾植桐六万株。

上列公司共有桐树一百四十二万株，大半皆未成年，广西省原有成年桐二百万株左右，数年内上列各公司之桐树成年后，广西桐油产量增加70%当属意中事。加之柳州桐油运输较便，运费较轻，如欲设立桐油榨厂当以柳州为最适宜。

广西水利航运考察为何之泰执笔，其中柳州部分摘要如下：

据统计柳州航运有货船八艘，柴船二艘。梧州至柳州航线现有轮船十艘，船名分别为新广财、新东和、新兴利、新业安、利行、安顺、启泰、马临、泰平、建昌。柳州至长安轮船三艘，船名分别为广利、广昇、融安。

柳州附近多河流，可以利用水利发电者颇多，如三江河，平均流量约为四秒立方公尺，其下游三里一段，原有滩十余处，水面落差共达二丈许，据居民告称，昔有黄某者，谋利用三江河之水力发电，变卖家产筹资万余元，于三江河口筑拦河坝，工未完成，即因被水冲毁，且款已用尽，致告失败。黄某所筑之坝名曰响水，今其遗迹犹存，令人目睹兴叹。柳江河自柳州至鸡喇一段，河身曲折殊悬，河长七十里，直距仅十里，据省政府调查报告，两处水面落差约为2公尺，河中平均流量为100秒立方公尺，若在柳州附近筑活动水坝，于太平墟至鸡喇开凿运河，设水力机于鸡喇，可得水力二万马力。惟查太平墟至鸡喇，地面高于中水位不下五丈，地质多系岩石，开凿渠道石工艰巨，又柳州附近河道宽且深，坝工尤费，恐不经济耳。

四：考察团活动对柳州的影响

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到柳州考察，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意见，也推动了中国工程师学会柳州分会的成立，分会成立于一九四一年五月，推举茅以升为会长，宋廉生为副会长，最初的会员有侯家源、程孝刚、胡瑞祥等近五十人。当年即举行了数项学术讨论会，第二年会员发展到近七千人，第三年增至八十人，其中土木系、机械系各为三十余人，电机系十人，化工系六人。

一九四三年九月柳州分会为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二届年会在广西召开后，将有部分会员到柳州参观，特编印了一本《柳州一瞥》，从沿革及形势、交通、工厂概况、矿产、农产、商业、水力水利、名胜等八个方面对柳州情况作了简介，其内容可视为《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报告》的续篇，成为了解四十年代柳州情况不可多得的文献。

柳州机械厂大事记略

（解放前部分）

一九二七年 十二月三日，柳州机械厂筹备处成立，省建设厅委陈士廉为筹备处主任。

一九二八年 春，破土动工建厂。

四月，陈士廉主任到上海订购机器，十月运抵柳州。

一九二九年 元旦，开工生产，从事普通机械及军工设备修理制造。

二月二十六日，省建设厅委陈士廉为柳州机械厂厂长。

五月，因蒋桂战争影响，工厂停工。

一九三一年 十月七日，省政府决定恢复柳州机械厂，改名为广西机械厂，委黎国培为主任。

十二月，省政府将梧州造币厂机器拨交广西机械厂。

一九三二年 五月九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伍梯云及由广东省名流组成的“广西旅行团”到厂参观。

十一月，上个月迁柳的广西省建设厅航空处移交军方，广西机械厂归属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航空管理处，更名称为“航空机械厂”。修理航空处损坏之飞机。

十二月，计划装配飞机。

一九三三年 一至五月，工厂完成机枪装弹机27套，山炮表尺8套，飞机发动机试验台1座，飞机机身砌装架1座，修复“亚维安”初级教练机2架，自制车床1部，修好报社印字机1架，开始制造机关枪零件箱，继续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

五月八日，美国驻粤总领事巴伦丹夫妇，德国驻粤总领事华根约夫妇，以及广东实业界人士，一行八人到厂参观。

六月二十四日，经过三个月的努力，自制成功第一架单翼初级教练飞机（发动机购自外国）。下午五时，航空处派英国教官钟士（译音）架机试航，白崇禧、廖磊（第七军军长）到机场观看，飞机升降徐疾均极灵敏，时速达95英里。

十一月四日，制造装配完成五架“亚维安”初级教练飞机，并由广西航空处派飞行员驾驶飞到南宁，于次日（五日）中午，在南宁飞机场上空作飞行表演。李宗仁总司令、白崇禧副总司令、黄旭初省长均偕夫人前往观看。

十一月二十七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派兵器研究委员王云陪同汤仲明先生到厂协助改造木炭汽车。

十二月下旬，制造成功20磅、50磅空袭炸弹。

十二月三十一日，制造成功两台木炭机，并利用木炭机改装汽车一辆。该木炭机汽车驶到南宁，李宗仁总司令亲笔书写“木炭车”三个字贴于车上，并与白崇禧副总司令等乘坐该车，在南宁市内巡行一周。

一九三四年 一月，制成“亚维安”“吉的”新式双翼教练机各一架。

二月二十七日，著名学者梁漱溟到厂参观。

四月十日，加拿大中国学院院长兼美京国会图书馆顾问江亢虎先生、云南教育厅厅长龚仲均及随员二人，由第四集团军总参谋长叶琪陪同来厂参观。

四月十四日，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柏士德及其旧友晋子寿来厂参观。

六月九日，赴欧美考察航空事业的工程师陈国梁设计的鸟形机（滑翔机）制造成功。该机从设计到制造完成历时约五十日。

一九三五年 一月，航空处归并广西航空学校，航空机械厂更名为“广西航空学校机械厂”。

一九三六年 五月十九日，熊佛西由省府专员孔繁昆陪同来厂参观。

一九三七年 春，工程师朱荣章自行设计制造成功第一架单座驱逐战斗机。被称为“朱荣章号”。

四月二十九日，广西航校召开航校成立三周年纪念日暨第一期机械兵入学典礼。“朱荣章号”由飞行员陆光球在柳州机场试飞，高度为五千五百公尺。白崇禧到机场观看。

八月，因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中央笕桥航校西迁到达柳州，为了统一抗战，广西航校奉命并入中央航校，广西航空学校机械厂改名为“航空委员会第九飞机修理厂”（简称“九厂”）。黎国培调走，朱荣章接任厂长。

一九三八年 厂长朱荣章调走，林镇泰接任。

一九三九年 十二月，派员到贵州等地择址准备迁厂。

厂长林镇泰病故，余培接任。

一九四〇年一至二月，在桂林甲山成立修械所，修理抗战中损坏的飞机。厂本部亦为前线修理各种飞机。

一九四二年 厂长余培调走，李颐康接任。

一九四三年 在贵州清镇建厂房。

一九四四年 厂长李颐康调走，杨宏瑞代理厂务。冬季，大部份设备人员撤离柳州，九厂在清镇开始工作。徐学洛接任厂长。

冬末，日寇占领贵州独山，滞留独山待运的少量设备遭受损失。厂长徐学洛调走，欧阳绩接任。

一九四五年 日寇投降后，厂长欧阳绩调走，杨宏瑞代理厂长，处理“九厂”遣散事宜。大部份人分别调往北平、上海、武汉，部份人员回柳州。

一九四六年 广西省政府决定重建广西机械厂。

八月七日，省政府派余培任筹备处主任，改名为“广西机械铁工厂”。

一九四七年 筹备工作就绪，开工生产。

四月四日，省政府正式任命余培为“广西机械铁工厂”厂长。不久调梁雄接替余培任厂长。

六月十三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署长黄荣华主持成立广西农业机械公司筹备处。

一九四八年 五月二十九日，黄荣华与善保会及中国农

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在上海签订合同，公司定名为“柳州中国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简称“柳州中国农业机械公司”。

五月底，国防部将位于鸡喇的空军“九厂”占地700余亩拨还广西壮族自治区，省政府转拨还柳州中国农业机械公司。

六月十五日，黄荣华在桂林主持召开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由总公司指定和股东选举产生董事十五人，监察五人。

七月一日，柳州中国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黄嵘芳任总经理，董事长由上海总公司的总经理林继庸兼任。公司在柳州鱼峰路6号办公。

八月二十五日，广西机械铁工厂并入柳州中国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十月二十二日，召开第二次董事监察联席会议，总经理黄嵘芳报告公司业务概况，提出十月至12月制作十二匹马力木炭机两套。会议通过了“柳州中国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一九四九年 一月二十日，公司由鱼峰路6号迁到鸡喇厂部办公。在鱼峰路177号设立营业处。

六月初，厂内主要道路桥梁相继竣工，分别命名为生产大道、农业大道、机械大道等。两座桥称为善济桥、保济桥。

七月一日，举行公司成立一周年紀念活动，黄嵘芳发表《改良本省农业机械问题》一文。

十月底，解放军逼近桂北，公司将专作修理汽车的工程

车以及载重车、小吉普共十辆、装上机器、精密工具转移至南宁，办起汽车修理厂。

十一月三日，总经理黄嵘芳离柳去南宁，公司交由业务部主任韦绕亮代理。

十一月三十日，总经理黄嵘芳由南宁乘飞机去香港。

十二月二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派教导员张海亭带队伍进驻公司。

十二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柳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军代表马述古及联络员方禾、夏俊和、程雪龙、徐业生等人来正式接管公司。

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工人代表、军管会联络员及保管人员组成清点委员会，开始清点物资。

我所了解的早期柳州机械厂

伍廷流

1988年是柳州机械厂建厂六十周年。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能遇上这个大庆日子，真是荣幸极了。抚今忆昔，本厂初建时的面貌，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创业维艰，前辈功劳大有可书可颂之处。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领导之下，本厂日新月异，把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落后面貌，改变成为一个遐迩知名，初具现代化规模，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大厂。这种巨大的变化，实在令人喜庆。

本厂于1928年建成厂房时，设备尚未安装齐整，因两广战争，被迫停建。两广战争结束以后，广西筹办广西航空学校于柳州，便把广西机械厂（战争后恢复工厂时改的厂名）划归广西航空学校作为修理飞机的专门工厂。1936年4月，航空学校机械厂招收第二期学徒班，在表哥冯璜（当时是航校副校长）的鼓励指引之下，经过考试，我终于进入了这个机械厂。当时族叔伍朝南、伍朝册、族兄伍廷均系自1929年以来便参加广西机械厂的工人，工余之暇，对我叙述广西机械厂及航空飞机修理厂的情况甚详。现将耳闻目见略述于后。

1926年（即民国15年），广西有一个安定时期，桂系军政领导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规划了一个建设广西的蓝

图。执行这项建设规划的是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建设厅长伍廷飏。广西机械厂是建设项目之一。

柳州机械厂创建时，是计划建设为专搞各式农业机械的工厂的。厂房所需的砖料，均为拆除柳州城墙的火砖运到厂区使用。其它铁皮瓦面、角铁桁担，均由德国购来。

房屋方面：初建时只有两个大工场，一个是铸工和锻工联合厂房，另一个是机械加工和钳工厂房，中间排列一座三层楼房，底层为材料库，二楼为厂长办公室、总值班室，绘图室，三楼后来为飞机仪表检修室。紧接这幢楼后面，则为动力房和电工室。另外工厂还建有工人宿舍（即现在二层楼的旧招待所）一幢，现在锻工冷作车间当时为学徒训练班宿舍，学徒教室和食堂分别为现在的厂警队部和小工厂，青年桥地带建有职员宿舍数小间，厂房东北边缘建有数小间宿舍，作为技术干部午休处所，警卫人员则住现铸工厂房后的瞭望楼。自归属航校后，则新建了两座厂房，与原来厂房相连，作为飞机装修停放处。日本投降后，筹办农械公司时，在厂房东北边缘一带，建有小楼房一间，作为美籍顾问住地，学徒教室则改建为经理住地。

设备方面：一些金属器材和机床设备，由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博士向在德国的亲友先行代为贖购。当时购有小型动力蒸汽锅炉一台、发电机组一套、六呎皮带车床四台、中型龙门刨床一台、立式铣床一台、小型牛头刨床一台、大钻床一台、小钻床一台、电焊机一台、气焊机二台，还有一般小型工具。归属航校后，所需各种工具器械，则另向日本、英国、美国购来。自行装配的亚维安教练机，其零部件则向英

国购来安装而成。装修好的飞机，用汽车拖拉到航校飞机场去，由航校专职飞行员试飞，经试飞合格，则正式移交给航校使用。

人员组织方面：当初厂长为黎国培，在抗日战争将开始时，厂长为朱荣章。抗战开始后，广西航校改属中央统一领导，厂长则为中央派来的（林镇泰）。厂长之下分三个科，即：飞机修造科，科长李德生技正，是留学美国的，科员有罗锦春、马介民，是由广西大学中选送香港英国远东航空学校学习的，还有航校第一、二期机械训练班的郑一锬等技佐，约十人左右。机体股长林兆祥，为留学日本的。发动机股长何兆麟，为航校机械班学员。器材科有科员五人，除了机械修造加工和器材之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总务科负责。总务科长冯汉才，科员不到十人。学徒训练班教导主任李德生兼，副主任罗锦春、马健民兼，机体装配教官林兆祥兼，发动机教官何兆麟，郑一锬等人则兼技术程课教官。全厂机械工作人员约三百人左右，普通工人和医务人员等不到五十人，全厂总数不超过四百人。在航校开全校扩大纪念周时，我们则提早步行前往飞机场参加，有时在本厂开纪念周会上，冯璜校长也来参加训话。

生产方面：属广西航校时，工厂以修理由英国购来的“亚维安”初级教练机为主，有时也修理日产“九一型”和“九二型”高级战斗教练机，也有由英国购来“亚维安”部件和器材自己制造装配机体。抗战开始后，本厂改编为第九飞机修理厂，原“亚维安”、“九一”、“九二”及“朱荣章号”

一概归五路军前线使用。本厂修理的则为中央航校购进的美制“弗力提”初级教练机，“达式”“北美”中级和高级教练机，“霍克”高级战斗教练机等飞机。

朱荣章是留学美国航空专业的技正，他工作时很沉静，上班时不跟别人闲谈，经常见他伏桌思索问题。当时他发现工场存有一台尚可使用的飞机发动机时，即根据该发动机的马力，设计一架战斗机，经过几次修改，在一年时间内，成功制造出一架战斗机，试飞合格后交给广西航校，人们都称该机为“朱荣章号”这是人们对他的贡献表示的敬佩。其后他被提拔为厂长，抗战开始不久，他就回美国去了。

抗战开始后，中央航委会对工厂进行了改编。机械人员廖国达、黄耀芳、陆济普一批约十余人，调到空军部队去；陈家俊、黄龙、黄汝珠、黄汝岳调到滑翔机学校；梁寿祺、梁奕衡等十多人，随广西航校中级班调到昆明成立一个飞机修理所，我本人和黄杰宸、李启和、凌东平、邬启珍、关佛保、陈彩如、陈雄光、吴歧、熊峙、陈劲良、叶万全等十二人调到昆明空军军官学校中级班工作。

到昆明后，一九四一年，我辞去空军部门，到地方交通运输部门工作。日本投降后，我辞职到广西梧州。一九五三年又回到柳州，并在第二年经友介绍，重新回到本厂，于检查科任专职性能验收工作，一直到一九八四年退休。

以上是我的回忆，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本人年龄大了，难免有记错记漏说不清的地方，只是写出供大家参考罢了。

（柳机厂长办供稿）

广西航校的自制飞机

朱荣章

在未讲本校机械厂自制飞机之前，且让我来一讲厂中修理飞机的情况。当民国二十一年的冬季，我开始参加本校机械厂的飞机设计工程的工作，同时开始计划修理飞机。说起修理飞机工程，我觉得无论它的构造是如何复杂，但依据学理照样修配，而又能慎重的精选材料，是不会错误招致危险的。厂中的修理工程，固恒视乎它的损坏程度如何而定，同时也注意到它的损坏地方能否适用国产材料。故此本厂的修理工程的一般材料，不一定专靠着舶来品，实则国产的材料，如木、锡、布、铜、颜料等之类，多用国产材料。盖以其成本轻而耐用，较之舶来品经济得多。不过在国内还没有钢铁厂及制铝厂之时，不单是本校机械厂要靠大宗的舶来品，即国内一般同样的工业未尝不然，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本校机械厂的自制飞机，在二十一年十二月左右即经开始计划制造了。当时本校着重人才训练，故练习机之需要，自不待言。于是就有单翼初级练习机的出现。一般的取材，除发动机、钢筒、钢线、铈、铅、仪器、着陆轮等之外，应用国产

材料殊为不少。自此以后，便继续不断的仿造。关于本校的吉狄、六二六、亚维安等机如是之多，皆由自制。当然，本校的机械厂乃纯为本校自身的需要而设。本校需要何种机，便设计制造何种机，以资应用。例如目前需要战斗机，那末，本厂自制的新式双翼单座位战斗机，就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了。现时正在积极的制配中。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明为何要制造一种机。因为在未计划制造此轻便新式战斗机之前，我们是曾经决定计划，以六百五十匹马力的发动机来制造一架重量之大战斗机的。可是本校机械厂缺乏此种重量机身的材料，所以才有改制这种最新式而轻轻便之双翼单座位战斗机的计划。这种机很适合于战斗的练习，电油的消耗也很少。它的特色，就是上部翼长而大，下部翼短而小，是利于俯视，而着陆准确。它的装配除应该具备的仪器等之外，于左旁并装置有 Vicker's 机关枪一架，它的速度，以 260 H.P. Cheetak (Armstrong Sliddeley) 发动机来装配的。计算可能的速度每一小时约为一百七十余英里，升降之快，每分钟约一千四百尺。若作高空飞行，则可达二万尺左右。每一小时电油的消耗，约为十二至十三加伦。它的着陆器亦具有操纵快慢的自由。飞机坠降时又有上翼自动的保险掣。尾部的安定翼之上下高低的角度的，亦可随心所欲，上可至四度左右，下可至三度左右。机身的形状是流线式的，机头盖之构造，足使机飞行时比普通的约快六至十五英里。因系采用 N.A.C.A. Cowling 形式。至于滑油箱的制造，则加用风筒穿插其间，使滑油能够易于变冷。电油箱的装置，则不用打电油器。因有了这种装置，电

油的流动是可以自动的。至于调整飞行速度之快慢，则采用空中掣。此种空中掣系装置于下翼部份，可随时操纵机的快慢。这种器械，在国内尚未多见。总之，本校机械厂自制飞机的计划，在计划工程上虽不能说是发明，但在装配上的设计是与普通飞行机不大相同的。

关于本校机械厂对飞机的修理与制造的情况，这里为了时间和其他关系，不容我们有详细的叙述和研讨，只能这样简略的说一下。总之，在设计修制工程方面，现已略具规模，没有什么难于解决的问题。所引为憾事的，只是经费不足，和一般材料之来源比较困难而已。所以不能大量生产。虽然无米之炊，难为巧妇，但我们对于材料方面能够善于爱惜与利用，所以在本省经济情形之下，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也还能得到相当的成绩。今后能够一致努力下去，以图发展，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二六、一、十三于机械厂设计课

（原载1937年《广西航校校刊》

原题为《我校的自制飞机》）

机械厂自制战斗机

“朱荣章”号

陆光球

一九三六年“六一运动”，这是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与广东陈济棠借抗日为名实行讨蒋的一次历史闹剧。后因广东陈济棠内部被蒋介石分化瓦解，广西势孤力单，乃与蒋妥协。自此蒋利用“中央”外交大权对广西的进出口物资实行严格控制，广西原与西欧及日本的军火交易完全被堵死，广西航空学校所使用的作战飞机自此来源断绝。怎么办？自制吗？广西当局把出路完全寄托在柳州鸡喇飞机修理厂的工程师朱荣章肩上。

朱荣章，广东四邑人，曾在美国飞机制造厂服务过，见过飞机制造的全过程，但从未参与过飞机设计工作。而且当时鸡喇工厂的设备简陋，连最起码的风洞试验也没有，自制飞机谈何容易？！朱荣章平日不爱说话，对于上面交下来的任务能否完成从不吐口，只凭以往的所学所见用脑去思索各种可行的方案，自己对自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什么叫做自制？朱荣章联想到自己在美国飞机制造厂工作所见到的情景，体会到所谓自制，实际是指最后成品是自制的，至于组成后成品的各种零部件是否也是自制，那就不

一定了。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出产的飞机，其中很多零部件都不是自制，而靠向其他工厂买来的，但谁也不否认这些飞机是飞机制造厂的产品。于是朱荣章把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自己进行组合安装作为设计的出发点，着手在柳州鸡喇飞机修理厂自行制造军用战斗机。

飞机制造是先按机身、机翼、机头机尾与着陆架几部分来分别设计的，最后才用各式各样的连接结构组装起来。当时广西能够从香港进口英国飞机发动机，只有星形七气缸发动机一种，350马力。所要设计的飞机性能，只可依此为据。朱荣章十分清楚，要使350马力的发动机发挥最佳的效能，飞机外部的流线形结构是整个设计的着眼点。经过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分析与对比，朱荣章终于从自己亲手绘制的上百张设计图案中选定了所需的制造蓝图。

按照正规的飞机制造厂来说，设计与制造是互不渗透的两个职能部门，各按自己的职能范围行事。当时广西航校机械厂不过是一个小厂，哪里分什么设计与制造的界限？朱荣章既是设计者，也是制造的总指挥。在制造的过程中，每一件原材料的选用与检验，每一块部件的形状与尺码，每一个仪器、仪表的位置与安装，每一处连接部位的定型与焊接，事事都要朱荣章亲自动手，亲自作试验。朱荣章不但在设计过程中挖空了心思，而且在制造过程中也是废寝忘食，忙得不亦乐乎的。

由朱荣章带头，经全厂员工合作，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终于在一九三七年春自制成功了第一架军用战斗机——双翼单座驱逐机。

新机定于广西航校校庆纪念日由飞行教导第一队副队长陆光球首次试飞。按当时情况，新机设计者朱荣章本来不是专业的设计师，新机试飞者陆光球更不是专业的试飞员，他们两人对于新机如何试飞，根本提不出什么象样的具体计划。在朱荣章看来，只要这架新机能够平安的上到天，平安的下到地，这就是最大的心愿了。在陆光球看来，这架新机虽然没有经过风洞试验，但只要不出什么大的怪毛病，再难驾驶也不怕，一定要把它好好的飞上天，好好的落下地。这就是他们两人当时的心里活动了。

试飞开始，陆光球先把飞机在机场里（当时柳州机场是草地机场，没有跑道）作各种地面滑行试验，由慢速、中速、快速而后左右转弯、单轮刹车、双轮刹车等等，飞机都很听话，未发现有任何怪脾气，陆光球多少减轻了一些对飞机有无怪毛病的顾虑。接着，陆光球把飞机滑行到机场的尽北头（当日南风），对着正南方向摆正飞机后，首先试一试飞机起落的动作。随着油门逐渐加大。飞机的滑跑速度也越来越大了，陆光球一面把驾驶杆向前推，一面保持飞机的水平滑跑姿势。当飞机滑跑到最大速度时，陆光球只轻轻的向后拉驾驶杆，飞机便很轻松的离开了地。不歪不扭，非常听话，陆光球感到很满意。飞机刚刚离地约一、二米，陆光球又把油门关闭，速度迅速消失，飞机很快接地，陆光球趁机会做了一次着陆的动作。说也奇怪，这样的着陆，前面可供滑跑的距离还够用吗？不用担心，陆光球连刹车都用不着，飞机滑跑终止的地方距离机场边界还远着呢。可见这架飞机的脾气是十分顺从人意的，陆光球心中的一切顾虑就此完全

打消了。

经过前面种种摸索之后，陆光球才把飞机滑行到起飞的位置，就象驾驶其他飞机一样加大油门起飞。飞机滑跑距离不到二百米就离地了，爬高性能很好，真可以和当时广西航校所使用的日本造“九一式”战斗机相媲美。在爬高过程中，陆光球这时心情才安定下来，才有时间去思考所要试飞的项目。飞机不知不觉爬到了三千米，这时陆光球所能想象出来的试飞项目也不过是一些特技动作罢了。于是翻筋斗（looping）、慢滚（slow-roll）快滚（quick-roll）、因麻门（ema-men 人名）、侧滑（side-slip）、尾旋（tail-spin）等等，凡是“九一式”战斗机所能做的特技动作，陆光球都不止一次的做过了，原来飞机的特技性能也很好，陆光球更加满意。还有什么要试的呢？啊，对了，飞机速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数据。于是陆光球把发动机调整到正常转数，测出飞机的正常速度为每小时180公里。然后逐渐减少发动机转数，用较小的转数来维持飞机平直飞行，这时测出飞机的最小时速在80公里上下。最后完全关闭油门，速度表指针迅速减退，当指针退到每小时60公里时，飞机开始下坠，这就是失速速度。做完正常速度、最小速度和失速速度测验之后，陆光球又把发动机开到最大转数，飞机速度随着渐渐加大，达到时速220公里就再也增加不上去了，这就是飞机的最大速度。还有一项数据，就是这架飞机的升空限度必须测出来，于是陆光球用最大的仰角进行爬高。由三千米爬到五千米颇不费劲，但从五千米开始，飞机升高的速度明显的迟缓和了。到了五千五百米，不但飞机再也升不上去

了，飞行速度也越来越小，机翼下面各种地形地物的偏移已经近乎停止，人坐在飞机里感到身体好象失去了重心一样的飘飘然，这大概就是飞机到达了临界高度的警告吧！陆光球只好立即停止试验，随即一连做几个半滚（half-roll）就下降到了低空。看见机场上人头攒动，盛况空前。为了助兴，陆光球又对着机场做了几次俯冲与突攀（dive & Zoom），之后进入航线着陆，着陆情况也十分良好。

试飞当天正是广西航校的校庆，白崇禧特地从南宁到柳州来主持庆典，新机试飞当然也是庆典的内容之一。起初，当陆光球把飞机在机场里转来转去，试试这、试试那的时候，白崇禧和在场的一帮要人都有点儿不大耐烦，觉得太磨蹭了，甚至怀疑陆光球是不是不敢飞？特别是陆光球在飞机离地一、二米之后又落下来的一瞬间，他们不知出了什么事故，都以为试飞失败了。及至陆光球又飞上了天，并在他们的头顶上做了各种特技之后，他们才转忧为喜，个个笑逐颜开。所以当陆光球着陆后把飞机滑行到停机坪的时候，白崇禧显得十分满意的样子，带领着航校校长冯璜、教育长李凌云等一帮官员向飞机走过来，原来他们要与设计师朱荣章和试飞员陆光球在机前合影留念。

以上就是本厂自制战斗机从设计到出厂的经过。不久，“七七”事变起，这种新机还没有来得及成批生产，抗日战争已进入高潮，自制飞机的任务就此结束了。抗战初期，这架唯一的本厂自制战斗机也曾与其他战斗机一起，担任过祖国上空的空防任务，为抗日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值得称赞的事儿有三：其一，这架新飞机的外部造型与

后来抗日战争中所见到的苏联造“U—15”式战斗机何其相似乃尔！这是朱荣章摹仿了苏联人还是苏联人摹仿了朱荣章？抑或是他们都找到了战斗机造型的共同诀窍，因而设计出来的战斗机外型都是那样的精悍而矫捷，都是那样被人所称赞！其二，这架新飞机是按战斗机的要求来设计的，可是当时空用机关枪不能进口，只好把南宁军械厂出产的陆用机关枪安装到飞机上。因为没有联动装置，不能从螺旋桨的旋转范围之内发射，不得已只好分别安装在左右下翼，因此可以说这架自制战斗机的武器也是自制的。其三，这架新飞机自出厂之日起，从未被正式命名过，但是当时广西空军全体同寅，都不约而同的把它叫做“朱荣章号”，这就是人们对朱荣章的高度赞扬。

（原载《广西航校校刊》，原题为《赞本厂自制战斗机“朱荣章号”》）

柳州自来水小史

顾 读 云

解放前，柳州市内约七万人口、面积3平方公里，居民大都是到柳江河挑水饮用。

1928年广西省政府筹办梧州自来水厂，1933年建成。后以梧州自来水厂为总厂，分别在南宁、桂林、柳州设分厂。1935年省政府集资10万元东毫在维儒路筹办柳州自来水厂，即现城中水厂的前身。1936年11月建成供水，生产能力为日500吨，仅供县政府机关及消防用。1940年开始向全县河北城区供水。1935年建厂时，除水塔、水池及房屋系新建外，其余所需器材大部取自梧州水厂及广西硫酸厂的旧材料。抽水机有电动机、柴油机、蒸汽机、木炭机四种，机力小（合计56马力）而复杂，且不配套，装配未尽能符合规定要求，水管数量不足，供水量不稳定。

1942年7月，成立广西自来水电力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柳州自来水厂为公司办事处直辖。1941年至1944年，省政府拨建设费，机力逐年加强，供水量日趋稳定，每早、中、晚保障供水。

1944年11月11日，柳州沦陷，日本鬼火烧柳州城。自来水厂房屋、机器大部份损失、毁坏。1945年6月光复后，借款修建，年末大部份修复。1947年获联合国救济总署广西分

署援助，才全部恢复原来规模，供水机器始一律改用立式的45马力的新木炭机。

1948年11月，成立广西水电事业管理委员会。柳州自来水厂恢复原名至柳州解放。柳南水厂（原河南水厂）原为国民党空军第五站建，1943年投产，自来水专供飞机场和乐群社空军驾驶员、家属、医院使用。1944年柳州沦陷时亦遭破坏。1946年柳州水厂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广西分署及广西供应局的援助下，柳州水厂在河南华丰湾筹办河南分厂，即现柳南水厂的前身。1948年2月完工，6月向河南市区普遍供水，日供水量为500吨。

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柳州自来水厂及河南水厂改为国营企业。1950年5月1日，柳州自来水厂与柳州电厂合并，1951年又分开。建国后，柳州水厂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建、改进，逐步提高供水能力。至1987年，日供水均达到4万吨。1958年为适应柳北工业区的建设及人民生活需要，筹建柳北水厂。1960年5月1日投产，生产能力为2万吨/日，1987年达到10万吨/日。1969年在窑埠筹建柳东水厂，1971年7月1日投产，供水量为2万吨/日，1987年达到7万吨/日。1976年在基隆村新建柳西水厂，1981年10月竣工，1982年投产，生产能力为3万吨/日。1977年3月28日，经上级批准，成立了柳州市自来水公司。到1982年全公司所属有城中、柳南、柳北、柳东、柳西5个水厂，生产能力为12.5万吨/日，以后又不断扩建、挖潜、改造，到1987年底，全公司生产能力已达28万吨/日，基本满足了柳州市工业及居民用水需要。

解放37年来累计供水量 92225.42 万吨，售水总量 8874.76万吨，总产值18744.64万元，上交国家的税利 7445.7 万元，相当于国家投资（固定资产原值）的 3.05 倍。对柳州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柳州纺织业发展小志

刘 悠 音

一、解放前柳州纺织业概况

1913年前后，柳州已有了分散的手工纺织业。在西大路有几家，莲花桥有一家，谷埠上街有一家（叫青年织造厂，业主是陈显扬）。此后发展到景行路、湖南会馆、莲塘路都有作坊。最后逐步集中在映山街、西大路、景行路、文武巷一带，由广东人出资给湖南人操作，生产土白布。

1918年，湖南人集资自购洋纱织色织布，获利较多，遂召来了许多老乡亲友到柳州织布，到1923年时，柳州的织布业者几乎全是湖南人，织布机达100台。

1926年伍廷颀任广西建设厅厅长时，在柳州开办平民工厂，生产织布机、马达等产品，柳州的织布工场达30家，织布机达400多台。

1927年10月9日在吉祥寺成立马平县纺织公会，负责人是查桂凤，会员127人。

1928年柳州大火，烧毁半城。在映山街、西大路一带纺织厂被焚毁，纺织业遂呈萧条状态。

1930年，李宗仁在柳州集训军人，需要军装，于是纺织

业开始逐渐复苏。1942年，许多沦陷区难民集中柳州，因人口增加，纺织业也随之兴旺，当时，全市铁、木织布机达600余台。

到临解放前，苛捐杂税多，金融混乱，物价上涨，市场日益萧条，加上外货进口的冲击，柳州市纺织工业再度不景气，全市只剩下40台机子在转动。

二、柳州手工织布一条街

解放前，称得上手工织布一条街的要数映山街了。老柳州人都还记得，从四十年代起，未走到映山街，便先听到一阵阵的机杼声。1946年，映山街有20多家织布手工业户，从事生产的人员就有100多人，其中最大的一户姓邱，有10多台织布机。其他各户都是一至二台织布机，多是夫妻厂店。他们起早贪黑，一天劳动十多小时，浆、漂、煮、染、织等全部操作工艺过程都是夫妻二人自己干，还要自己购买原料，出售产品。虽长年辛苦，但收入甚微。当时有人说：

“长年纺纱又织布，穷得只剩一条衣和裤。”一语道出了个体纺织业者的艰辛。当时，他们用的原料多是来自农村手工纺的条解不匀的低支纱，织出的都是呆板的条子、格子和粗白布，柳州人称之为湖南布。由于工艺粗糙，只有城市贫民及农民才购买。

1949年11月柳州市解放。1950年7月29日柳州商会举行新民纺织社成立大会，出席会议有118人，选出了龙广森、周亚东为正副主任，林少武等十三人为委员。8月26日在映山街7号设立手工业联营门市部。1951年，柳州市工商联进一步组织了100多户手工业织布者成立了联营社，协助其组

织原料，至1953年转为四个供销社，统一为柳州市花纱布公司加工棉布。1954年，转为四个棉布生产合作社，映山街的织布手工业户大部分都入了社，全社共有社员200多人，实行集体共负盈亏制。至1957年，这四个棉织生产合作社转成了一个棉织合作工厂，职工发展到639人，共有四个工场，主要产品有蚊帐布、帐顶布、红星市布、药纱布、高丽面巾、祝君早安毛巾等七种。1959年，该厂并入柳州市地方国营染织厂，映山街织布一条街的历史至此结束。

在柳创始的黄宝善制药厂

刘郁卿

黄宝善制药厂原名黄家和制药厂。

1937年春节期间，晚上有舞狮采青活动。小南路爆竹声，烟尘滚滚，舞狮的，看热闹的，老的少的，骑楼下人山人海。当舞狮进入到街中心正成、光华等几家大绸布店时，爆竹声更是震耳欲聋，烟雾弥漫。这时大同春药房三楼，有三、四个人一封封爆仗，不时掷向狮子，另一个店员不时掷下印有广东黄家和药厂退热散、止痛丹、胃金丹、止咳散的药品宣传单，在宣传单上另附有免费到大同春药房领取黄家和上述四种成药中的任何一种的赠券。黄家和也就是以后的黄宝善制药厂，是柳州市第一家用西药合剂出品的新成药厂。

黄宝善制药厂创办人黄斗才，当时是小南路大同春药房经理，生于1914年。他1933年随父经商，1935年即担任经理。肄业时即有志于医药，及长接任药房经理后，接触到广州、上海各药厂派来的推销人员，了解各药厂生产情况，更激

发起他开药厂、出成品，向事业发展的雄心。

当时新药生产，尚是萌芽阶段，如广东省宏兴药厂的鸪菜、永安堂万金油、八卦丹等几家，广西只有梧州普济药房的柠檬精，其它多是中药膏丹丸散。

黄斗才是个聪明干练的人，通过自身经历，认识到新药的前途，光明灿烂，初以家庭式生产的方式起步，出品四种成药，包装、铅纸、印刷，均由广州采办购进，成品则交由大同春药房代理总经销，上述春节大赠送，就是该药厂第一次大宣传。

1937年二季度，黄斗才被选为柳江县商会第一任理事长，公务及药房事务较多，对药厂发展照顾有困难。1939年商会改组，他没有参加竞选。1940年出任广东省旅柳同乡会第一任理事长，一年后即辞去所有公职，致力于发展药厂事业。1942年将黄家和改名广东黄宝善制药厂，用黄宝善三字作商标注册，出产退热散、止痛散、止咳散、胃痛散四种药，利用大同春药房多年的来往客户关系，并派出人员到贵州、昆明、四川以及其他地区进行宣传推销，一、二年间，即打开销路，由家庭式生产，到1944年发展到有20个工人的小厂。

抗战胜利后，黄斗才辞去大同春药房经理，于1949年在广州市怀远驿开设黄宝善制药厂，1952年后，该厂由手工操作，初步改成半机械化生产，职工人数已达50多人，1956年企业参加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前的柳州药材业

刘郁卿

中医中药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柳州市何时药材行业，难以稽考，本文只就辛亥革命以后事实记述如下：

清朝末年，柳州市内商业比较热闹 的 街 道，如沙街（今柳江路）、苏杭街（小南路）、大南门、东门街（曙光东路）和对河圩（今太平中、西街）。

药材铺也多在这几条街。如在大南门有潘仕贵开的万宝堂，陈世桓开的水生堂，小南门外有张子建开的应昌堂。这三家均粤籍人士，经营生熟药材（批零兼营）是当时较大生意的药店。1915年本地人有润初在小南门外挑水码头开存福堂，也是生熟药材，以铺位接近上游河道来往客商和船只，业务与上述三家不相上下。存福堂、应昌堂是合资生意，万安永生为独资，每家有工人三至五人。

熟药生意则以府前街（曙光东路）的时和堂，沙街的仁和堂，东门外的天和堂较好。

对河圩（今太平中、西街）熟药铺有广福堂、济生堂，

谷埠街有张金垣合资开的万福堂，兼营批发，生意不及万安、永生、存福，从业也有五、六人。其后随着人口增加、市场日趋活跃，谷埠街的博爱药房、万寿堂相继开业。1930年以后，河南路更增加了天寿堂、永寿堂、保安堂等，城内增加更多，如存济药房、中和堂、永和堂、广芝堂、万草堂、福盛堂等，到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柳州已有生熟药店二十七家。

民国十年以前，一般叫药房为药材铺，以后才叫药房。（1937起，当时政府命名为国药业、以别于西药业、新药业）大间的药房，在门前堂名之下，多写上生熟药材或地道药材字样（生药指批发的原药材，熟药指药材加工后的饮片）。店内百子柜上层格子写上麝香、鹿茸、珍珠、熊胆等贵重药名。百子柜对面墙壁、或挂镜屏或悬书画，摆上几张酸枝靠椅，有坐堂医生则摆张横桌，店内为帐房或会客厅，真是古色古香。

封建时代的药材铺，是受歧视的，旧历灶王上天，就得关门过年，春节要等各业开门后，药材铺才开门营业，否则被认为不吉利，受街坊指责。正月八日前发药，要用红纸包药。

较大的中药房，多有坐堂医生。医生多劳多得，诊金归医生所得，店方供应两餐，不付工资（少数也有报酬的），来去自由。大间药房如万安、永生、应昌等，有时有两名医生。

药房货源，大部分在梧州购进，装船运回。做药材生意，那时比较简单，租间铺面，有一千几百元，或更少一

些，做副百子柜，资金多的在梧州进货，资金少的在本市进货。经有信誉的人介绍，基本可以全部赊销，开张营业。以后分季或年节结帐，如“五月节、中秋节、年终”，一般是梧州商号派“行江”（专在各地跑业务的人员）来柳州收帐并联系业务，这些“行江”人员沿着平南桂平等地上至柳州，到处都有来往客户主人，热诚招待食宿。（柳州的批发商有时也派人出去收帐，“行江”的旅差费用，包括食宿，均实报实销）。

结帐以后，马上又列要货计划交梧州“江行”带回，货来以后再付款。各县到柳州进货的，也多是结清前欠的帐，欠下批货的帐。但是一季或两季尚不能结清欠帐者，即被认为无信用户，以后你向他们进货时，好货俏货或购货金额就要被打折扣了，别间批发商店听到你这种情况，若向他进货，就要谈谈货款承付时间或要现款交易了。

民初在柳州做批发药材生意的，都是广东省籍人，药工大多是广东省封川县人，无封川药工的药房，几乎都是夫妻店。这是同乡间互相荐引和技术上互相传授的关系。

当时谋生困难，技术保守，不是亲戚朋友，轻易不传帮带。两广经营药材者，对药材知识，不像四川江西两省习惯，有拜师学艺习俗，只凭荐引者提携传授，自己学习。

药房招工的无形规矩，基本与其他行业相同，一年为期。旧历正月初二日，即第一个“牙祭”学徒伙房，五更即起床，剖鸡拜神，财神位前放有小红封包（内有银币），每个人拜财神后，自动拿个封包，作为一年利市。约早上七、八点钟，食毕第一餐“牙祭”（这餐牙祭，根据商店大小

不同，菜式也不同，但是一年中最丰盛的“牙祭”），早餐后
的工人，或为老板留下来，或自己另有高就，或增加工资，
或迳行辞退，均在这天上午决定，劳资双方，去留自由。

新工人多数先做厨工，有的兼挑水，有的兼碾药加工药
粉药丸。那个时代，新工人最苦了，工作量大，又是体力劳
动，工资又最低。在工作期间，既要勤勤恳恳，又要学有
所长，1—2年后，继续留用时，则升级药工或刨药工（均手
工操作），但要看你自己一两年工作之余，是否自学有这方
面的知识（多数工人进店后，都能自学文化）才能得到任
用。煅药和刨药工，是已有生熟药材基础知识，懂得炮炙加
工方法，可以上柜台捡处方发药的熟练工。那时百子柜外面
是不写有药名的，一是为了美观；二是表示工人熟练。初学
不识药，记性不好，无人指导，是难以上柜台捡药的。煅工
捡药后，都要经过柜面人员（老师傅）复核校对，才包装发
药。

煅药工只能捡药煅药，刨药工可兼卖药计价，遇着柜面
师傅外出，可以顶职，药材铺的柜面人员是高级职员，除司
理（民十年以后称经理）外，他是掌权人物，开票计价，药
物鉴别，购进销出，对外业务接洽，对内指导技术，协助司
理搞好经营管理，是药铺中主要人员。又由于其接触医药处
方之多，对配方之结构，配伍之禁忌，药物份量之多少，辨
证论治之恰当与否，天长日久，对处方治疗，一目了然，稍
有文化水平，肯学肯钻，做得十年八年柜面，就是半个医生
了。

在柳州有眷属的工人，商店打烊后可以回家，无眷属的

则住店内，除少数高级职工有固定床位外，一般工人是早拆晚设的临时铺（一张床板，四角钻眼可支帐竹的床铺），且多在铺面，以便晚上营业或配药，这也是药店老板剥削工人的手段。

至于工资方面，以1936—1937年为例，厨房工每月工资10—15元（桂钞，下同），煅药工每月15至20元，刨药工每月20—25元，柜面师傅每月35—40元，经理比柜面略高，学徒则第一年只供膳宿及衣服两套，每月有两三元零用钱。若是合股生意，年终结算有盈利时，可在纯利内提15—20%作奖金，分奖金时多是按工资比例，工资低的分得奖金不多。

职工伙食由商店供应，食饭不要钱，大商店食的是上等油粘米，菜金则按职工人数，每人每天几角或一元不等，以商店资金和生意大小而有所不同。每月的初二、十六两日都割鸡杀鸭加菜，叫做打“牙祭”，或有客来加菜则另行开支，那是灵活的。

三十年代前后，柳州比较有名的中医生，河北片有邓瑞楼、封雁臣、张镜华、梅叔韦、张慕韩、吴炜如等，河南片有冯凤笙、曾寿松、温润堂等。看病诊金（也叫脉金）一般是2—4角不等，由病者根据自己可能付给，不大硬性；外出看病则视路程远近，有无交情，第一次一般封利市（红纸包）5角至1元，以后酌减或病愈后作一次酬谢，视病家经济情况，穷苦人一般不敢请医生到家出诊的。有名的医生在药房坐堂看病，对药房的营业额是有帮助的。

二

1930年以后，柳州南北两岸街道，开辟马路、照明电

灯，初具规模。商店门面，以新型姿态出现，药房也不例外。中药房原来是壁立百子柜、加以长条木柜面的门面，也开始用玻璃柜面。如万安堂改名万草堂迁到小南路，铺面除百子柜外，其余均用玻璃饰柜，将名贵药材，参茸燕桂、膏丹丸散，用玻柜陈列，让顾客参观选购。铺面不设坐堂医生，也不摆上锻药工具。相继开设的广芝堂，更以店堂深广，陈设堂皇，药物齐全，服务周到，博得上层顾客赞赏。这时政局比较稳定，轮船交通，日趋方便，药材业因柳州人口增加，也逐年发展。

1937年，仁安堂药行崛起于古香中路。以中药批零为主，兼营中、新成药。铺面装璜陈饰，以新型面貌出现。开业时用汽车装上喇叭，留声机，并附上宣传经营业务，开业时优待赠品，牙刷、纸扇、黄家和退热散、止痛丹等印刷品，沿大街宣传广播，以广招徕。检中药时，除一般中药混包外，对较名贵中药，备有各种中药名称，功能主治的说明书（小方块纸片）采取每味药片各包，各包药放入该药物说明书，投合顾客心理，加强信任感，赢得信誉。自己还加工传统药丸如八珍丸、六味丸、十子丸等十多种成药及虎骨木瓜酒、参茸十子酒等，向市、区内外推销。

仁安堂开业以后，贵重和常用中药，如参、茸、珍珠、芎归地芍之类，改由广州直接进货，减少梧州中间环节，降低了成本。

1938年沪汉广州相继沦陷，柳州市内人口逐渐增多，成为南方商业重镇。西北生产的甘草、当归、党参、黄芪、杜仲、麝香、冬虫草、贝母等贵重药材，改由岷江碧口，运到重

庆，由重庆经贵阳运柳州集中，初时行商刘汉忠运来只托仁安堂代销，其后客货源源运来，柳江路的永生堂及飞轮钙粉厂，培新路的蜀通商行，也代客经销药材，谭家礼在培新路合资开昭信行，正式以药材经纪名义出现。到1943年，常住柳州市的药材客商，有40—50人，他们为了本身利益，成立了四川药材业旅柳回乡会，统一四川客商药材行规（如包装分等计价，现款交易等）并合股在驾鹤东路开设广协行，以本省人廖德才为买卖手。由于四川药业的资金雄厚，且有聚兴诚商业银行的支持，这便左右了柳州药材市场。

柳州当时有批发药材商四家，即万草堂、永生堂、福盛堂、仁安堂。前三家均独资、资金不详。仁安堂股东有秦选斋、黄斗才、黄秉仁、骆一樵等知名人士，总经理又是黄斗才，一时声誉鹊起，但资金也只有桂钞五千元。由此可见，当时柳州药材业，即使合全行业资金，在市场物价，也无力与川、黔帮、广帮相抗衡的。

抗日战争时期、对外交通不便，药材价值不高，如岷当归每百市斤法币300元上下，黄连400元，甘草60至100元、白朮2400元上下、黑古朮1600元（均每百斤法币价）。红参十多元一斤，进口野山泡参每斤40多元。药材生意，蓬勃一时。西北药材价格，基本掌握在川黔帮中（指四川、贵州药商）；进口南药如砂仁、豆蔻、胡椒、丁香、羚羊角、犀角之类，价格则操纵在广帮手中（指粤籍药商），原因是南药要从沦陷区经过敌人封锁线抢运出来，别省人语言隔阂是难以转运的。

西北产药材、本省产西土药材，除少数销往湖南和本地

区外，大部分东下梧州肇庆，南向广州湾（今湛江市）、北海、东兴，远销越南河内、西贡；南药则远销湖南、贵州、昆明，更多的是远销重庆转销西南西北几省，其成交数量和金额之大，与抗战前相比多几十百倍，有时令人瞠目；党参、甘草、当归之类一千几百件一批就销完（当时为便于运输每件药材一般五十市斤重）。所谓“帮”，是指这些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信息价格，相互通气约束，语言习惯，自然而然也。

1937年以前，没有同业公会，只有医生与药房组成的柳江县国医药研究会。会长是程永寅医生，副会长为陆学云（福生药房经理兼医生）。1937年六月，柳州总商会改组，才组织柳江县国药业同业公会，第一任公会理事长陈奕良，以后为伍佐高、伍仲留。1941年新药业会员另组同业公会，改组后第四届理事长刘郁卿，一直连任至1952年，第六届张明培继任至公私合营。（见附表）

三

1944年冬，柳州沦陷，国药业疏散到外地的货物，大部分遭到损失。在柳州未能疏散的，又被日寇烧光。当1945年日寇投降，柳州光复，整个国药业能照旧复业者寥寥无几。如广芝、万草、仁安、天和堂等均未能复业。永生堂、昭信行虽然复业，但实力大不如前。代客买卖的经纪业，初有协商行，其后昭信行、济生行、友成行、公信行先后开业。虽然四川药帮仍源源有货运来，但广州市场，日渐恢复，上海、天津、汉口、郑州几个大药材口岸，也已恢复。

柳州经纪业务，只有玉林、南宁、桂林等客商零星进货，缺乏大宗交易。川、黔客商已不愿在柳州停留，因而经纪业务，一落千丈，到1948年冬，昭信行、济生行、友成行相继歇业，永生堂改组永太行，昭信行部分职工另组公兴隆于培新路口改营批发，到1949年只有永泰行、公兴隆、民开药房、公信行四家药材批发行号了。

经纪业务结束，但零售药房却乘时而起，如曙光东至中路，就有瑞和堂、广兰堂、广生堂、广盛堂、益寿堂、大生堂、杏和堂、天和堂、大生堂、福生堂、永安药房，加上培新路口的存济药房竟有十二家之多。驾鹤路有天寿堂、仁寿堂、永寿堂、保康药房、百福堂、健生堂、诚济药房、天佐堂、培济药房等九家，又如谷埠街有万福堂、万寿堂、良芝药房，天生堂、国泰药店，民寿堂、大德堂、回春堂等八家，大小药房，犹如雨后春笋。至于营业额，夫妻店少的每月三两百元“光洋”不等，较大间的药房如万福、永安、保康几家，每月也不过1—2000元，没有统计数字，（1947—1949年通货膨胀币值早晚不同，记帐也不同）全行业职工约110人左右。

抗日战争胜利后，药房门市经营也有较大变化。一是普通兼营中、新成药，有的新药营业额还多于中药配方。至于中、新成药的来源多数在本市较大间的新药业，如大同春、平安、潘祯和、德安药房等购进。二是各药房已较少有医生坐堂，医生多自己开业，如瑞和、健生、保康药房等均自营，较大的门市部则春节过后，对较著名医生请一次春茗，联络感情而已。

1947年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通货恶性膨胀。零售药房，货物多从批发行号购进，半月甚至一个月时间，结清帐目，对物价上涨，朝夕不同，影响不大，勇于进货的还可从物价波动中获利。批发商就不同了，虽有购进，时间不长，且多数已是现金交易。而销售方面，为了争取顾客，或薄利多销，或先货后款，待到收回货款时，物价已经上涨，用钞票计算获利不小，若以药材实物折算，几乎无一不受损失，年终结算，明赚暗赔，徒呼荷荷。

四

民国初年，柳州市区一河两岸人口不足三万人，解放时已增至十一万人。药房在民国初只十几家，也增加到三十几家，若把新药业算入共约七十几家，大部分均开设在今小南路、中山中路、解放路、培新路、西大路、驾鹤路、鱼峰路、谷埠街等热闹市区。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怀下，中医中药稳步发展，解放后开业的有广安堂、广滋堂、万和堂等药房。1953年广西贸易公司柳州经理部开始经营药材，成立药材批发部，零售商店转向国营企业进货。1954年冬，永泰、民开两家较大批发商转业榨油厂，公信行与永安药房联营在柳江路开信安药行，到1956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国药业会员有二十六家参加，投资总金额48732.62元，从此国药业整个纳入国营企业轨道，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柳 州 的 漆 皮 箱

刘郁卿 邹德荣

民国二十年前（1931年），柳州市附近各县，嫁女娶媳，都有油得发光的漆皮箱作为嫁妆，多则十多个，最少也有一个。这种漆皮箱（含漆皮枕）是柳州市内生产的。

什么年代起，柳州有漆皮箱生产，已难寻根。清末民国初，比较著名的有苏杭街（现小南路）柯茂昌、李荣昌、永合三家，专业生产漆皮箱、皮枕。皮箱有大个小的，皮枕有双人，单人的。当时柳州交通尚未发达，外来商品，如皮箱枕头之类轻泡货物，船家多不愿运载。因此，柳州地产的漆皮箱，生意相当兴旺，特别是冬春旺季，嫁女之家，最穷的也有一杠皮箱，箱面放上床棉被。富有者一、二十杠皮箱三几十个抬盒，鼓乐前导，浩浩荡荡，穿街过巷大摆阔气，其中闪闪发光的是漆皮箱。

永合、茂昌、荣昌老板，均是广东省籍人，做皮箱皮枕的工人师傅，则多属广东、湖南两省人。永合生意较大，有工人15——20人，自己制皮。他经营的多是普通嫁妆皮箱，远销庆远、怀远、运江、武宣、象县、柳城、雒容、融县、长安等地区，每月约销售100——150个皮箱、皮枕。柯茂昌与李荣昌两家工人较少，各有6——8人，这两家多数是做定货，家用皮箱，生意较永合小。此外弓箭街（今中山中路）

有邹宝源，有工人五人，兼做马鞍之类配件；香签街（今曙光中路）郭兴记、怡兴和各有工人3—5人，生意都很小。

民国十七年（1928）柳州大火灾，柯茂昌、李荣昌均遭损失，没有复业。永合则改名永合宏，在曙光中路西头开业，同时还开了间柯茂江，邹宝源也由弓箭街迁来这条街。

这个行业，民国二十年以后，融县长安，庆远等地，先后已有漆皮箱生产，加以运输不便，外销萎缩，而市内制革业逐步发展，全牛皮箱逐渐增多，花色品种，均较漆皮箱优胜，漆皮箱产销路，年年下降，抗战胜利后，只有柯茂江、郭兴记两家恢复少量生产，至于漆皮枕则为绣花布枕完全取代矣。

漆皮箱的加工过程是：商店购回箱坯后（箱坯由木器行业用薄杉板做成原个箱型）自己店内师傅再加工过细刨光刨平，然后开口，蒙上熟制牛皮（熟皮分一级皮青，二级三级肚皮）。

产品分双层夹皮箱（木箱里外俱用一级青皮包过）、皮口箱（木箱外层用二级皮包过，内面油漆）、花里箱（普通一般嫁妆箱，木箱外面用三级肚皮蒙过，内面裱花纸）。漆皮枕也分皮青枕，二青枕，普通枕三种。

木箱（枕）经过蒙皮后，即油漆打底，再油漆，然后钉铰、钉锁等四道工序。

皮箱一般高九寸（市尺，下同）宽尺三，长二尺二寸。价值最高的是一级皮青箱，每个当时值东毫十元；最低价值是嫁妆箱（花里箱）每个约四元上下。

漆皮箱工人，多数是计件工资。油漆打底，几分钱一

个，钉铰工序一角。至于固定工资的工人，每月工资在十元内（东毫），店方供食宿。学徒三年期，期满后帮师傅一（无工资），才能离开商店另找工作。

漆箱工人，民国初年业务鼎盛时期，全市约60——70人，90%是广东、湖南两省籍人。民十以后，陆续有本市青年参加工作，到民国二十年（1931）后，长安、宜山、来宾等地，先后有漆皮箱生产，柳州市漆皮箱行业，开始走下坡。

这个行业产品，漆皮箱、皮枕等，原是民间日常家具用品，销路应该不愁，为什么后来竟然没落？其原因有：

一是远输装载不便。因是木箱漆面，装船运输时，既不能压，也不能碰，碰损漆面就不雅观了，因此外销受到局限。

二是产品守旧。开业时或者说传统时，生产什么商品，二、三十年也是生产这种商品，缺乏市场竞争力。

三是没有革新产品。发展漆器的工艺技术，因而当牛皮制品及帆布制品等皮箱上市后，最终在市场上受到淘汰。

柳州橡胶工业发展概况

韦建章

一、解放前橡胶工业的萌芽

柳州市是全区交通枢纽，也是全区的工商业中心。过去柳州人使用的橡胶日用品，都靠进口供给。自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后，接着国内各省军阀混战，弄得民不聊生。直到1926年才开始地方建设。当时以引进工业技术、商品原料和物资，扩大交通运输车、船等为首要工作。

当时省府派建设厅长伍廷飏来柳，首先全面抓开辟全省公路以备运输。广西汽车公路决定以鱼峰山南面荒地（即今工人医院）为起点，兴筑的第一条汽车公路就是柳州到石龙的柳石路，自1925年11月14日提前动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于1926年9月20日修成开始通车，是广西公路先锋。接着分段兴筑，有柳州至河池的柳庆段公路，于1927年6月初通车；柳州至宾阳公路于1927年5月底通车；桂柳公路的柳榴段1928年6月通车；还有柳州至三江，柳州至大湟江等地也逐步通车。在南宁方面兴筑柳邕公路和贵县、玉林、梧州戎圩、龙州、百色等地公路皆逐步通车，总之广西大部份城市之间，汽车行驶畅通，运输业也日趋发达，这给橡胶业提供了市场需要。

1928年（民国十七年孔历九月十四日中午）柳州河南发生特大火灾。烧毁河南过半数房屋，从鱼峰山脚一直烧到柳

江河边，沿途菜地、鱼塘、住屋及附近一带地方全被踏平，事后政府因陋就简依势才修成鱼峰大马路。这就给橡胶业提供了生产、销售场所。天下事不独有偶，又于同年孔历十月十三日下午，柳江路起火，当时刮大南风，瞬间风乘火势，火仗风威，冲霄火屑满天乱飞，相互串连，烧毁南、西、北三座城门辖区大半城房屋，大半居民流离失所，尤其贫苦病人露宿于颓垣破壁瓦砾之中，状甚凄惨。国内外红十字会虽有物资救济，但杯水车薪长贫难顾。为此，多数人为谋生计，各自找寻工商门路，五方八门遍地开花，各行各业顿时兴起，橡胶日用品手工业也就应时而生。过去劳动做工群众，一般是脚穿草鞋，运货车是用木制的车轮，绑东西是用草、麻、棕等编成的绳子，但都不耐用，此时偶有识者便仿效外地，利用不能作车轮使用的废旧汽车轮胎，割割来制成包木车轮外面的胶条；胶草鞋、胶绳等日用品投入市场销售。经过劳动群众反复试用后，各皆认为经济耐用，对这些橡胶日用品深感满意。后来日积月累，劳动群众形成使用习惯，顾客日渐增多，而用手工割制废旧轮胎日用品的摊、店，也就日益兴旺起来。

1932年有湖南省衡山人戴世新者，首先在鱼峰路开设“建华翻胎厂”，开创柳州翻新轮胎的纪元，除割割废旧轮胎制成橡胶日用品外，还选些较好的旧轮外壳，用生胶沾上装入模型中蒸熟而成翻新轮胎使用。其后逐渐有人接着在鱼峰路和附近街左右纷纷开设修、补、割胎行、店、摊等，到1940年鱼峰路就有十多家，如：杨景成开设“湘山补胎行”，胡悟梅“五常补胎行”，龙永南“永南”，覃建荣“建

昌”，陈肇基“浩成”，刘浩森“新华”，陈歧斌“斌记”，刘瑞珍“瑞记”，张仁明“明记”，谢沛淇“沛记”，覃少明“昇记”，廖飞雄“雄记”，黎华兴“华兴”，叶英“英侨”，谭辉“辉记”，吴其昌“其昌”等十多家补胎行、店，还有些小补胶摊，大多数集中于鱼峰路。当时虽然也有同业公会组，只是流于形式，未起什么作用。

二、解放后橡胶工业蓬勃发展

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后，修、割、补轮胎单干户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全市连河北共有几十个修、割、补胎行店摊。1952年增加零星单干户在太平西街割胶制日用品摆摊销售，如周木生、韦建章、刘玉昆等。1955年2月，市府派员发动各单干户，组织建立“柳州市手工业割胶生产小组”，但只有梁五、黄英华、刘浩森、杜书温、刘贵生、廖飞雄、沈德昌、刘玉昆、陈组华、杜仁阶、覃少明、胡汉荣等十二人参加，公选黄英华为组长，地址在鱼峰路20号刘家，专门割制木车胶条、胶草鞋、胶鞋底等出售，其余单干户则徘徊观望，仍自靠单干。由于合作化进入高潮，形势逼人，同年9月，市府又派员组建“柳州市手工业补胎供销合作社”，加入为社员的有：陈球、伍德和、曾永文、陈歧斌、吴国威、龙永南、何土生、伍舜坤、谢沛淇、邱志荣、丁凤珍（女）、陈肇基、赖长秩、张仁明、龙永棠、刘瑞珍、黎华兴等十多人，公选陈球、伍德和为正副主任，社址在鱼峰路26号，以补胎和木车胶条、胶草鞋等生产销售。上述两个单位产品，主要销售本省与云南、贵州等地，这些手工制品却能畅销各地。

1956年2月，市手工业联社将所辖“割胶生产小组”与“补胎供销合作社”两单位合并为“柳州市手工业橡胶生产合作社”，走上合作化道路，社址在鱼峰路106号，除上述两单位成员之外，更欢迎单干户踊跃参加。组成合作社后，全社有：梁五、周木生、杜书温、黄英华、刘浩森、陈组华、莫仁生、覃建荣、何土生、杜仁阶、覃少明、陈歧斌、胡汉荣、吴国威、胡悟梅、龙永南、伍舜坤、陈球、谢沛淇、邱志荣、陈肇基、赖长秋、张仁明、丁凤珍、洪振南、廖飞雄、刘玉昆、黎华兴、伍德和、龙涛、刘瑞珍、龙永棠、梁富德等33位社员，公推胡悟梅为合作社主任。为了开展生产业务，社里派人全面了解市场日用胶产品情况后，立即派人分赴广东、云南、贵州、上海等地购买废旧轮胎及生胶回社，把各种型号旧轮胎可翻新者翻新，其余废胎割制成木车胶条、胶草鞋、胶鞋底销售，但产品都是手工操作，而各地消费者皆赞产品经济耐用，深受顾客欢迎而畅销。

市手工业联社为了适应市场需要，于1958年2月，把柳州市手工业橡胶生产合作社报请上级批准改组为“柳州市橡胶制品厂”，厂址在柳石路鸡窝山脚，亦叫老虎冲口处。初建厂房三间约六百平方米。厂内职工以原合作社33人为基本，厂把他们分为炼胶、补胎、胶杂品、制鞋、机修等五个班，职工缺少不敷分配，其后由市上级陆续抽调手工业联社、补胶鞋社、锰品厂、骨粉厂、雨伞厂、毛笔厂、针织厂、水厂、炼钢厂、炼焦厂、烟厂、织布厂、电机厂、火柴厂等单位职工入厂为职工（每厂约调2—10人）以充实各班人数，并调苏正雄任书

记兼厂长，梁富德为副厂长。至1960年底，全厂共有职工200人，资产是由合作社转厂的20万元，加上近两年积累共约40多万元，只能生产木车胶条、胶草鞋、胶鞋底、胶绳、补轮胎等手工操作，原材料不足时，厂里忙于派人外出“找米下锅”（即外出采购原材料）以维持生产。

1961年改属市二轻局管辖，适逢手工业归队，将其原先建厂带来的资产20来万带走。市二轻局指示以厂余资金并向银行贷款来购买炼胶机三台（其中9吋两台，14吋一台），以逐步走向半机械化。除原来割制橡胶日用品外，另增加机器以制橡胶杂品——吸引管、纯胶管、三角带、平型带、胶底帆布鞋等产品。同时厂里将五个班改为两个生产车间：第一车间主任胡悟梅，生产翻补汽车轮胎、割胶日用品、制胶杂品等；第二车间主任李世才，生产吸引管、纯胶管、三角带、平型带、炼胶、机修、锅炉等。厂里生产渐向半机械化进展，销售日渐扩大，职工增至300多人，产品种类逐步增多，产值亦逐步上升，上缴税利逐年有所增加，厂房宿舍根据生产需要相应扩建，资产积累约有70万元。1964年改属市化工局管辖。

三、成立（橡胶专业）

1965年成立橡胶专业，在北京建立“中央橡胶总公司”，下设八个分公司，中南区在广东设“广州橡胶分公司”，分公司在广西设立“广西橡胶总厂”，统一从新调配生产业务。总厂之下设“南宁橡胶厂”，生产水鞋、解放鞋等；“桂林橡胶厂”，生产胶配件、球鞋；“梧州橡胶厂”，生产童装鞋和胶玩具，“柳州橡胶厂”，生产一管两带；还有“桂林轮胎厂”，“桂林乳胶厂”，“桂林橡胶机

械厂”，“桂林橡胶杂品厂”，“桂林橡胶研究所”等，总厂也设在桂林。

柳州橡胶厂这时将原来一、二车间，改组为：第一车间炼胶，第二车间胶管，第三车间胶带，第四车间胶杂品，第五车间锅炉、机修等。五个车间，自成立专业后，柳州橡胶厂全靠中央橡胶总公司投资，才能不断增加机器设备，根据生产和职工生产需要扩建厂房及宿舍，供给原材料，增加产品种类，改进旧有产品，在橡胶专业化的轨道上前进。厂以一管两带为主要产品。一管：即吸引管夹布管、纯胶管、编织胶管、钢丝编管、高压胶管、耐油胶管、耐酸胶管等。二带：即平型带和三角带。平型带又分各种型号的运输带和各种型号传动带。还有各种性能平板的胶板。真是型号繁多，不能一一尽述。1965年底，厂里资产增至80多万元，有职工400人，年总产值六百多万元，上缴税利70多万元，产品主要销售本区和云南、贵州、湖南、广东一带地方，这是我区橡胶业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才取得的成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文斗逐渐转为武斗，厂内职工积极投入，武斗时两派激烈，生产几乎瘫痪。直里生产逐渐恢复，到1969年才能慢慢正常生产。在“四人帮”横行十年中，厂里领导还是重视“抓革命，促生产”，故生产产值仍然有所上升，技术则采取走出去（即派青年职工外出学习技术经验）、请进来（即请技术高明人士来厂传授各种新的技术方法）的办法以搞好生产，故1971年厂资产增为259万元，职工增至660人，年产值和上缴税利亦相应逐年增加，且产销平衡继续前进。

1975年厂资产增为448万元，职工有768人。厂里根据生产进展需要，决定把原三车间生产的运输带和传动带等转至大龙潭门左侧山边新起的厂房，建立第六车间，配备人员扩大生产。此后六个车间的职工兢兢业业，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前进。

1985年，厂资产又增为754万元，职工有1160人，生产的主要产品有：吸引管40万吋 m，编织管22万吋 m，夹布管93万吋 m，三角带300万 A m，风扇带9万条，输送带34 万 m²，传动带34万 m，纯胶管40吨，胶板40吨，胶杂件35吨，发展为年产值两千万元，年上缴税利250万元。各种产 品以销售区内为主，区外销售有：云南、贵州、四川、河北、山东、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国外则销售东南亚及香港各地。

柳州橡胶厂自建立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生产逐年稳步上升而成现在的崭新姿态，生产继续向前发展。目前我市除柳州橡胶厂外，还有在1961年由柳州橡胶厂办手工业归队而组成的“柳州市橡胶塑料厂”、“柳州市民政橡胶厂”和各街道办的小型橡胶厂等，都对国家作出一定的贡献。为使柳州市橡胶业繁荣兴旺，必须继续努力，提高技术和产品质量，沿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向前迈进。

1988年11月韦建章稿于

柳州太平东街40号

新桂系在柳办理军校之经过

梁志强

1930年7日，打着“北上护党”旗号的桂、张（发奎）两军，在湖南衡阳七塘一带被粤军击败，狼狈退回广西。在此之前（1929年末和1930年初），桂、张两军与粤军开战，已遭两次败北（首挫于广东从化，再败于广西北流），加上这一次，下层骨干基本伤亡殆尽，故残部退回柳州整编时（仍虚张声势编为第4、7、8、15四个军，每军两师，每师两团），虽然七拼八凑，连以下干部仍然缺额甚大。为健全组织，尽快恢复元气，以应付不利之局面（当时南宁桂林受滇军、蒋军包围，浔梧和田南被粤军、滇军占领，桂系地盘只剩下柳州区区之地。军心动摇，粮穷弹尽），乃决定重办军官学校，培养一批“忠于团体”的“中坚”，继续实行封建割据。但对外则标榜办校目的“在于养成绝对服从党旨，为民族谋解放之真正干部”，“本革命之职志为主义而战；为正道而战；为国利民福而战。”“以担负护党救国大业，扫除个人独裁，恢复党的权威，建设国际、政治、经济平等之中华民国。”

8月1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正式在柳州组成并举行开学典礼。由“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总参谋长”白崇禧兼任校长。一百余名工作人员和600余名学员全部系由各军抽调或保送（一些史料说该校是从南宁迁来，非

也)。校址设于广西省立第四中学(今文化大院)。

8月底,由各军保送的900余名学员全部到齐,即编成步兵三个队,炮兵、工兵各一队。沿接前南宁军校之期秩称第四期,学制为半年。未几,白奉令率兵解南宁滇军之围,校长一职交师长李泽民代理(不少史料说该校在柳州一成立,校长即为薛岳,也有的史料说薛岳是副校长或南宁军校校长,薛其实是柳州军校第二任校长,接长该校的准确时间是1931年2月)。李抵任后,将学员重新编组,第一队为机枪队,二、四队为步兵队,三队为炮、工兵及经理队。

次年春,由于发生“胡汉民事件”,宁(南京)粤之间产生齟齬,粤方为自身计,主动与桂通款言和,化敌为友,联合一致反蒋。接着,汪精卫、孙科南下,开府广州,公开与南京对抗。随着两广关系之缓和,军中需求干部也就不似以前迫切了。为使学员获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当局决定将该校学制展期六个月,即由半年改为一年,并任薛岳来长斯校,以陈芝馨为教育长。

薛抵任后,锐意刷新校政,大刀阔斧整顿校风,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是更易校名。他认为,要使全体员生真正养成为党的武力,担负起救国救民之责任,首先应在学校名称上予以鲜明的标示。经报请(广州)军事委员会同意,将校名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

二是清理教职员和学生队伍,留强汰弱,按程度重新编组。“因彼等全系由各部队抽调或保送而来,程度不等,良莠不齐,实施教育每感困难。”薛就职后,即召集会议统一

认识，重新制定取舍教职员和学员的标准，公开举行甄别考试。结果，有数十名教职员被辞退，400余名学员被遣返原部。余下重新编为四个队，第一、二、三队为步兵队，第四队为机枪、炮兵、工兵队。以黄占春（上校）、刘建常（上校）、王景宋（上校）、郑沧溶（上校）分任一、二、三、四队队长（后郑因事去职，四队队长一职由少校工科队长梁寿笙代）。少校廖梦麟、褚兆刀、彭鸣皋、梁俊杰、刘赤、张毅民、黄敬之、邓光伦、梁栋楷、崔坚、石维瑶分任区队长。各区队副则由少校朱岳、陈萃文、上尉刘定寰、廖鼎、廖福、唐华英、刘月鉴、莫家新、林绍殷、莫谅成、覃克恭、姚大年、赖和平、中尉韦兴等担任。并在第四队内设无线电区队，从社会招收高中毕业生30余名，以洪范（少校）为队长，借柳江图书馆开训。上校军事教官毛林翰、洪世扬、傅星、韩舜民、中校军事教官符维屏、骆继光、范雨生、夏炳智、黄欣培、中校政治教官王伟矩、少校军事教官岑铿、潘奋南、朱乃瑞、汤庆杰、方定坤等继续留任。

三是加大政治训练比重，并将原有的政治训练科扩充为政治训练部，以韦永成（上校）为主任。于学术研讨之外，大力向学员灌输反蒋内容，培养反蒋意识。让每个员生明确：“蒋贼中正以个人独裁，藉党营私，使我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奋斗牺牲所得来之光荣胜利，为个人所劫夺净尽！于十八年（1929年）春间，更跋扈嚣张，毫无忌憚以指派代表为方式，包办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以造成个人中心势力，于政治则任用私人，贪赃枉法；于军事则扩张嫡系，诛锄异己；于外交则丧权辱国，甘心媚外；于经济则滥发公债，擅借外

资……已堕落成为叛党卖国、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的民族败类！”从而进一步激发大家对蒋的仇恨，死心塌地追随当局反蒋。

四是建立各种组织，健全各种制度。①组织法规委员会，负责设计、制定本校之法规；②组织考核委员会，定期考核员生之勤惰优劣，提出奖惩意见；③组织军事政治研讨会，以收切磋之益；④组织经理委员会，实行集体理财，经济公开，以保障员生利益不受侵犯；⑤组织消费合作社，经营各种日常用品，解决全体员生之福利；⑥建立校务会议制，定期研究学校兴革事宜；⑦建立学科、术科会议制，以释学术方面的疑难；⑧建立教育、队务会议制，讨论和解决训练及队内事务；⑨建立校、队朝会制度，每天，从校长到学员，一律于4时30分起床，集合校（队）本部，听校（队）长宣布当日应办之事项；⑩组织共乐会，定期开展活动，从各方面活跃员生的文娱生活；⑪严格施行“四大禁令”（禁嫖、赌、吹、逃）和“两小禁例”（禁饮酒、吸烟），从校长至学员，一律奉行；⑫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特别党部”。从5月开始酝酿到6月下旬，经全校党员大会选举出黄占春、王揆一、李大光（少校秘书）、骆继光、王伟矩、熊耘（第四队炮科学员）、黄均超（第一队学员）为执行委员；谢宝树（少校秘书）、李治平（少校教育副官主任）、李萱（第二队学员）为候补执行委员；陈芝馨、王景宋、刘建常为监察委员；韦永成、唐建新（第四队炮科学员）为候补监察委员。

经此，学校工作大有起色，面貌焕然一新。正当薛岳准

备进一步施展其抱负时，张发奎从汪精卫处获悉，蒋、汪可能再度合作，于是，向薛岳交底，要其立即辞去校长职务，做好随第四军离桂附汪的准备。薛是张的部属，唯其马首是瞻，于是向当局递交辞呈。李、白挽留不住，只好委教育长陈芝馨接充该校校长，并任余华沐为教育长。

陈接任不久，为检验学员学习成果，于8月7日至23日，举行了一次综合性的实战演习。五个队沿着长塘、凤山、上雷、东泉、沙埔一线进行“攻防对抗”推演，结果颇为满意。

9月1日，学校特别党部向全国发出“东电”，声讨“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卖国罪行”。

9月4日，该校举行第四期学生毕业典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派总办公厅主任张淦、广西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陆宗骥由邕赶来参加。宋醒石代表来宾在会上诵诗一首：

“鲜红一腔血，昂然一颗头，但愿一块砍，毋使漫野流；血为涤腥秽，头为护万家，头断血亦喷，开成民主花。”

同月下旬，分配工作一结束，学校即奉命由柳迁至南宁，筹办第五期的招生工作（有的史料说“薛岳辞职后，柳州军校无形停办，军校第五期的设置，无异从头做起”。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迁邕前夕，发生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该校于10月6日发出抗日救国通电“鱼龟”，表示“断难容忍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发誓要为东三省殉国诸烈士复仇，”“万死一生，义无反顾”！

资料来源:

- ①《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
- ②《人物传记》第六、十四辑
- ③《本（第四）集团军奋斗史》
- ④《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条一分校第四期同学录》
- ⑤《南宁民国日报》1931年7月29、30日、9月3、4、8日、10月9、21日

从《新华日报》看 沦陷前和光复后的柳州

陈铁生整理

1944年11月15日，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柳州市区，从此以后七个多月的时间里，柳州遭到了建城二千余年来空前的浩劫，人民遭受掳掠和屠戮，建筑物被焚毁，昔日繁华的桂中都市变成了一座死城。1945年6月29日，柳州光复了，居民们重返已不存在的家园。可是，胜利的曙光还没有照射到马鞍山顶，乌云又笼罩了东门城楼。柳州在沦陷前和光复后的情况，1944年（缺6月份）——1945年的《新华日报》上有零星报道，现整理出来，愿对当年亲见亲历的同志回忆时有些帮助。

一、日寇侵桂前的柳州

1944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区美军的强大攻势下，海上交通线被切断。侵华日军为了寻求出路，发动了湘桂战争，目的在“打通大陆通道”。当战火在湖南蔓延时，柳州虽受到战争气氛的影响，但居民们仍“处变不惊”，一切照常进行。

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二月二十一日《新华日报》第二版有题为《柳州物价在波动》的报道：柳州本来是省商业

交通中心，也曾有过“黄金时代”，但近来市场却一天天冷落了起来。春节期间，仅柳江路各大商行宣告停业的就有二十几家了。春节前，物价波动得厉害，到现在还没有减退或稳定的倾向，日用百货比起桂林来都要贵些。

2月29日该报又有一则《柳州米价发生激烈波动》的短讯：本市米价近来发生激烈波动，原因是乡下米粮减少进城；同时河水干涸，水力不足，水碾出米量大减，而市上酒商熬酒需要食米的数量都有增加。县府已下令禁止酒商用米熬酒，同时派出纠察队检查粮商积米，规定不得储备三个月以上的粮食。检查结果，在河北西大路九十号，河南谷埠下街裕丰号，谷埠中街衡兴，谷埠上街广胜，接云路公兴、张元凯等六家米商没有加入粮食同业公会，私自囤米发售，正严审办理中。

由于物价上涨，“柳江县苦力、理发、人力车、土木、车香、缝作、草履、印刷、旅店等各职业工会工人，因为物价高涨，生活不易，要求增加工资。总工会已向各方请求增加工资百分之五十，但还要等柳州评价会议评定后才能实行。（见《新华日报》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二版，往下引用只注日期，年序用公元）。

物价冲击了金融，“柳州市上，在上月底忽然宣出谣言，说银行限制提出存款，一时各银行都发生挤兑现象，幸而没有多久就告平息。当局在追究谣言来源。”（四月二十五日二版）

物价影响到能源，“柳州电厂于月前试机，使全市大放光明。该厂因燃料问题不能适当解决，又受物价上涨影响，

困难很多。据宋厂长谈称，该厂在去年夏季就已在湖南定购大批湘煤，但先后由铁路运到的只一百吨，不够用，只得转向柳江上下游采购质量较好的烟煤来补救，可水路运输也同样困难，到现在还没运到。该厂现使用的柴油机和木炭机因动力和成本昂贵，去年亏损五百余万元，今年二月份就亏了五十余万元，因此感到不易维持，望有关方面设法给予解决。”（四月二十五日二版）

物价影响民生，“柳州冬令救济会到四月下旬才补发贫民救济金，每人二十五元，并通告过期不领的不再补发。这也算是‘履行冬令’的一种。”（五月二十四日二版）

这四、五月份，该报还报道了有关柳州的一些简讯，如“广西省府为开发天然富源，打算和英商远东公司合资办理柳州鸡喇水力发电工程。现已电请资源委员会派人到柳州考查，认为前途希望很大。”（四月十日二版）“柳州市已经呈准筹备设立，现先组市政计划委员会，由市政处长杨毓年为主任。”（四月八日二版）“柳州各界五月七日祭唐刺史柳宗元。柳宗元的坟墓在柳侯公园里，墓前苍松翠柏，风景很好。”（五月二十九日二版）“第×战区阵亡将士公墓最近将在柳州动工建筑，建筑费共五百万元，由雕刻家郑可设计。”（同上）

1944年夏，湖南前线告急，柳州抗战呼声也日高。湘民南迁，市场一度出现虚假繁荣的景象，衡阳失守后，黔桂铁路呈现行路难的境况。部份文化人流落柳州，生活窘迫，但仍不忘抗日宣传。

是年7月2日，“柳侯公园举行了一个热烈的晚会，这

是柳州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工作委员会所主办的‘一切为前方’诗歌朗诵夜会。到会文化界、戏剧界、音乐界人士很多，节目共分三部。第一部‘吹起进军的号角’，计有《吹号者》……等七首，还有口琴独奏。第二部‘怒吼吧，柳江！’……还有舞剑。第三部‘再来一次总动员’等。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也参加演奏。”（七月十八日二版）

在文人高呼抗日的同时，也有投机商在忙着发国难财。有一篇《黔桂道上》的通讯说：“柳州市面相当安定，这平日号称为商业中心城市，市场交易依然是非常活跃，因为有很多游资乘机收购衡阳、桂林等地因疏散而削价抛出的货物。这班投机者就把货物当行李包裹免费免税运往筑、昆、渝各地，这又是一件获利百倍的生意。”（八月五日四版）

“城站因车的班次没有一定，有时从清晨五点起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卖票。每个人限购五张，有票贩从中倒卖，一张五百六十元的三等车票卖到一千至一千五百元。抢车时的剧烈、迅速而慌乱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同上）从这则通讯中，可看出衡阳吃紧后柳州的交通状况。该报8月11日有一篇《动乱中的桂筑行》也说到铁路的拥挤情况：“从桂林到柳州现行顶快得一天一夜。一进柳州城站大门，地上睡满了旅客，堆满了行李。售票窗排着一长列人，站着蹲着的老少男女都有，而票窗关得死死的，票房里一个人也没有，买三等客票的都在前一天晚上甚至白天，就站到票窗跟前了。头等车已经撤销，二等车照规定要先登记再按次序买票。二等车票价是一千一百二十九元，黑市在一万元以上。据站长说，每天从柳州直开独山，只有一班车，

这班车里只有一辆二等车，按规定可以出售六十多张票，现在已超过规定，每天卖上九十多张。柳（州）独（山）特快车平时只走二十二小时，现在却走了四天，还有走七天九天的。”

行的问题难解决，跟着出现了住的问题。8月13日该报一篇《疏散声中看柳州》中反映：“自从桂林疏散以来，柳州顿时热闹起来，但这个小城无法解决住的问题，旅馆家家客满，柳江上的篷船每夜要二三百元也住满了。房租涨价真惊人，一座木板房（三间）每月要五千元，起码先交三月；小洋房更不能想象，每月一万五，先交一年——十八万元。”

逃难的人群中，有一批文化人。据该报8月5日的一篇通讯提及，“柳州现驻有新中国剧社，抗宣四队、九队，边政大队和业余剧团等戏剧团体，不久以前曾公演‘怒吼吧，大后方！’……可是，这一群在艰苦的物质生活和并不自由的精神生活下顽强地挺立着工作着的戏剧工作者，实在值得人们崇敬。”8月12日又有消息说：“从长沙、衡阳、桂林等地疏散来的剧人相当多，他们仍然坚持在戏剧岗位上，努力于动员民众的工作。演剧四队、九队和中国剧社最近集体创作了一个四幕剧，名《四城记》，以长、衡、桂、柳四地的战时动态为背景，执笔者为汪巩、严恭、吕复等，内容比‘怒吼吧，大后方！’更加充实完整，将由赵明、许秉铎、张容等联合导演，由三个剧团联合演出。”8月11日报道：“新中国剧社原来的待遇已极清苦，到柳州时更窘迫，每月二百元津贴取消，除靠长官部发军米一天两餐外，只有

演剧收入勉强维持……”。8月16日报道：“艾芜在柳陷入穷途，妻儿几口嗷嗷待哺，想回川中又无川资。徬徨在柳的司马文森、周鸣钢、韩北屏挈妇携雏，和艾芜一样狼狈。文章无地发表，可怜的稿费收入也绝了来源。8月13日报道说：“许多文化人从桂林疏散到这儿，有金仲华、艾芜、司马文森、穆木天等。衡阳《大刚报》七月十日在此复刊，还有几个报馆要搬到这儿来出版。于是，柳州的文化界也热闹起来了，文化界扩大抗日宣传委员会主办过音乐会，发动过国旗献金。”

同是文人，也有食公自肥的。9月25日该报载：“由于西大校长李运华忙于挪用经费做生意，无心准备学校搬家，后来在师生督促和舆论指责下，才勉强把一部分学生送到融县，图书仪器也搬出了三十几箱，理工图书仪器素称丰富的西大，总算保存了这点产业。教授因为学校压下了六、七、八三个月的薪水，大家对这早已不感兴趣，开课大成问题。学生陆续到融的有五百多人，还有五百来人流落在柳州，其中160人住在农学院，由学校每月发700元生活维持费。照一个月前的柳州生活程度计算，只能吃7顿中等的客饭。因此有一部分战区同学没有别的接济，只能两天吃一顿烧饼过日子。”

二、疏散声中的柳州

早在湘桂战争爆发时，柳州行政当局就动员过居民疏散。后来由于战事发展并不象执政者想象的快，于是，又把疏散一事置之脑后。当衡阳被围后，又重申前令。据该报8·

月13日报 道：“7月18日起，过去曾延 缓过的疏散令又执行了。茶馆、饭馆、经纪行、布店、戏院 以及 特察里，必须一律停业，不然就不许请求车船票。从衡阳、曲江、桂林等地疏散到这儿的人，刚站定脚跟又得走，更感到苦。许多人早已把带出来的一点有限的现金和东西用光卖光了，于是流为叫化度日的难民群，可是这儿又不许停留！”“天气热烈得到百度以上（华氏），但车站、码头、大街小巷到处是人，到处堆满了东西，于是盗窃的案子也就多起来了，大多是外来人倒霉，夜里容易失窃，白天一不小心身边的东西也就不知去向。”“另一面是乐而忘忧，珠江水上食堂拥挤得有时要等上一点多钟才有空席。五六千元的筵席实在变成太平常，这些大多是在生财有道的暴发户。食堂老板曾在报上大登启事说招待过柳文化界，免费短期住宿，但条件是夜深客散以后入睡，第二天清早起来。文化界人士大都住在龙城和柳州两中学，没有去打扰老板。”

9月13日的通讯说：“衡阳失守后，战事稍缓和，由桂林迁柳的人又回去了一部分，本地疏散出去的也都纷纷迁回，平码经纪行、布匹店等都已奉准复业了。特察里和茶馆，也在请求复业。”这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邮局包裹舞弊案和8月15日发生的城站大火案。这两宗案情已有另文介绍，这里就不重赘了。

9月初，衡阳日军向广西进犯，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仓惶下令限9月12日疏散完毕，柳州也为之震荡。该报10月3日报 道：“柳州正在紧张状态中，人们见面时唯一的话题便是疏散。全市商店差不多十分之八九宣告休业。柳州银行

业共计23家，内18家商业银行已全部撤退到独山和贵阳。开金城江的火车每天只有一班，旅客拥挤，因为行车没有一定的时间，由柳州到独山要七八天甚至十几天。如果要搭汽车，那就只有做黄鱼，每人至少要费五万元。从柳州疏散到宜山和长安镇去的人，大家都徒步前往，扶老携幼，非常艰苦，因此，报纸呼吁“再没有地方可退了！应该用全力转换战局。”

10月5日有一篇《柳州疏散困难》的通讯说：“疏散问题真严重，交通工具这样少，而急待疏散的人和物资又是这样的多。公路局方面，客车已经好几天没有开出，开到独山去的百多辆汽车还没有回来，等公路局的车子真比登天还难，每个人都有这样感觉。有钱有办法的人便纷纷做黄鱼了。柳州车站因为开的车子太少，车站上的行李货物堆得象山岗一样，偶而有一次车子开出，但也全部为机关封用，疏散的民众还是无法登车。至于南下的水道，以前停泊在柳江的大小船只，差不多已经走光了，航联社也离开沙角用火轮拖到鸡喇去办公，他们更加无法无天，在几天内，就把鸡喇到桂平的轮船票抬高了很多，现在黑市已经卖到每张五千元了。”

10月14日该报又有一篇通讯反映“黔桂路上逃命难”：“刚由柳州来渝的人谈，由柳州到重庆每人约需十万元，但这还要有党政方面的关系才行。至于一般百姓，即使有钱也休想有舟车之便，一般百姓大多数只能徒步或乘牛车、手车等一段一段前进。现在柳州一带汇兑已极困难，那里有无数等候重庆汇款逃难的人，但重庆现在已无法汇出。

“经过了千辛万苦才到贵阳的某君谈称：他和他的家人九月八日到十二日四天里，把行李交给柳州城站过秤，持有收据。十三日亲眼看着行李装进铁篷车箱，然后才挤爬上火车向独山疏散。一路上，因为火车缺煤，不能开行，又爬上开往南丹的一列煤车，到南丹后，又没有煤，于是再设法爬车，但这次的车箱是特别挂的专车，老百姓无资格插足，车顶早已坐满，只好抱坐机头，人煤混杂在一起，又被人乘机敲榨，向乘客收费每人五百到千元不等，好容易全家老少在九月二十四日到了独山，满以为行李已经先到，但到车站一问，独山车站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曾一再打电话给宜山黔桂总局局长设法，也没有得到结果。和他处于同样情形下的旅客极多，他们曾建议请路局设法把行李由汽车装运，所有运费由旅客负担，但也未为路局所接受。他们久待独山，坐吃山空，不得已只好向人借贷，再辗转来黔。他们对黔桂路的交通实在感到痛心已极”从这篇通讯，可看到当时的混乱情景和难民的困境。

10月19日刊登了一份桂林百货同业公会理事兼桂林浙江旅桂同乡会理事许有恒为了黔桂路的交通问题代桂柳疏散难民向当局的呼吁书，其中除要求解决黔桂路交通问题外，许氏还指出：“中途关卡把疏散当作生财之道，手续稍有欠缺，即被敲榨。如衡阳亨达利因为疏散证没有经过衡阳关盖章，在柳州南站海关分卡私诈现款十万元了事。桂林亨达利因为疏散证上未具花名，也被柳州南站海关分卡勒索五十万元，后以现款七万元、皮鞋四双、手表五只约值十八万元交上，方始发还。”许氏要求当局立即调整黔桂路的交通，同

时对于沿途关卡及检查处的非法敲诈，也请加以制止。

10月30日登载了一则在柳戏剧工作者的消息：“柳州的剧兵们为了加强黔桂路的抗宣工作，有一部分已经在十月二日徒步到宜山去，怀远剧团和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第九队的每个同志都带着轻便的行装踏上旅程。剧宣四队由桂林徒步去长安转回柳州，他们奉命暂时留柳。到十月五日为止，他们仍在这个疏散的城市作宣慰民众和部队的工作。”

9月12日，桂林《广西日报》以特大号标出了黄沙河我方军队转进的消息，柳州更是加紧疏散。11月6日，《新华日报》载《从桂逃筑沿途见闻》又写到柳州的情景：“……商店关门，街道两旁摆着若干地摊，湘桂难民在这里出售他们唯一的财物，然而购者寥寥。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候，谁还有心肠搜购多余的东西呢？街上除了武装人员之外，来往行人莫不带着紧张状态。在柳州的三个车站——城站、南站和西站的候车室里，早已挤得满坑满谷，月台上和四边广场上，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堆积着如山的货物和行李。黔桂路列车行车已无定时，有些旅客已在车站上住了十天半月还没有搭到车子。公路局的客车也极少，开往独山的汽车往往一去不回，不能再载第二批的乘客。搭汽车似乎只有做黄鱼的一途，每人至少需费五万元。包一辆车需八十万元到百万元不等。柳独间商货运费每吨达二十二万元，听之令人咋舌。”

据该报11月18日转载中央社纽约16日合众社电称：美国全国各杂志今日都刊载中国战区的大幅照片。照片是新闻画报摄影记者甘包勒所摄，图中可见难民在日军围攻柳州时逃

难情形。这一照片曾分送给美国各通讯社，同时并分发全国各地。纽约报纸都用显著篇幅刊登照片，有用全面篇幅载出的。各报标题有的是：《中国人民争取生存》、《中国难民逃离日军魔掌》、《可怕的日军节节前进》。

三、沦陷前后的柳州

《新华日报》在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第二版上，用大字标题，在头条位置登出“敌分路犯柳州，梅江陷落、来宾有激战”的消息。以后几乎每天有柳州方面的战况报道。11月11日载：柳州柳城近郊激战，雒容陷落，敌犯来宾迁江。”13日载军委会十二日发表的战讯：“柳州城郊激战现继续中，双方伤亡都重。”14日载军委会十三日发表的战讯：“由东北两面向柳州进犯敌军，九日东面由三门江渡柳江猛犯东郊。另有二股由三门江以南渡江，一股经鸡喇街犯南郊，一股绕西犯南郊。北面敌军由大七南向北郊进扑，我军浴血迎战，在窖步村、大面圩、头背山、凤凰岭、兵营岭和火车北站等地和敌人搏斗，到十一日晚双方都有伤亡。十一日拂晓前敌军一股由火车北站突入市内，发生局部巷战，现仍进行中。”15日载14日战讯：“柳州巷战进行到十一日晨六时，我守军将突入的敌人歼灭大半，六时许敌人又陆续突进，各街巷都发生激战，搏杀至晚，我按预定计划安全进入新阵地。”至此，柳州全部在敌军控制之下。这群失去了人性的兽兵，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据《新华日报》民国三十四年（1945）一月二十四日报

道，“柳州成了死市”：“敌据柳州后，对我群众强行勒索，无所不为，近又迫令每一乡村出米百担，青年女子五十名，稍不遂意，烧杀随之。我民众愤敌暴行，纷纷离城或加入当地自卫队杀敌或设法内迁。现柳州城内已成死市”。七月五日，该报刊登了一篇中央社记者在柳州光复后的七月二日乘机在柳州上空俯视地面所见的通讯说：“当飞到柳州上空时俯视地面，所见到的只是矗立的危墙和一片红色的火烧后砖瓦而已。机场上敌人所埋的地雷正待清除，市区房屋十九被焚毁，从前的繁荣市场，已成一片瓦砾。河南损失比河北要重，幸存的房屋，河南只剩下十分之一、河北还剩十分之三四，但都已残破不全，比南宁受害更厉害。”22日刊登一则中央据美新闻处20日从柳州获得的电讯说：“日本人破坏柳州是有计划的，这远超出军队需要之外。敌人退出柳州时决定纵火焚烧，彻底破坏。敌人烧不到的地方就派傀儡汉奸去干。每烧毁劫掠一幢房屋得到法币三千元。敌人对每家居民给十分钟的时间搬运其贵重物品，然后敌人就任意掳掠，最后把剩余的一切搬回房内付之一炬。柳江河上铁路大桥已被敌人破坏。以前繁华城市，现在只剩躯壳了……”

1945年夏，从柳州西进之敌节节败退，6月中旬，《新华日报》几乎每天都有柳州方面的战讯。据军委会20日发表的战讯称：我军已攻克距柳州西南二十里处公路上之拉堡，该处距柳州城南飞机场仅十里。我军另两支部队于同时攻迫柳州西南两面郊区，正与敌战斗中。21日战讯称：……我沿宜柳公路线追击前进部队……至19日与沿柳邕公路东侧攻击部队会合于距柳州西南20里之思贤村地区，现正准备

协力向柳州郊区之敌攻击中。23日战讯称：我军继续沿黔桂铁路、柳邕公路和柳州公路线向柳州攻迫。我军攻达柳州城南飞机场及城西柳江南站之挺进部队，22日晨仍与敌激战。24日战讯：我军已进至柳州城西郊之柳江南站，协力挺进部队攻击据车站内顽抗之敌，至22日晚，毙敌百余。25日战讯：我军由长宁乡（柳州西南20里）沿黔桂铁路向柳州推进，略获进展。26日讯：……进至柳州城南机场地区之我军，正协力挺进部队向据飞机场顽敌攻击。柳州城西地区我军现已渡过柳江至东岸，并攻占距柳州西北10里处之据点。28日讯：我军25日完全攻克柳州西郊之柳州南站，同日并攻占城南飞机场一部。敌由城东南羊角山增援反扑，仍被我军击退，毙伤敌200余。我军扫落柳州西北洛满圩及西南三都圩各附近残敌，现已大部肃清。29日讯：我军27日完全攻占柳州城南飞机场……。30日讯：我军于29日下午12时克复柳州城。柳州沦陷七月又二旬，该处为黔桂铁路之接合站，该城为我克复后，黔桂铁路全段已完全重入我军掌握。

四、光复后的柳州

有一位中央社记者在柳州光复后的第四天陪同军方到柳视察后，有文章登在7月5日的《新华日报》说：“民众回来的已有三四百人，都徘徊路上，莫知所归。地方行政机关正从各乡赶回县城办理善后。据某负责人说，盘据柳州的敌人为了掩护西江残敌向桂柳溃退，因此用重兵分置于柳南作坚决顽抗，我军在口口、里高、穿山、鸡拉等地曾经几次和敌人激战。记者检视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发现有日皇日后

一圣旨一‘令旨’。一件说内外情势益形多难，汝其自重自戒。一件说战局日趋危急，值此帝国面临恒古未有重大时机之际，愿各自爱，勤勉奉公等语。足证明敌人之悲哀与没落。”该报7月13日刊登一则美联社记者于10日发出的电讯《柳州城内到处是地雷》说：日军从中国东南溃退的时候，柳州又遭一次战争洗礼。该城现仍时有爆炸物突然爆炸而引起死亡的事件发生。自7月2日以来，美国专家在柳州外前第十四航空队基地一带每天移去或引发地雷有20到30个，整个机场都是大地雷阵地，特别在跑道、汽车路及败退日军猛烈抵抗之处为然。甚至通往城内的道路也埋有地雷。”7月22日该报登了一篇美国新闻处7月20日发自柳州的电讯，题为《劫后柳州一片瓦砾》，文中说：“柳州全城已遭焚毁，这是敌人不必要的兽性的破坏的证明。柳州原是广西最繁华城市之一，现在寂无人声，中国军队收复柳州已有三周，柳州仍然是一片瓦砾与焦木，只剩下一付城市的躯壳，墙倒屋塌，无日无亡。本城人口一度数达十万，现在只有数千，难民已经有人回来。”

国立广西大学于10月12日已从榕江迁回柳州鹧鸪江，定25日复课。这一消息也在10月23日的报上登出。

抗战胜利后的柳州市民，没有享受过一天胜利的欢乐。10月23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柳州驻军虐杀人民》的“柳航讯”：“最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柳州及其附近地区接连发生了四次军队欺侮老百姓的案子。第一次是在9月16日，河南太平东街一巷二号居民梁老五，家营小生意，经常要备水数缸，但被驻军××军团输送二营六连

王排长建忠的强用了两缸，影响到梁老五的生意。当该排长再要占用第三缸时，梁老五因提出抗议，竟给该排长用梨木头活生生的殴伤，继即毙命。这事引起地方人士非常愤怒，该凶手暗中使人送抚恤费15万元。柳市警备部闻讯，即拟提该凶手法办，但没有结果。据说该凶手已坐飞机‘调走’了。第二次是在本月2日，河南驾鹤上街的一个老百姓给两个军人活生生的困死了，事后才发觉，死者又没有亲人，所以两个军人的姓名和番号都无法知道。第三次在本月3日，县属思贤乡帽盒村的村民黄发达，无故被××军第三团第二连士兵数人押起说是‘盗窃公物嫌疑’。黄发达家属向柳市警备部报讯，经该部两次调查，未获结果，黄发达也下落不明。第四次发生在本月4日，河南鱼峰路老龙巷三号的居民，在深晚时给不明番号的军人数名闯进屋内拉人，并未会同街甲长前去，且用武器威迫。这些事件的发生，柳市人士愤慨万分，大家都认为这是由于人权不被尊重，政治没有民主的缘故。”11月12日该报又有消息说：“柳州谷埠街10月14日有某部士兵硬指一苦力为逃兵，想拉去补充兵站，经苦力解说，士兵仍不理，竟动武殴打。后引起街邻公愤，纷纷喝下，警察赶来把士兵拉去始了事。”

10月28日该报有篇《柳州景象》的长篇通讯，反映了柳州当时各方面的情况，现在全文抄录于后：“5日晚间，河南接云路大火，整个河南的天空都烧红了，到更深未熄。事后统计共烧掉民房百间，大批灾民无处可宿，情形很凄惨。

“秋深北风高，市内危墙塌倒的常有所闻，夜间行人莫不惴惴自危，但当局全不去管，整天埋头于新市区图的设

计。

“柳市战前繁华景象到今天还没有恢复，除金银业外，其他各行生意都很清冷。百货、匹头、日用品虽自广州和广州湾等地源源运来，但商家见市面如此萧条，都袖手旁观，不愿收货。黄金交易曾经轰动一时，现在比较平静，只有银货仍很少，商人在这上面还可做些投机生意。百物中跌得最惨的算桐油，柳州光复时曾卖到二万元一担，现在跌到七千元一担，还不容易脱手。本省产桐很多，这一来，农人吃亏就大了。

“双十节晚间柳州提灯巡行。当局命令各机关团体学校都要参加，整个行列约有二里长，巡行市区时寂寂寥寥，连歌声也没有一句，许多五六岁的小学生也要跟着武装队伍一起跑，离柳州市30里以内的乡间各小学都要赶出来参加，为了表现‘万民腾欢，却苦了小孩子的腿’。

“市民渴望已久的电灯业部分恢复，小南路上的大金号和大商号都已经享受已有一年看不到的‘光明’，但旁的地方还在黑暗中。

“国立广西大学从榕江迁回柳州，择定城郊20多里远的鹧鸪江前十六集团军附设工读学校校址，定期上课。连日正在举行新旧生登记，来者寥寥，新生报名的日期也因此一延再延，但报名的并不多。这些日子里，读得起书的人一天天地减少了。

“在复员声中，滞留柳州急待回乡的人成千成万，但大多数都因为路途遥远，川资无着而不能就道。救济机关虽然整天‘忙’于办理救济难民回乡，但有名无实，黑幕重重，

比方最近到柳的，‘海龙’电船被封了，说是要先送难民回乡，所有上了船的自费回乡的人都被赶上岸，实际上怎样呢？船是被封了，搭到船的人是高价买黑市船票的‘高等难民’。

“把‘复员’做成‘复原’的，是近日过柳回桂的儿童教养院。许多被院方指定为‘成人’的小孩儿，发给了二千元作回乡遣散费。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亲人在哪里呢？他们全不晓得。去找职业吗，一则是没有熟人，没有社会关系。再则小孩儿能做些什么工作呢？他们拿了二千元离开了院，还不是跟以前一样，‘复原’为一个难民。因为柳州的美空军‘复原’弄得几千名依靠该基地吃饭的我国工人也‘复原’了。他们多数是外地人，没有任何生活的凭藉。机场小工李一中因生活无着跳江自杀，警察把他救起来之后，才知道他原来是广东军管区补充团的一个排长，因病为部队遗弃才到机场去做了小工。

“近日柳州市郊乡间拉夫的风气很盛，都是武装部队所干的，舆论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痛加抨击，听说专署已派武装队伍分别巡视，地方上的自卫队也自己来武装巡查了。抗战‘胜利’了，战争结束了，竟有人以为是神的力量，日前东大路上有人集资打‘平安醮’，请道士来敲钟念经，通宵达旦，当局并不加以阻止。”

兴复后，难民的遣返是个严重问题。11月16日该报有柳州通讯说：“滞留柳州难胞共七千多人，都因交通工具没法走不成，其中有五千多是需要救济生活的。交通工具是否真的缺乏？柳江河面上却冻结了几十只船，据说是为了应付‘突

然’的军运与‘不时之需’；另一方面有些船只因怕冻结也不敢行走了。”

该报也提到救济总署的工作。10月28日的柳州讯：“善后救济总署原在独山设有黔南办事处，九月初改迁柳州。主持者为高文伯，该处自都匀至柳州一线设有分处六所，工作对象是难民和灾区农民。工作方式分办理难民收容所、粥厂、医药卫生、发放种子耕牛贷款和运输难民等项，工作期间规定为三个月，经费两万万元。但因该处工作无计划性，且人事和会计制度都不健全，因此，使得工作十分零乱，工作效率也不见得高。该处对于各地卫生院经费的拨发也没有一定的原则，单是独山卫生院一处，连药品和经费共发了一万万元之巨。现因独山卫生院院长因手续不清，难于交代，已经逃跑。总之，由于上述种种缺点，真正用到难民和灾区农民身上的款子非常有限，而浪费的物资却实在太多，是善后救济工作目前急待改善的关键。”

9月17日 该报刊有《劫后柳州所见》：“疾病滋生——先是痢疾，继以霍乱，卫生机关药品奇缺，得病人只好听候命运安排，在瓦砾和垃圾堆边，随时可以发现无人过问的死尸。太阳晒久了苍蝇叮满了，臭气四溢，这又是散布病菌的源泉。”

“……战后柳州已不同了，敌人把山上的树木不是砍掉，就是烧光，木料贵得惊人，一片数分厚的旧板需要一万多元，一根直径不到五寸，长度不到两丈的柱子，要两万多元。于是人死装不起棺材，活人盖不起房子。唯一的例外是那专作嫖赌之用的场所——特察里却大兴土木。”

“一到夜里，柳州就被恐怖笼罩，电灯没有恢复，有人叩询电力厂长：何日见光明？回答是频频摇头。”

“夜的柳州除兴仁路菜场的那一段及小南路有夜市外，其余街道黑暗冷清，走夜路有三项危险：人和人相抢，踏着尚未发掘的地雷，被崩裂的危墙倒下压中。偷儿也在暗中活动……”

光复后，内战的阴影笼罩了全国，也笼罩了柳州。12月31日四版有篇题为《内战阴影》的柳州通讯报道：“几千个滞留在柳州市区的难民，全在死亡线上挣扎，期待着回故乡去的船只。然而，许多船只被封起来了，许多被用来运载美国的钢炮到不知什么地方去。谣言象长了翅膀似的到处传播着，人们十分清楚，在这些谣言里，包藏着一个险恶的阴谋，他们想利用这些谣言来做‘清乡’的藉口，以便实行捉人的勾当。”

“清乡从11月10日就开始了，11月22日中午，八个穿学生装的青年突然在小南路上被拉去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犯的什么罪。满街的老百姓都眼巴巴地望着，在街头巷尾，他们在交头接耳：‘这是怎么一回事’。”

“柳州成了一座恐怖的城市，街上抢案时起，白天，街道上的‘守望哨’已增为双岗；入夜，每一个路口，每一条街道上都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哨岗。‘口令’到处听到。每条街的‘冬防班’奉命组织起来，每到天黑时，街民就得轮流背着土枪或大刀，提着‘冬防班’的红字灯笼，举着白旗，五六人一队的到街道与市郊衔接的地方守着，警备司令部已于上月底奉令办理结束，最近又成立了一个‘军警督察

处‘该处第一件要务是宣布今后旅客出入市区都要检查。”

“恐怖不能压抑柳州民众声音，县府‘清乡’要各户实行五户联保，民众却以大家居住的流动性太大，谁也不能担负那些无中生有的冤枉责任而加以拒绝。”“11月12日晚上，在省立柳州中学的大礼堂里，聚集着近千青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音乐晚会，第一个节目是‘胜利带来了一切’，它告诉人们，胜利带来了什么，它坚决呐喊：‘胜利不能再带来战争’，博得了热烈鼓掌和欢呼。其次是‘民主颂’、‘春到人间’等，都得掌声。最后节目是‘民主是那样’、‘警告假民主之名做破坏民主之实的家伙’。”

1988年10月20日

柳州复华旅社

——中统在柳潜伏小组的掩护机构

王仁德

1936年作者在苏州筹建“吴县侨民国术研究社”时，陆树珊以吴县县党部特派员身份来会指导。其后，因武汉形势紧张，三镇行政人员及居民纷纷南下，我处在饥寒交迫之际，又遇到了陆树珊。当时他需要佣人，而我正要离开武汉谋生，便随他乘快利轮船，经岳阳到达长沙，转至衡阳罗家大屋，这是中统局本部临时办公地点。

陆树珊出生于1905年，江苏常熟人，是中统老牌特务。他带我在衡阳罗家大屋住时，还认识了梁辅成、徐政、陈庆斋、王国栋等中统特务。

1937年12月中统局派陆树珊潜赴福建厦门担任潜伏组长，郎小姐（苏州人，原是恋人，后成夫妇）和我当他助手。一切手续办妥之后，准备从湛江绕道至厦门。不料在衡阳车站，陆树珊与王国栋（运转科的人）发生争执，抓住中统实际人事支配权的梁辅成，早就看不惯陆树珊的傲慢态度，立即改派他到广西柳州，不去厦门，扣下应当领的特务经费，只发到柳的经费。任务仍是在柳州建立特务小组。到柳州后，陆的计划是：

①寻找潜伏掩护。掩护职业须是服务行业，接触广，消

息灵通。②要在1939年夏季完成外围掩护组织。③发展特务组织。④向重庆中统局联系（通过柳州交通罗维新一一中共叛徒上传下达，不久，他调贵阳）

陆树珊人肥高大，西装革履，以逃难大商家身份，在庆云路（中山中路）118号找到一家同德旅社招顶。同德老板名叫朗庆松，当过教师，又是基督教徒。陆冒充教友，因此得以顺利协商成交，改名为复华旅社。他自任经理，郎小姐管帐，我是服务员。同时留用同德帐房钟鼎充当业务，并报重庆中统局备案。

1938年二、三月，他自称是江苏逃难青年，参加高天骥、乐嗣炳、董咸熙、陈雄子所组织的“柳州文协”和“救亡歌咏队”，当文协选举组织负责人时，他与空军政治部主任要来参加投票，但当时因被发觉，未开票而结束。以后，高、董、陈到第四战区司令部开会时又碰见了，一般身份的人这个会是不能参加的。

陆树珊为人表面随和，经柳州日报记者查仲轩的介绍，他就经常到柳州日报社坐谈。报社内的编辑记者他都混熟了，各人叫都他做“陆胖”。

在柳州日报社认识记者刘雄后，他了解到刘在河南岸靠近山边岩洞有间茅屋，就把老婆带到刘雄家住了一个多星期，晚上总想找刘聊天。刘认为他既是商人，自己不懂生意经，不愿与他多谈。

原柳州日报社长董咸熙离职后，由林继茂接任，刘雄再到柳报工作，当刘碰到他时就说：“陆胖子，久违了”！后来林继茂对刘说：“陆是中统特派员，你怎么这样大胆叫他

做胖子？”这时，刘才醒悟，他屈驾光临茅舍，是有作用的。

陆树珊生活腐化，性情粗暴，克扣工资，作者长期受其欺压。就是他妻子郎小姐也不例外。他的身份暴露以后，就公开以特派员身份出现活动，在罗池路×号×庐买了一间房子把他老婆锁在楼上，据说是疯了。作者也于1940年春夏间跟随中统专员梁天华去贵阳。

《柳州日报》社长林继茂被柳州警备司令部逮捕，柳州警备司令是尹承纲。林继茂是林虎的侄孙，尹承纲又是林虎过去的部下。林继茂得林虎保释出来，对刘雄说：逮捕他是陆树珊干的，陆和钟可庄（军统人员）问过他几次话。

后来陆树珊调到铁路担任调查统计室的主任。柳州沦陷后不知去向。1945年光复后铁路调统室主任是鹿茂堂。

（本文经蒋霖核实了解有关人员修改补充）

龙虎关实战纪实

此篇回忆为秦永固、魏清议、马志武合作的。秦系当时教官，魏系当时中队区队长，马系当时回族中队学生。关于作战经过，十九期学生马志武同学由开始直至战斗结束都亲身经历，情况详述于后，请参阅作战汇报。

一九四四年五月中旬正值明媚的仲夏，火热的太阳，照耀着设在桂林李家村的桂林军校六分校。这时接军训部命令：六分校全体官兵、学生，立即开赴龙虎关与敌作实战训练。该地是历代兵家常争之地。当时正值九战区与四战区的结合部，若该地无驻军防守，敌可乘虚直入，达到其钳形攻势的战略目的，不但桂林守军的退路被切断，而且可直接威胁柳州。

我校于五月十八日由桂林李家村兵分两路出发。一路以十九期七、八队为主经临桂大圩出发；一路以十九期九、十队及练习营为主经阳朔出发，二十一日到达恭城。总指挥部就设在恭城。当时的总指挥官是六分校主任甘丽初，参谋长是教育处长张广君，所有教官全部安排于参谋处任作战参谋、联络参谋及后勤补给军需等职。军医处改作野战医院。

五月二十二日我总队由恭城向龙虎关挺进，经过一天的急行军，二十三日顺利到达目的地，并完成布防措施。与此同时，总队接总指挥部命令：必须于一周内完成一加强师的

防御阵地编成。经过一周之苦战，同学们的双手都磨起了泡，累得精疲力竭了。但是一想起修筑好工事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有效措施时，大家就唱起了我们自编的龙虎关战歌，鼓足力量。

我们在龙虎关上，
我们在龙虎关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那里进攻，
我们就叫他在那里投降。
敌人从那里进攻，
我们就叫他在那里灭亡。

我们终于按期完成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形成了龙盘虎据之势。

在完成上述的各项任务后，我们就分组深入群众中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有的同学负责书写抗日标语，并于标语的后下方标明总队代号“丽字部队一点，九、十”字样；有的负责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工作。

根据总队部署，在战斗打响以前，必须做好下列几项工作：

一、肃清汉奸敌特拔掉敌人耳目。

我们分突击与按户两种方式进行搜索。所谓突击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侦查及群众的反映，认为可疑性大的并有一定反抗能力的地方进行突击包围搜查，这是强制性的。所谓按户搜索就是配合地方政府人员，象平时检查户口一样，按户

进行检查，务必要保持一定的群众关系。在军民间要造成良好的影响。同时在外围已布置好人员，凡是在检查期间企图逃跑的人，一律抓获收审。

在检查第一个突击点时就碰了一个钉子。“你们是那部分的？”回答是：“桂林美专。”你们除了画板画笔之外为什么还有手枪与电台？请出示派司。”“你们没有资格检查我们。”回答不但傲慢而且很倔强。大有看不起我们这些无名小卒的意味。（他们那里知道我们都是些天不怕、地不怕，越硬越要啃的特殊小兵啊。）他们既不肯说明来路，又不肯出示派司。“这是我们的防区，我们有权执行任务。那么我们就不客气了。”他们无奈改口说：“只有你们驻军的最高长官方可查看我们的派司，这是上级的规定。”“好，那么就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吧。”于是将其一夥人等押至总队部时，才知道他们是军政部调查统计处派遣至龙虎关的特工小组人员。就这样，一场误会很快就解决了。当即退还武器电台。将其释放。

当进行突击第二点时，遇到的情况是当地的群众组织打着为抗日阵亡将士超度的美名作掩护，设置道场。招来很多不明真相的善男信女参与其间活动。秩序很混乱。在这次突击检查中，仅于密室中抓获敌发报员一员，缴得昭和十五年制日式手枪一支、电台一部。其他协从人员被混入群众中逃跑了。经审讯，得供词如下：该敌特 名金谋辉，东北人，系土肥原亲自培训的学生，直属岡村宁次指挥。他的发报的内容是：“龙虎关地区，约一个师的防御工事。无炮兵。有十一个总队九十多个中队的青年军防守，活动很困难。”经审讯

后认为所供情况基本属实，即送当地政府关押处置。

二、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

根据总指挥部命令：我总队及练习营全体官兵必须阻击日军于龙虎关以外，并给予严重的打击的指示精神，自即日起我总队就分批深入附近的群众，帮助他们实行坚壁清野；把所有的粮食、牲口、老弱妇孺，都疏散到山区安全地带，并把有劳动力的青壮年组织起来做支前工作。……这样一来既保护了群众的安全，又利于我们的战斗行动。

三、扫清射界；

在预定的阵地前沿一带，扫清一切射界，以利达到消灭敢于来犯之敌的目的。发动群众和我们一道破坏由龙虎关以东周围百里内的公路桥梁，并在主要隘口设置路障，埋设地雷，以迟滞日军的进攻行动。从而在完成逐段破路与敌节节纠缠的目的。完成上述工作后，根据群众反映，向我逼近的日军，不但山野炮不能接近我阵地，就连重机枪迫击炮都改用骡马驮载迟滞地前进。

四、激战开始；

一九四四年六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接到我便衣侦察人员的情报：“集结于江华、道渠、永明之敌，约一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我龙虎关方向逐段搜索地涌来。……”情况来得突然又紧急。

前敌指挥部即下达命令：第八、第十中队进入龙山一带阵地；第七、第九中队进入虎山一带阵地；练习营进入关口正面两侧主峰一带阵地。待敌深入时，一股而歼灭之。

各部队于六月十九日接到命令后，即按指定地点进入阵

地。严阵以待。同学们都磨拳擦掌地准备着消灭敢于来犯之敌。与此同时即派出一个区队的兵力进入阵地前沿预想敌人必经之处，组成坟墓式的暗堡，形成一个袋形的伏击圈，待敌进入伏击火网时，予以沉重的打击。布置完毕后不久，果不出所料，日军的一支骑兵搜索队出现了。像群饿狼似的挥舞着战刀，逼近我前沿阵地。阵地上的同学们在暗堡里全神贯注盯视着敌人的动向，待敌人进入有效伏击火网时，区队长一声令下：“打”！暗堡里的机枪立刻怒吼起来。同时所有步枪手榴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予鬼子骑兵猛烈的打击。这时鬼子骑士作梦也想不到在这样本可发挥着骑兵固有优势的开阔地形里会有埋伏。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人仰马翻乱作一团。鬼子军官挥舞着战刀哇哇乱叫地指挥着残兵败将进行顽抗。我们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向区队长建议，区队长断然采纳了同学们的意见，当即命令集中火力先消灭敌指挥官。鬼子骑兵失掉了指挥，都纷纷调转马头，边打边退。这时我前敌指挥所在主峰上已观察到前沿阵地已胜利地完成了触角性的阻击任务，当即命令重机枪迫击炮以火力掩护着前沿阵地上的同学们安全撤回主阵地。

翌日拂晓，鬼子以一个营的兵力，团团围住了我们已撤走了的坟墓式的暗堡群并集中所有的轻重武器向该地区狂轰乱打，企图先拔掉我前沿据点，以利其大部队的进攻。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瞎打乱轰后，见没有任何反应，这时天已大亮了。敌指挥官一看，除了昨日所遗下的鬼子骑兵尸体及死伤的战马外，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看见。这时敌人才知道上了大当。就这样敌人不但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同时也给我主阵地

发出了紧急警报，从而赢得了主动，据前敌指挥所的观察判断，敌人约一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主阵地逼近。停滞于湘境的粗石江彼岸，看布阵是企图采取两翼包围，中央突破。所以将重兵散布于关口正面一带，我们的对策是利用坚固的工事及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实行阵地上的运动战。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地阻歼敌人的进攻。

观此形势预想敌人一定企图首先强渡抢攻我突出的滩头阵地，我们只有利用夜间作业，加固其工事及阵地前沿的鹿柴并在浅水暗桩中增设土水雷，在梯恩梯黄色炸药中装上雷管及导火线，一旦敌人接近时，在暗堡中将起爆机一按即可爆炸。不出所料，在当天中午，鬼子的三十多只橡皮艇在其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向我正面的滩头阵地反复三次的强渡猛攻。当十余只橡皮艇接近我暗桩时，都给我预设的土水雷炸得人仰艇翻，剩余十余只，直至日暮时才退了回去。晚间只是断断续续的枪声在两崖对峙着，敌人再也不敢前进一步。

次日拂晓，发现鬼子在一夜之间集中全力将附近的民房全部拆光，将其木料扎成一百多只木排。敌人除了少数习水性的工兵支撑外，其余都是些旱鸭子，每只木排上都架着机枪与小炮，在其强大的火力掩护下，从彼岸向我沿河滩头阵地再渡进攻。待其木排进至江心时，我主阵地火力才进行猛烈的反击。打得敌人木排在江心中团团乱转，不知所措。有的被炮弹和水雷炸翻跌入江中，以饱鱼腹，敌人虽用尽了所有的优势火力向我左右及正面反复的轮番攻击，结果都被我军打得伤亡惨重，狼狈地退了回去。虽然我主阵地在敌人集中火力轰击下，有许多工事被震垮，部份交通壕被炸平了，少数同

学挂了彩、然而我主阵地巍然屹立，固若金汤。敌人未能前进一步。两天来敌人遭遇了反复惨败，再也不敢冒然的进攻了。因而双方仍保持着以火力对峙着战斗。当时的情况是敌众我寡，孤军无援，但是我军已胜利地完成了上级所交给我们的阻击任务。

总指挥部据此情况，于当日下午（二十一日）即派来九架战斗机，首先是在我军阵地上空盘旋了三周，表示要求我军指示敌我之明确位置以利其战斗。当时我军的通讯设备较差，不但没有对空联络的报话机，就连最简单的对空联络布版都没有。同学们就将自己的白衬衣铺在地上作布版，指示敌我位置。于是我空军分三组在敌占区上空轮番扫射轰炸，打得鬼子军抬不起头来，与此同时，我前敌指挥所接到总指挥部命令：星夜撤退，并将剩余的枪支弹药，军需补给等配合支前民工运至龙围山区。留练习营一部官兵配合当地的游击队组织，建立敌后根据地，与敌长期周旋。完成任务后我部由龙围经恭城向平乐方向转进。到平乐后才交给四战区张发奎部的九十三军接了防。少数挂彩的同学也逐渐康复了。大家愉快地接受新的训练任务。

抗日初期柳州日报的片断回忆

刘 雄

三十年代初，柳州曾经出版过一份柳江日报。其社址设在东门大街口对面（现在罗池路教育幼儿园），省立四中教师胡行健曾在该报任编辑。当时的外勤记者叫采访员。那时我任屏山镇镇长，他们曾向我进行采访，因此这个称呼我记得很清楚。至于该报何时何故停刊，我则不甚了解。

一九三六年杨恩震、蒋必舞二人创办一张四开版《柳州三日刊》，他们没有什么组织目的和政治背景，只是凭一股对文艺事业的爱好热情搞起来的，他们创办时，无社址、无经费、无职工、无工场、无政治后台，他们两人自己写稿，自己编辑好之后，委托柳州独一无二的生盛昌印务局承印，如此新闻机构，势难长存，更难有发展的希望，它大约出了十多期就寿终正寝了。

同年尾，驻防柳州的最高军事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七军军长廖磊，属其政治处处长胡学林和柳江县长杨盟，与杨、蒋二人洽商，结果把杨、蒋二人创办的《柳州三日刊》接收过来，改为《柳州日报》。改组后的社址设在福建会馆（现在的柳州剧场）。第一任社长是柳江县县长杨盟，总编辑是胡学林，副总编辑是省立四中校长潘振，他们都是挂个空名——兼职的，负实际编辑工作的是梁琴生。梁是梧州人，曾在香港办过报，为人谨慎，工作认真，学识渊

博，办报经验丰富，芦仲德、蒋必舞任记者，李经伦任经理，杨宇中任营业员，黄××任庶务，司徒安任机房领班，林绍初任字房领班，报纸的电讯消息由第七军电台供稿，全社职工二三十人，全报社经费由七军与柳江县政府津贴。

报社成立不久，第七军军部缉获两大卡车走私的鸦片烟土，军长下令将烟土及卡车一概充公拍卖，所得的款，一部分作为建筑体育场演讲台及围墙（现在的市府大院），其余交柳州日报社作为基金。

一九三七年二月，经理李经伦、记者卢仲德、蒋必舞先后去职，刘雄、吴刚、查仲轩充任记者，杨宇中调升经理。不久吴刚脱离报社，他走前介绍廖大光继任，梁琴生介绍彭树椿任助理编辑。

以前杨、蒋二人创办的三日刊，没有什么政治后台，其所刊出的内容，大体是一些新的诗歌和短小的散文，很少带有什么政治色彩的文章，三日刊改为柳州日报后，便成为柳州军政机关的喉舌，各机关上呈下达的文件，经改头换面后就作为新闻发表。

第七军是属于李、白精心经营的一支部队，在北伐时，号称钢军。一九二九年李、白与蒋介石军事集团因不可告人的事而发生兵戎相见，当时蒋处于优势，好在李、白有廖磊助予一臂之力才得逃回广西，重新收集残部，于是第四集团军这招牌在南宁又挂了起来，而蒋受其它势力牵制，对李、白不得不让一步，暂时听之任之。李、白也懂得有朝一日蒋介石总会把这眼中钉——广西的李、白除掉，因而不得不未雨绸缪，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作为重整旗鼓的奋斗目标。

标，其具体的做法是实行三自三寓政策。行新政用新人等来壮大自己，用以防范蒋介石剪除异己的阴谋诡计，广西所有报刊当然成为李、白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宣传工具。但当时，特别是“九一八”起，抗日成为全国一致的呼声，“双十二”事件起，抗日呼声更进了一层。广西的报刊，除了宣传抗日的內容，不管李、白抗日诚心的份量有多少，而广西报刊宣传抗日却是事实的存在，柳州三日刊改为柳州日报后，成为李、白军事集团的有力喉舌，而不再是三日刊那样的性质了。

“双十二”事件是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采取兵谏的方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事件，此事件一起，全国抗日呼声便高入云霄。蒋介石为此形势所逼，不得不改弦更张，提出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老少，一致投入抗日阵线中去。《柳州日报》也成为抗日救国为主要內容的报刊。由于形势需要，报纸的销路与日俱增，区属各县纷纷来函订购，不但报费收入日增，广告费收入也大有可观，可以说完全达到以报养报的境地。由于报纸销量大增，各方面也不得不随之扩展。这时报社已自设电台聘请电务人员，专收国内外通讯社所发的电稿如中央社、合众社、塔斯社、路透社等发出的消息都一概接收后分别选取录用。

七七抗日烽火燃烧后，第七军离柳北上抗日，杨盟县长离职，其社长兼职交由龙城中学校长高天骥兼任，高接社长后，报社人事有些变动，陈秉生任经理，曾纪华任营业主任，胡学林兼总编的职务交由第七军留守处处长马典符兼任。

一九三八年，日机疯狂普遍轰炸我后方不设防城市。柳州也在日机轰炸之列，七八月间大批日机袭柳，从东边的牛皮厂码头起，沿更新亭、北较场、一路塘、西门等都遭日机轮番轰炸。平民遭受死伤均有数百人之多。柳州日报社工场正中一弹，字房遭毁，字颗变成了弹片，送报工人吴四罹难，全社职工因之人心惶惶，因此报社想方设法把工场迁到郊外盐冲口（现在的市委傍），并盖临时工场。而编辑、采访两部仍在市区，但敌机夜以继日轮番来袭，全市实行灯火管制，工场仍未能工作，搬迁等于不搬，因之又再考虑二次搬迁。高天骥社长决定迁鹧鸪江。那里离市区不远不近，大家认为相当理想，有一栋私人榨糖用的工房可容纳编辑部及电台、印刷工场之用。至于采访和经理部仍留在市区。鹧鸪江与市区相去十多里，采访得的稿件及广告在当天下午送到编辑部，明日即可刊出。而下午四时以后才送达的稿件和广告，只好顺延一日，因此，发行受交通影响和延误，报纸销路急剧下降。且报社同仁的日常生活也感到不便，如有病就医更难，编辑梁永生就是患病未得及时诊治而丧生。经过几度搬迁，职工精疲力竭，报纸销路下降，社长高天骥因此辞职，遗社长一职由马典符继任，马接任后，人员变动很大，查仲轩任经理，陆苍夫任主任编辑，由彭树椿介绍吴越任记者，刘雄调充编辑，又将工场由鹧鸪江迁回马鞍山半山腰的大岩洞。这时正是日寇二次进攻南宁，昆仑关敌我混战，四战区下令柳州疏散，报社又将字房印刷机搬下山脚，装箱下船，准备疏散长安（现融安），后来接前线电报，昆仑关敌被我击溃，于是又从船上将装箱的机器字颗起岸，又在山脚抢

盖一间临时工场，这时才稍安定下来。

自武汉、广州失守后，白报纸来源短缺，不得不采用土报纸印刷，加之字颗老化，无法补充，印出来的报纸模糊不清，销量又一度下降，广告费收入也同时锐减。四战区《阵中日报》又出版竞争。《柳州日报》大有摇摇欲坠之势。马典符辞社长职，由专员公署秘书陆雁峰继任，经理查仲轩离开柳报，我被调到抗日动员委员会任秘书。我未接到通知前就自动离职回家。我离柳报后，陆雁峰被免职，董咸熙以广西省党部驻柳特派员身份接陆雁峰任社长。此时总编辑由彭树椿担任，曾敏之任采访主任。

一九三八年尹承纲接任柳州行政督察专员，他正式委派林继茂为柳州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又兼伤兵之友社总干事。同年五月林亲到我家邀我回柳州日报社工作。并说尹专员也有这样希望，因此我不得不再作冯妇。我第二次回到报社接替曾敏之的采访主任，曾改任副刊编辑。不久，报社突然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副刊文章中出现把汽车司机称为车夫称谓，一大批司机来报社闹事，他们将柳州日报社招牌打落地下，声言要找编辑记者问罪。当时得到汽车工会调停，一场闹事风波才告平息。

林继茂任社长时，得尹承纲大力支持，《柳州日报》由四开版改为对开版，此外还增加一个四开版的柳州晚报，晚报经费来自柳州商会。其内容大部分是报道当天的商业行情和经济动态，也有战讯和省市新闻。晚报编辑是谢落生，杨××任记者。他们两人工资是由商会支付。《柳州日报》由四开改为对开，当然人员不得不增加，总编辑由林继茂兼

任，李文顯、曾敏之、彭树椿任編輯，刘雄、雷 霽、赖 贵安、张焕宁、吴越任记者；武汉、广州失守后，许多新闻工作者如潮水一般向桂柳涌来，柳州新闻事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外埠大报均派有驻柳人员，陈凡是大公报驻柳特派员。侯本珍是扫荡报驻柳记者，王平是力报驻柳记者，张兆汉是广西日报驻柳记者。当时在柳先后出版的报纸有：《中正》、《阵中》、《前锋》、《立言》、《立鱼峰》等报。各报都有其自己的内容和特点代表着各种势力，但总的来说，打着宣传团结抗战的旗帜方面则是一致的。

柳州日报改版以来，编辑与工场都是分开的，工场在马鞍山脚，编辑部仍在福建会馆。那时已有新闻检查所，配属于四战区政治部，所长是赖振家，他挂中校衔。新闻检查所之成立，给各报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和不便。如省市新闻和特写、社论等，必须送检，其内容涉及民主二字的文章，必然遭扣留。我们的对策则留着版面空格。编者术语叫做开天窗。

《柳州日报》工场与编辑部长期隔离，对工作有许多不便，但是也无法解决，最后我建议尹承纲（尹是兼伤兵之友社理事长，将伤兵之友社在银行的存款用来建伤兵之友社社址，（当时我是柳州日报采访主任兼伤兵之友社总干事）尹十分赞同，我将所存的款尽数取出，在河南白虎庙空地（即现在驾鹤办事处）建造一栋前面两层楼房、后面三排平房的房子，报社占三分之二，伤友社占三分之一。自此报社才有固定社址。

报社迁入新址不久，林社长聘罗培元任编辑主任，张

琛、邓帮俊、陈平伯、吴启燕等任编辑，采访部增添了温流、朱宗、胡清涛、李文等记者。后来林继茂因事被捕，遗社长一职由专署助理秘书黄炎桑继任，罗培元调任总编辑，张琛为编辑主任，关伯安任编辑，刘雄调任经理，吴启燕接采访主任，不久黄炎桑去职，社长由罗培元接任。

一九四四年日寇陷柳州，我离报社到民团指挥部工作。柳州日报社迁罗城县的龙岸乡，日寇投降后，柳州日报返柳，社址设在东门城楼。不久改为广西日报柳州版，罗培元任社长。

关于柳州邮政贪污案的补充资料

陈侠生整理

《柳州文史资料》第四辑有一篇苏德润先生遗稿《柳州邮政的开始及抗战末期邮政贪污案》。现据《新华日报》对此案的报道作如下补充，以供参考。

民国三十三年（1944）八月十二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刊登了一则柳州七月三十日的通讯：柳市邮局包裹组长朱宝藩在六月二十四日因奉命疏散，停止接收邮包时，违令续收五天的包裹几千件，并将收邮日期涂改为二十三日。经各方检举人查明，曾经在二十六日由海关签发单据的一千八百六十八件，二十七日二十五件，其余没有报关的还很多。该局现将朱停职查办，并派监察视察员各一人彻查，省局长曾玉明会同总局视察员到柳视察，今午招待记者，报告进行情况。本市各报对这个案子连日都有文字刊载，并发表该局临时差员黄文俊曾受主使，勒加运费每件百元，由部内人员按数分摊的黑幕。各方对这事都盼望严予法办，以阻止贪污的风气。

九月十三日，《新华日报》在报道柳州的消息时，又提到了这宗“最引人注目的邮局包裹舞弊案”说：八月十五日，本市各报都接到了署名“柳州邮局同人”的信，对于其中黑幕揭露得很详细。其中还指出：在幕后有某某等许多人替这案子撑腰、包庇、纵容，又说某某奔走最力，腰怀手

枪，对揭发案件人采取个别谈话方式，威胁利诱，无所不至，并声言不惜以小冲突演变为大流血。因此包工组长朱宝藩竟借故避见，由别人居间传达消息，一再延宕缴检关单和收寄详情单。总计共非法收了包裹费一百二十六万元，许多贪污情形，在柳州邮局已成公开秘密。邮局同人的信中，希望对有关人员一一严办。接着，却在报上来了一个启事，用“真柳州邮局同人”的名义加以否认。但是真是假，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九月十九日，《新华日报》又在二版发了一则“中央社八月三十日电”谈及朱宝藩案：朱案经各方检举后邮局当将朱送地方法院讯办，经法院侦查认定，朱是公务员，已转送军法执行监法办。又邮佐张九龄、局差黄文俊、李俊杰联同舞弊，各摊有巨额现款，近来因案情揭发，畏罪潜逃无踪，邮局已写信给治安当局追缉归案究办。

至于柳州邮政贪污案的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此后，《新华日报》也没有再报道这一案件，望知情者提供更详细的情况。

柳州青年学生抗议美军暴行

——“沈崇事件”在柳引起的波澜

柯 阳

1946年春，国民党当局撕毁了“双十协定”，破坏和谈，美国军队占驻我国的北平、天津和秦皇岛一带，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全面内战，大量的美军拥进我国领土，并四处横行霸道。十二月廿四日晚，美国士兵在北平东单练兵场侮辱北大女学生沈崇，激起了北平、武汉、天津、上海、南京、广州、西安等几十个大中城市青年学生的义愤，他们以游行、罢课、示威来抗议美军制造的“沈崇事件”，申讨美军暴行。

北平、南京、上海、武汉、西安、重庆、广州等各大城市的一封封抗议通电抗议书，象熊熊的怒火在全国各地燃烧。清华、北大、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大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一张张宣言、传单象黄河、长江的怒涛向全国各地奔流。

柳州中学（后改为柳州高中）学生自治会收到这些通电宣言、传单后，大家都燃起了满腔怒火。在教室、在球场、在新桥的走道上，三五成群的同学在议论着。在各地的通电宣言中，革命和进步的报刊杂志中，号召所有的全国大学生，一致起来抗议美军暴行，反对内战，争取实现和平民主。

柳州如何搞呢？柳中学生自治会主席梧裕茂同学，在一天夜里找到中共柳州地下党的岑友鲲汇报和请示。

柳州地下党领导机关经过研究后通过岑友鲲给我们提出了方案，作了具体部署：（一）由柳中学生自治会出面，召开柳州各中学的联席会议，研究决定抗暴具体事宜；（二）在联席会议上具体提出组织成立“柳州学生联合会”（简称柳州学联）；（三）学联今后的工作活动及方向，先行秘密组成建立，后公开出面开展活动，以合法组织名义，开展合法斗争；（四）在柳州各中学学校内，召开中小型会，声讨美军暴行，揭露国民党政府假民主、真内战的阴谋；（五）以柳州各中学（学联）发印通电、宣言、传单至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声援北大，抗议美军暴行。

在一个寒风袭人的冬夜，在寂黑宁静的柳中礼堂里，柳州各中学的学生代表围坐在煤油灯下，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柳中学治会主席梧裕茂主持，我（当时叫柯国雄）作记录。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学生代表谢光泽、柳江县立中学（现市二中）、柳庆师范（现柳州师范）、中正中学、龙城中学也派来了代表，大道中学因在鹧鸪江，路远，又是晚上，代表没有到会。

会议按照中共柳州地下党的部署，由柳中代表首先提出组织柳州学生联合会的建议，先由各中等学校组成后，逐步扩大到各小学的教师。

建议被会议一致通过，同时选举柳中梧裕茂为学联主席，柳州高工谢光泽为副主席，其余学校代表为委员。由柳中梧裕茂同学宣读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

学给柳州中学抗议美军暴行的通电宣言。当场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一致表示要声援、要抗议。最后一致通过以各学校联名发通电宣言响应抗议美军暴行。

当时，各学校同学正在忙期考。同时我们已知悉国民党反动派已布置了一些宪兵、特务化装到各学校监视进步同学。为安全起见，暂不搞大型声讨会及罢课游行，只在各学校内召开小型座谈会，宣传声讨美军暴行并由柳州各中学联合印发通电宣言至全国。会议决定：印通电宣言的经费，由各学校学治会会费中提部份开支，先由柳中学治会会费中垫支。会议还就如何分发送出传单等问题，作了研究，直到夜深人静的凌晨12点才散会。

柳中礼堂的联席会议后，我们察觉国民党已派出一批特务在监视青年学生的活动，四处打听我们到哪里去印传单和通电宣言，说明有人泄密。一天，在东台路上，中正中学那两位代表向我打听宣言传单在哪里印，引起我的警觉，便回答说：“派人到桂林去印了。”

又是一个寒风袭人的夜里，我和梧裕茂两人，漫步在中山路上，当他们走到国民党专署（现中山东路52号大院）门口不远时，便看到一个矮肥中等身材的人，从联华印刷厂（现中山东路28号）走了出来，我们抢快走两步，便和这个人接头。这人就是联华印刷厂的经理、地下党员岑友鲲。梧裕茂同学马上把草拟的宣言传单草稿交给他，岑友鲲迅速接过又望望路的两头，低声说：“一星期后来取”。随后我们便马上分开走了。

联华印刷厂是中共柳州地下党以公开合法身份办的。我

们的宣言稿子修改得简明有力后送去，他们很快的连夜组织拣字排版，岑友姆也亲自踩机印刷。

我们付印的宣言传单内容，主要是抗议美军暴行，声援北大的罢课正义行动，反对内战、要求国民党实现民主和平！宣言约七百字，最后是以柳州中学、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柳江县立中学、龙城中学等学治会署名。

这批传单，因数量大，我们由三批人分三次用麻袋去取回，分藏在城内可靠民家。

由于已是严冬，各学校都已放寒假，从县里来的同学，都先后回了家，散发传单的工作多由住在柳州的同学来负责。其中大部分是由柳中的同学用麻袋取回后即用邮寄出，部分分给柳州高工、柳江县中、龙城中学的学治会发出。按计划，是先发外地各省市大中学校，后发省内各县大中小学，最后才在柳州城内各单位机关学校发，发信时应通过各学校的同学，以寄信给同学的名义——某同学收，不写发出地址。有一部分附近县份如武宣、柳城、来宾，给人带去交给同学发；也有一部分送到桂林通过西大、桂中的同学发。

柳州各中学联合印发的传单，一份份送往各地，同时我们也收到各地大中学校发来的通电、传单，表示在声讨美军暴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心心相印、互相支持。

柳州“立法委员”竞选见闻

杨育晞

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一方面向解放区大肆举行军事进攻，把内战推向高潮；一方面又以国民政府名义公布《中华民国宪法》，着手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施展反革命的两手策略。

国民党实行所谓宪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分立”。实施立法权的机构是立法院，从名义上说，凡属国家重大法规均得由它制订或通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其重要性非同一般。

当时的《选举法》规定，一百万人口产生一名“立法委员”（以下简称“立委”）。一九四七年冬广西“立委”选举工作开始进行。那时全省人口一千五百万，另外还从教育团体和妇女界单独各选一名，全省共可选十七名。为了平衡分配，将全省分为三个选区，桂林、平乐、柳州三个地区人口共约五百万，划作一片，是为第一选区。

柳州（那时是柳江县）及其附近几个县产生一名“立委”。尽管“立委”不过是点缀品，但却是所谓的“民意代表”，其地位颇有点象美国的参议员那么显赫，每月可拿几乎相当两个大学教授的薪水，另有“车马费”等各项津贴，再加上随着“立委”这街头而来的种种说不完的好处。如此美差，实在令那班当官当腻了的权势人物垂涎三尺。

柳州本地有本事敢为夺取“立委”一争高低的，仅张任民和覃连芳二人而已；另有些人也想，只不过是“狗吃月亮——差得远”。张任民参加“立委”竞选前是广西省保安副司令、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向来是李、白、黄的亲信。覃连芳抗日战争期间当过军长和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团长，上将军衔。覃连芳早就与李、白、黄有芥蒂，终至反目。蒋介石曾笼络他，并利用他分化桂系，但没有成功，后来见他用处不大，也就不理他了。他不甘寂寞，于是乘“行宪”之机，弃国民党而向民社党靠拢，企图另辟蹊径，东山再起。两相比较，张任民属当权派，有国民党和李、白、黄的支持，省政府私下给他送大笔“竞选费”，显然占着优势。覃连芳明知取胜不易，但自恃有“民主政党”的支持，名声似乎比国民党好听些，同时在地方上有一批可供他指使的大小实力人物，凭借这些，可以搏一搏。

我父亲杨义一九四七年秋甫卸任柳江县长就赶上“立委”竞选。杨家同张家是至亲，张任民的母亲是杨义的亲姑妈。两家常来常往，张任民公余回柳常来我家向舅妈（我的祖母）请安，杨义在政治上也得过这位表哥的关照。我们家同覃连芳也是亲戚，我外祖父的姑妈是覃的祖母。覃与其元原配夫人仅生一子，名德庆，钟爱非常。我叫德庆为德德表哥，因为年纪差不多，儿时常在一起玩。抗战初期，德庆患“白喉”不治夭折，覃连芳夫妇悲痛难以名状。抗战胜利后我们同覃家便疏远了。覃连芳偶尔也上街溜达，蓄一撮“仁丹”胡子，足登马靴，牵着一头大狼狗，大摇大摆，板着个脸，旁若无人。尽管大家都是亲戚，可是我并不知道覃连芳

与张任民以及我父亲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和矛盾；但看见覃连芳那副臭派头，本能上我就讨厌他；遇到这位表舅爹，老远我就走过一边，懒得同他打招呼。

张任民参加竞选之始，就邀杨义、县参议会议长、父亲的知交刘克初等共商助选事宜。杨、刘又串联了唐纪、陈如平、龙孝坚、王剑功、董咸熙、高天骥、翁振翼等地方知名人士。他们常在张家或我家聚会，还分头在柳州城乡和到附近的一些县，请当地的当权人物和相信得过的人士吃饭、开会，布置他们帮拉选票。为帮表哥拉票父亲成天东奔西跑，有时几天不见他的面，家里来的客人也多于平日，比他当县长时还忙。

那时我家住古香东路（今曙光东路）。这条街的街长姓黄，名字已记不起，老百姓背后叫他黄老虎。此人个子矮，年纪四十上下，一脸横肉，好象还有几颗麻子，是个沙喉咙。他这黄老虎的外号是得自于他的长相，还是因为他平日鱼肉百姓，欺凌善良，就不得而知了。投票选举前不久，竞选进入白热化，各自拥戴张、覃的红绿标语贴满街市，还出现了一些互相攻讦、揭丑的“白头贴”（类似“文革”时不署名的“小字报”），人们感兴趣的还是这些比黄色小报的“花边新闻”更“精采”的“白头贴”，围观如堵。一天，父亲把黄老虎请了来，把我也叫了去，当面拿出一大叠张任民的名片，叫黄老虎陪我去本街动员选民投张的票。这事可叫我为了难。要知道，那时我只不过是个懂事不多的初中学生而已，平日唯一关心的是学好数、理、化，对“选举”这类闹剧根本不感兴趣；再说人家见我这“娃仔头”的样子会理

我吗？父亲见我面有难色便说：“没有什么的。你就把名片交给各家的大人们，请他们选你二表伯，有什么难处还有黄街长嘛！”虽然不情愿，父命难违，还是硬着头皮去了。黄老虎领着我，先走古香东路，再经梳子街（今曙光东路南三巷）折回来，挨家挨户找当家的大人。无论是谁，我都毕恭毕敬地双手送上一张名片，请他们投张任民先生一票，再多的话我就不会说了。黄老虎到底是个街长，看人说话：见是大户人家就点头哈腰，笑容可掬；到小户人家便换了一副面孔，指指点点地说：“记得了吗？到选举那天，你们就照着这上头（指名片）的名字打圈圈，莫圈错了哦！”受我们拜访的街坊邻里，许多人神情漠然，喃喃以对，实在看不出他们对此选举的热情何在。事前事后我都没有问过父亲：为什么让我同黄老虎一道去送名片？我猜想大概是要借助街长这“地头蛇”的作用，但又对这位老兄是否老实感到不大放心，只好把我这“娃娃兵”也派去临阵监督吧。

开票结果不出多数人所料，张任民当选，覃连芳落选。过了几天，一位本家叔叔兴冲冲地跑来我家，悄悄告诉我们一桩“秘密”。旧社会兴讲“同姓一家亲”，我伯父杨谨倡乐于此道，同柳州及附近一些有点名堂的杨姓人家都认了“本家”，称兄道弟，有事相帮。当初伯父办娱乐戏院（今人民电影院），照顾这位本家叔叔在戏院门口最当众的地点摆了个水果摊，后来又让他在戏院里当“带位”（相当现在的服务员）；我父亲当县长时，又让他在柳西镇镇公所当了个办事员。那时柳州城区对河两岸划为柳东镇、柳西镇和屏山镇，各设镇公所和镇长，街道设街长。“立委”选举投票结束那天，说是时间已晚，到第二天才开票。便当众将票箱

加锁贴封条，分别集中到各镇公所，派专人通宵看守。本家叔叔讲的“秘密”就发生在那天晚上。他是“选举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负责“看守”保存在柳西镇的票箱。他伙同其他“工作人员”连夜把因没来投票而封存的空白选票搞出来，通通在张任民名字头上打圈，再全数塞进票箱。这套“偷天换日”的把戏讲得起劲的时候，本家叔叔那绘声绘色、唾沫横飞、好不得意的样子，至今仍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经过这次“立委”选举，使我懂得了不少想象不到的事情，一下子变得成熟了许多，对国民党会改弦易辙的一线希望也彻底幻灭了。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马平及柳州县易名时间及缘由

梁志强

马平县于何时因何改名为柳州县？柳州县又于何时改名为柳江县？长期以来，说法不一。最近，笔者查阅了当时一些报刊和档案资料，所得结果如下，特提供研究参考。

民十九（1930）年前，柳州为马平县治。但一般人都习惯将马平县呼为柳州；甚至连机关团体来往函电和报刊，也多将马平县称为柳州县。结果，造成了不少混乱。为此，马平县政府不得不于民国十九年冬向广西省政府反映，建议将马平县改称柳州县。理由是“马平原为柳州府之首县，自府制废后，县中各机关法团仍多袭用柳州（这一称谓），且该地本当柳（星）之分野。昔柳宗元治柳，德化犹存，邑中山水曾籍柳集而附骥名区。故言马平，人或误会，举柳州则鲜有不知。现值训政时期，名称允宜划一，请予改名柳州以一视听而正名实。”广西省政府根据民意，允马平县政府所请，批准“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一月一日为更改县名日期。”从此，马平县即正式改名为柳州县。

但由于当时广西当局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马平县名之变更，纯属广西自行作主，并未呈报中央核准。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过问此事了。三月十三日，该部以“零零一四六号”文咨广西省政府：“马平县名是否存在？柳州是否习俗沿用名词？请查明见复。”四月

七日，广西省政府以“民字第三十七号”文复内政部，如实告知马平县改名为柳州县之缘由及日期。

次年（1937年）二月二十日，柳州县接广西省政府“洽（十七日）民代电”称：“奉内政部咨文，柳州县名，州县二字同时并用，与全国各县命名通例不符。飭拟新名三个呈候核转。”柳州县政府遂于二月二十日下午三时，召开县务扩大会议讨论拟定新县名。会议由县长杨盟主持，出席者有各方（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公安、民团等）代表梁晓钟、韦遂贤、张一铮、冯异才、郭扬才、康良生、韦育青、周颐、王仁青、马典符、莫家彦、何佩三、石兆芳、王受祺、李惠如、周书、翁云衢、陆广森等十八人。结果拟定①柳江②龙城③潭中三个新县名，由县府加注取名意义，呈省核转。经广西省政府委员会研究，决议选取第一个（柳江）为新县名。并咨请内政部转呈行政院审定。

同年（1937年）九月二十三日，广西省政府以“人字第五〇三一号代（梗）电”通知全省各有关单位：“（衔略）查柳州、龙州两县名称，当经本府委员会决议改为柳江县、龙津县。咨请内政部转呈，经奉行政院核准，并换县印到府。除分别任命杨盟、李天骏继续充任各该县县长，并将印信颁发启用暨另飭知照外，仰各知照，并请查照。省政府主席黄。梗人印。”

资 料 来 源 ；

①《广西省政府公报》第一一八期

②《民国二十年来大事记》

③柳州地区档案局藏全宗号43、目号9、卷号9

④《南宁民国日报》1937年3月3日、4月12日

⑤《第一次全省建设会议汇编》

⑥《创光旬刊》

一起官甚于匪的强抢豪夺案

梁志强

清末，广西出现了一个跨(贵州)省、专门从事木材生意的集团。它是由旅居桂林的广东客商黄汇昌和江西客商汇裕丰店、旅居柳州的广东客商广和祥和仁兴祥店。旅居长安的广东客商广兴昌和广和昌店、旅居贵州古州厅(属黎平府，民国后改为榕江县)的广东客商怡升恒、吴泰祥、启利祥、隆安和等店铺联合组成(总行设于柳州广和祥店)。该集团资金雄厚(共有资金600余万两白银)，在广西龙胜厅(今龙胜县)、全州西延分州(今资源县)、怀远县(今三江县)、融县(今融水、融安县)和贵州古州厅等处自办有山场，每年伐(购)木扎排，顺五排河、桑河、浔河和融江放排至柳州转梧州、广州，垄断了这一带的木材生意，年营业额300余万两白银，出口杉木60余万条。在桂中、桂北商界中首屈一指(仅每年税课一项即达10余万两白银)。为此，招致不少人眼热。

民元(1912年)三月下旬，该店在黔属古州下江厅一带伐大杉木5,000余根，运至孖温扎排，准备放运广州。当准备工作行将就绪时，突有一股匪徒窜扰古州下江一带，众商及伙计闻贼将至，争相弃排遁匿逃命。后贼被闻讯赶来的滇军击退，当地文武即垂涎这批木材，决意侵吞。他们先是遣人

砍断部分木排索缆，让木头顺水漂流，然后在下游逐一收捡。接着由把总肖德润、地方绅士石灿如、潘泽安、林子儒、赵玉亭、肖春和等出面，声称奉古州镇、道及下江厅罗通判之命，将这批“匪木”没收充公发卖。当怡升恒等店商及排伕重返存温，已被拒等卖去锯去大木3,000余条（值银16,000余两）。各商当即据理力争，以每根大木的火烙招牌为凭证，才得回剩余的木头1,000余条。至于被卖去和锯去的大木，肖把总等坚持是匪产，不允退赔。该商等不服，据呈广西军政府，请求当局为民作主，帮追回损失。五月，广西军政府以“所失木排系在黔省下江厅等处，业经据呈咨请贵州都督飭行，该地方官秉公查办在案”函复黄汇昌等店，从此再无下文。

广和祥等店被迫于六月直接上诉国务院，陈述经过，并针对肖把总等所诬之词予以力驳。指出“（本商号）资本雄厚为首屈一指，举国皆知，岂有拥厚资而往穷瘁边疆充当匪徒之理，其谁信之？”“所谓匪木者，岂盗贼由陆而来，乃扛木作军械效揭竿而起耶？大木俱有火烙招牌为凭，岂大股匪徒即木商所用之伙伴筏伕耶？然则伙伴一能化千百身？”接着，一针见血指出，“直是官绅诬商为匪，方能诬商木为匪木也！锯去卖去之木价值一万六千金，是官为匪劫夺商财也！贼来未抢商木，且未锯未卖，今克复后反被官夺之锯之卖之，是官更甚于匪之恶也！此等官匪何得谓为民国世界？直谓之匪世界可也！”最后表明，“商等愤极冤深，一字一血，沥情上叩国务院前”，希望“俯赐电致黔都督，勒令下江文武官绅受用此赃者，如数追赔，以归血本

而避衙困施行。”

国务院于七月分别给贵州、广西军政府发电，责令黔、桂当局查处此事，严惩官匪。然而在封建割据、各自为政、官官相护的年代，此等电令，最终只能是一纸空文！参与分赃者始终没有一个退出分文！一场赤裸裸的强抢豪夺案就这样不了了之，黄汇昌、广和祥等商号无可奈何只好自认倒霉，权当“遇上了豺狼”，白白被咬去一口！

资料来源：

- ①《广西要闻》②《广西公报》第二十四、二十五期③《南风报》第九期④《柳州商会报告》

韩彩凤生平简述

韩少武、韩少芳口述，刘克武整理

韩彩凤字歧山，柳城县上雷乡六码村人，家境贫寒，幼年读过两年私塾，以农为业，兼看鸭鹅，逐年生活有所好转。他兄弟三人，长兄彩龙，二哥彩辉。其本人气量大，颇肯助人，柳城县河东乡人民对他很有信任，处处得人欢迎。

民国元年，他在沈鸿英部任哨官，进驻柳州不久升为管带。民国二年，他随沈前往平乐，他清剿辛亥革命后余匪，使该处得以安居。而后，他回柳州提为统领，进驻柳州一段时间。至民国五年，去沈部调往广东清剿龙济光，攻打任石城，城破，龙济光溃退，奔往海南岛去。

自从打破石城，赶走龙济光后，韩彩凤功居首位（沙埔、上雷也有人随去可证），但沈向上司汇报，说是其子沈荣光之功，竟提拔其子为统领。韩见沈以亲循私，赏罚不明，不久便辞职到南宁，将情况汇报给两广巡阅使陆荣廷，陆劝慰韩继续留在部队工作，并派韩到梧州充任第二司令，适至民国九年冬，陆、沈、韩等部均被广东陈炯明打败，赶出梧州。陈率部属占领广西，陆、沈等部，逼上山区。韩则驻扎龙州、庆远等处。

民国十年间，广西战乱，四处皆匪，军、政混乱不堪，散兵游勇，各立部属，各自为政，彼此争夺地盘，收税

为粮，以维持军需，更有大小股匪，抢家劫舍，耕牛，粮食被劫一空，每日入夜，鸣角求救，彼落此起，匪风厉害、时有所闻，人民痛苦，不言而喻。

民国十三年，陆荣廷倒台，李逃上海，此间广西又有韩、沈两部，互相争夺，彼此伺机吞没。当年秋，韩部原驻在东泉、上雷、沙埔一带，沈则在当年农历一月十三日乘韩不备，开兵至东泉螺田村背，进攻韩部，与韩部副司令吕子荣接战，双方战斗甚为激烈，吕被击毙，韩部属惊恐不战，遂退回上雷。

这时，李宗仁、白崇禧利用联沈攻韩策略，遂出兵向沙塘、凤山两地驻扎，意图接近消灭韩部，在当年（民国十三年）一月十四日李部派出兵来凤山新维村黄花桥与韩部接触，韩部部将邓定邦接战，邓从牛枫村撤退，其后勤部队由凤山镇退出到沙子桥牛栳山前，在新维村附近双方激战更烈，忽接李部通知说：按前商定：联韩倒沈计划，此次行动实属误会，韩部迅即通知邓定邦后撤，李见韩真的后退，其后勤部队又转回凤山街驻防，接着于十八日清晨，李部由凤山出兵绕沙埔大潭小路由古青水尾村涉过河滩，抵达沙埔对河几个高岭即石门山、糍耙岭、鸡公山、狮子山等处占据，企图攻韩，当天（七月十八日）中午，韩将邓定邦在沙埔对河天后宫率兵开出，强攻李部，占岭业已攻下，但人马伤亡不少，遂即向长隆乡属烂村败退，直往大埔而去。事后，韩逃往澳门。其兄韩彩龙在宜山苍战被俘，后在李部行营中服毒自尽，接着沈鸿英亦被打垮逃往香港。

民国十五年，韩彩凤住澳门时，李宗仁、白崇禧致信韩

彩凤劝归，给委予充任广西、三融、柳罗县剿匪保安司令，驻长安（今融安县）任事。三个多月后，他已招募得余明健团长人枪一批，罗城县吴渭斌人枪百余，合并其他人枪共为二千多，后委任韩为独立师师长。至民国22年，又改编为第七军二十一师师长，跟随廖磊驻白色进行剿匪，后转至二十六年时，被调任为中国抗日救国军三十师师长，驻扎全州候命。

民国二十七年，李宗仁又命韩转返柳城县，剿匪招安，驻扎在太平乡，常往匪窝四十八弄招安匪首周老德与其他匪首出来源新，不幸在当年十一月中旬病故。时年六十。

韩彩凤在澳门转回来广西时，在地方上所做的公益事情如下：

1、民国二十二年，起建上雷小学，命名为岐山小学，同时并建上雷街市亭十二间，方便群众集市买卖交易场所。

2、民国二十三年春，他和古木村廖玉廷共同出资，在古木坳山种植杉松林场一个，亩数不明，今归政府所管。

3、民国二十五年，在柳州人民广场，起建红庙一座，即今柳州人民医院现址。

4、民国二十六年他和东泉街张耀廷、黄日高等三人共建东泉武庙一座。

5、民国二十七年，扩建东泉文岩，作当时抗日军用仓库。

覃连芳小传

覃连芳，（1894-1959）字武德。生于马平县四都金陵村（今柳江县百朋乡琴屯村金陵屯）。父奎元，为前清秀才，有妻三房，共生七子三女。覃连芳行四。幼读私塾。后考入马平县马邑两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入蔡锷主办的桂林陆军小学。继而升入武汉湖北陆军中学。辛亥革命爆发，曾参加新军与清兵作战。以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骑科。毕业后到南宁讲武堂任见习教官、分队长、区队长、中队长。以后调任广西省防军连长、营长、纵队司令。民国10年，投入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部任统领，随军驻广州。因他三哥覃连升在靖国军总司令沈鸿英部任职，刘震寰疑他是通敌，曾将他扣押。获释后，他投靠李宗仁，被委为营长，纵队司令。驻三江县时，曾在老堡口诱捕大批“土匪”，就地枪决。他父亲曾因此写信告诫他。他事父母孝顺，从此抓获“土匪”都交地方官处理，不再滥杀。

民国15年，广西出师北伐，覃连芳任第七军军部通讯大队长（营级，辖三个连）。同年9月，第七军在江西德安与军阀孙传芳部激战，第九团团长阵亡，他被派接任团长。不久，第七军改编，他升任副师长。因与新桂系头子白崇禧不合，受到排挤，民国16年遂申请公费留学法国，进入央里诺斯航空学校机械班学习。学成回国，任广西护党救国军教导团团长。民国19年，为新桂系阻击蒋介石军朱绍良、毛炳文

部入桂有功，升任少将教导师师长（驻柳州）。同年12月，他率部在柳州北部长安镇阻击红七军攻城。后调任陆军第一方面军第七军二十四师师长。民国20年驻柳州期间，兼任柳州建设处处长，曾主持开辟了柳州城内由西大路起，连接庆云路，直通东大路，贯穿城外东台路的大马路，还扩宽柳侯公园，建筑公园头门，修整罗池，重修柳侯墓等，又修立鱼峰南面上山石级直至山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与二十四师官兵要求出师抗日，蒋介石命令他率部开赴黑龙江协助马占山打游击。因李宗仁、白崇禧不准他带走枪支弹药，部队开到全州被迫折回。

民国23年冬，覃连芳率领二十四师尾追长征红军入贵州境内，纵容官兵抢购烟土，带回广西高价出售。民国25年，他因与军长廖磊搞僵关系，辞师长职。因曾留学法国，被委为广西全边对汛督办处督办，驻节龙州。

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覃连芳被李宗仁委为三十一军副军长，兼一三一师师长。9月随师北上抗日。12月中旬，他奉命参加苏北明光一线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西进，作战勇猛。1938年4月，他率部参加“徐州突围”，被派首先行动，以两个师的兵力突破涡河日军封锁，为整个突围部队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后他的部队与长官部失去联系。进入安徽后，粮饷没有接济，他就放任官兵掳掠，使当地人民蒙受灾难。同年6月，他因“徐州突围”有功，升任八十四军军长，属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在湖北应城一带打游击。

民国27年10月，武汉失守后，覃连芳率部突围到随县。

次年4月，他率部参加“随（县）、枣（阳）会战”，在襄阳、花园公路东段，重创西犯日军，迟滞敌军西进，掩护五战区完成包围部署。后因自恃有功，又与上司李品仙不合，被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李宗仁念他对桂系有功，仅将他免职，派他任五战区中将高参。他愤不就任，奔向重庆。李宗仁派人乘专车追他，他也不回头，还骂李宗仁负义。他到重庆后，胡宗南曾邀他出任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因受白崇禧警告，不敢出任。后来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又曾到中央训练团任过两期大队长。

民国30年6月，覃连芳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五巡察团主任委员。他原是实授中将，因团员中有五名现职上将，为方便领导，蒋介石特准他挂上将衔。后因大刀阔斧处置蒋帮嫡系将领（因此曾被蒋帮嫡系称为“南方白狼”），被蒋帮军政要人群起攻击，蒋介石又以“滥用权力”的罪名，将他撤职，并通报全国，永不录用。

覃连芳被撤职后，不久就回柳州开设“芳记”和“英记”两个锯木厂，在私宅“芳园”接待亲朋故旧，连越南的胡志明、阮海臣都曾做过“芳园”的宾客，在家乡柳江县金陵村，他还有田园和大水碾，也常回水碾居住。他不甘心隐居，曾写感怀诗云：“蛰居静待春雷动，会化鱼龙上天去”。

民国36年，覃连芳以广西机械工会名誉理事长身份，当选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次年3月，他到南京出席国民代表大会。从此结识中国民主社会党头目张君勱。对该党的政治纲领感到兴趣。同年秋，他在柳州庆远一带与广西省保安副司令

张任民竞选立法委员。因得不到国民党中央以及广西官方的支持，终于失败。这年冬天，在表姐李荫青劝说下他退出国民党，加入民社党，任民社党广西省委员会书记长。但无大活动。民国38年，广西省政府编印的《广西概况简编》曾称他为：“失意份子，但对军政界尚为有力份子。”

民国38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飞回桂林。覃连芳曾到桂林谒见，但遭到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冷语奚落，扫兴而归。5月，他的好友密报，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密谋要对他采取行动。第二天就匆忙带着四妾钟文英及钟所生之幼女乘飞机飞广州，要转赴香港。到广州当天，他往谒李宗仁。李要他留下一起干。他说他有病需要治疗，次日就买船票去香港。到香港后，住在弥敦道洗衣街一八一号，先与人合股开南国酒家，后来又自买一辆汽车做生意。

1959年，覃连芳老死在香港。临终前，殷殷嘱咐家人，一定要将他的骸骨送回家乡金陵村。1982年，其女覃赤丹遵遗嘱将骨灰送回柳江县百朋乡金陵屯安葬，受到当地县、乡、村领导及亲友的热情接待。（注：覃连芳生于甲午年十二月初三，换算公元为1894年；死于戊戌年十二月十六，换算公元为1959年。）

（柳江县志办供稿）

熊囊龙其人其事

罗怡林

熊囊龙（1895——1977），壮族，马平县（1931年改柳州县）二都金磊村人，十二岁到柳州读书，后在南京金陵大学农学系毕业，应著名华侨陈嘉庚之请，到福建厦门集美中学任校长。三年后回广西大学任讲师，六年后由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保送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系学习，毕业后获农学博士学位，仍回广西大学任教，并升任教授，兼任广西省政府农业顾问。1947年任广西省政府建设厅农业处处长。

1948年，熊囊龙当选为柳州唯一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到南京参加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出力，此时，他不仅闻名柳州，也可算是广西的红人了。在此以前他的一生，可说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了。然而，自此以后到解放前的一段时期的坎坷遭遇却很少人知道。

南京竞选结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熊囊龙得到李宗仁赠送的金条一条，自南京返回广西，不知什么原因，他与当时的广西权贵有矛盾，又不愿拿钱出来消弭，以致被列为贪污案的被告。

1949年3月14日，桂林地院刑庭开庭调查，传讯熊囊龙贪污案被告熊囊龙，由推事李江原在庭审讯，历时一小时许，因系调查庭，内容未公开发表。这是当时广西权贵

对熊襄龙开炮的先声。

1949年5月20日，熊襄龙被桂林地院刑庭公开审判，庭长苏璧，检察警陈永烈出席，被告前任本省农林处处长熊襄龙、前该处技佐甘桂华及被告律师邹文蔚、赵微麟等均出庭，到席旁听者达五十余人。

陈检察官略称：“本案熊襄龙等所犯罪之事实约有三点：

一、熊襄龙利用职权将柳州办事处各农场所领之救济物资入其私人所开设之马麓山农场；

二、熊襄龙囑甘桂华在柳州办事处公款项下挪移一千万元，购买黄糖营利；

三、甘桂华为农林处技佐，而熊襄龙让其在马麓山农场工作。”

庭长苏璧问熊及甘有无辩论，熊襄龙声称：

“一、起诉书所列者均无事实检据；

二、本案之告发人姓名无知，此种情影请庭上主持公道。”

辩护律师邹文蔚声称：“熊襄龙曾受高等教育，且任简任职务，平日并无贪污之劣迹，就检察官诉书中所列举之三点一一辩护，并列举省府及各农场复文并认为事实存在，请庭上宜判无罪。”

两周后，桂林地院刑庭庭长苏璧、推事李江原等出庭，传被告熊襄龙、甘桂华后，即由书记官黎广华宣读判决书：

“熊襄龙共同连续对主管或监督之事务，直接或间接图

利及预备侵占公有财物，处以有期徒刑四年，褫夺公权四年，甘桂华公共连续对主管或监督之事务图利，处以有期徒刑四年，褫夺公权四年。”

宣判后，襄、甘二人称当申请复判。

事后，办理该案检察官陈永烈说，他尚未接到判决书，不知所以减刑之理由如何，如接到判决书后，见理由不充足时，当依法申请上诉。

据熊襄龙的外甥廖某说，熊到南京参加“国大”选举后返回桂林，当时广西权贵要他拿出三百两黄金，他不肯给而引起此贪污案。到被判刑后，不得不拿出几十两黄金，保释在外。这时，人民解放军已渡长江，战事逼近广西边境，人心惶惶，熊襄龙乘机只身逃往香港也无人过问了。以后不久，他的妻子儿女才接着去香港。他在香港一个中学任校长，他的侄儿熊天保跟着他当总务。任校长时间不很久，全家移居马来西亚，最后到新加坡定居。

熊襄龙走得匆忙，在桂林、柳州的房屋契约都遗失了，想申请退回也无根据。今柳州中国银行的旧址就是他原有的房屋。

他还有一个女儿因已出嫁，没有跟去。“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甘肃兰州工作。

1977年，熊襄龙病逝于新加坡。

写于1988年11月28日

通讯处：柳北区政协文史组罗怡林

当年柳州名士阚德轩

董成熙

名闻龙城的阚德轩老先生，在抗战进入艰苦的阶段——四十年代初期，被地方人士选举为柳江县参议会议长，作为他的助手，我任副议长。在和阚老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深受教育和感染。虽事隔半个世纪，但他那修长的身材，慈祥的目光，和蔼的面庞，谈笑风生的形象，还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

阚老出身书香门第。年幼时，爱好琴棋书画，通晓诗词歌赋。清末，曾获拔贡功名，转民国，他专攻法律。民国初年，阚老深得两广总督陆荣廷器重，历任军法处长，广西审判厅厅长。民国八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任大理院院长。虽身居要职，而为政清廉，秉公执法，从未添置私有财产。后因时局动乱，陈炯明背叛孙先生，孙先生不得已暂时退居上海，阚老也寄居沪上。因受刺激过度，精神失常，幸得邓元义士，全力照顾，才化险为夷。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看破红尘，奔赴四川峨嵋山，加入道教，修心养性，念念不忘芸芸众生，以行善为他终身信念。

时局稍为平静，他回到南宁，被推为广西同善社社长，家中设有佛堂，所有同善社道友，集中念经，听他宣道。民

国十九年，蒋桂战争，他任中国红十字会广西分会南宁妇孺救济会会长。当时滇军围城，鏖战数月，这是新桂系历史上有名的黑豆节。两军死伤狼籍，断手断脚，触目惊心，闾老本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伤残者，能回家的发给路费。事隔一二十年，还有当年受恩者不断写来感激信。抗战前夕，他回老家柳州，又被推为柳州同善社社长，道友们常集中在寿板街（现小南路街委会）孔家听他讲道。

闾老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据刘雄先生回忆：“他虽系科举出身，但其言行并无半点学究气派，抗日战争第二年，莫林记报局驻柳负责人莫贵朋，出资创办一小报，请求闾老命名，他执笔直书“立鱼峰”三字为报头，并亲任该报总编。”除此之外，闾老对戏剧也有兴趣和研究。年轻时，曾登台演过反串；1937—1938年，他到桂林同马君武、欧阳倩予从事桂剧改良工作。他编过《绿珠坠楼》、《黛玉葬花》、《梁红玉》、《木兰从军》等剧，其中由小金凤在桂林主演，小飞燕在柳州主演的《木兰从军》，激发了广大观众的爱国热忱，抗日情绪高涨，获得社会人士的好评，曾以“旧瓶装新酒”为题，登在《柳州日报》上面，赞誉改良戏剧，成功和对青年艺人的培养。后来小飞燕因婚姻不能自主，走上了绝路！闾老十分惋惜，做了一副挽联去悼唁：上联是“廿八年艺苑生涯，歌舞场中，相信洁来还洁去”；下联：“五十两黄金有价，污浊尘世，可怜求死不求生”。

柳宗元开化柳州，每逢清明节，柳州的文官和教育界人士，均往祭祀。闾老在柳州期间，不但去参加祀祭，而且在1947年写下了一首祭柳歌词（沈音谱曲），由教育局转发各

中小学教唱。歌词是：“嗟嗟吾侯，远谪柳州。福我寿民，惠泽州流。植柑亭畔，种柳江头。柳水鹅山，炳耀遐州。”

闾老与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为北京政法大学同学。解放后，沈曾约闾进京参政，但，闾已年逾古稀，足疾缠身，未能远行。柳州市人代会获悉，聘闾为特邀人民代表。

闾老的家庭教育，颇有独到之处。他要求弟男子侄做到“自强不息，勤俭持家”八个大字，并以此来鞭策自己。自幼跟随在他身边、给他抚养成人的胞侄闾维雍，在他教养和鼓励之下，在抗战中，为国捐躯，成为抗战烈士。现住中国民主同盟柳州盟市委副主委闾维端（曾任柳州畜牧兽医学校副校长、副教授）是他的次子；现任地区水利勘测设计院院长的闾维陶（高级工程师）是他三子。他们曾多次向我问及其先父生前的情况，特撰此文以示怀念。

清末、民国时期 柳州书画界简况

谢贤修

晚清之世，柳州文人享誉海内者，首推王拯。王原名锡振，字定甫，号少鹤。道光二十一年进士，以户部主事屡充军机章京。咸丰中随同各王公大臣赴天津等地办理巡防事务，官至通政司通政使。拯工古文，为清末桐城派名作家，其文典雅凝炼而有清新之格，无桐城末流之弊。著有《渝斋文钞》十二卷，《龙壁山房诗集》十六卷，《茂陵秋雨词》四卷，与其书画，并传于世。

王拯书法颜体，学颜鲁公《争座位》帖，正草书皆沉着雄厚，且其襟怀磊落，自有造詣，书法特具神韵，鱼峰冠山亭旧有王书匾额及楹联一副，联云：“坐收天马西来势，重踏金鳌顶上行”。抗战时惜毁于火。其画工山水，师法元人黄公望、倪雲林，笔墨苍简清润，行笔飘逸，极少渲染，而恬淡有致，现柳州博物馆藏有其书画。

王卒于光绪二年，年六十一岁。

旧日宏丽的东门城楼顶层的檐下，悬有一块青底黑字大匾，书“出乎震”三字，款书“光绪六年”下署“邑贡生秦绳祖书”这种擘窠大字，善书者难工，况“出乎”二字更难

着笔收势，而秦繩祖运用他的功力，把乎字中竖垂露带曲钩写得神入化，三个字如惊龙翔空，神采飞动，为城上高楼增光添彩，观者叹服。秦繩祖字其武，邑拔贡，乃王拯老师之子，与王拯略同时。繩祖之侄秦献廷，幼承家学，世传颜体，亦教书为业，其书法功底甚深，是从勤学苦练而达到有神有势之境。现今董咸熙先生家藏有献廷所书条屏四幅，系书赠董父海澄公的，字迹遒劲潇洒，墨韵传神，堪称佳品。

咸、同年间有举人梁廷辉，住映山街，善书法，教书为业，光绪二十五年，他已八十多岁了，犹登东台山督修宝塔，但其作品已毁于民十七年柳州大火。其子梁渭卿，亦业儒，擅画，长于人物花鸟。柳州大十字街太阳庙有他的大幅壁画《达摩过江图》，大龙潭龙雷观《宝鸭穿莲》壁画也是他画的。这些作品于拆庙时均毁掉。现梁渭卿之孙女梁培均，在新疆省政协工作，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其书法参加新疆安徽等省区展出皆获一等奖。

清同、光年间细柳巷有朱凤仪，邑庠生，号槐堂，雅好兰蕙之十七帖，能在行笔时并用指、腕、肘、肩之力使于笔端，书法简约飞动，昔鱼峰山观音阁有槐堂所书之匾及对联，已毁于火。其嗣名带，字子垣，号柳条道人，亦秀才出身，书法名噪一时，山水初学王时敏，再学元人黄公望、墨竹学文与可，书法王献之。并皆佳妙。书画豪放宕逸，所书柳侯公园柑香亭大匾及对联，被誉为“南天一杰”，惜拆亭时弄失，龙家祠之匾联亦为其手迹。其蝇头细楷并皆佳妙，得者宝之。

曾获清末最后一次科举——光绪二十九年拔贡的 胡比

照，字汉舟，书法与朱子垣齐名，住映山街。民国初曾任兴安、横县知事及局长等职，其人学识渊博，书法神逸奇纵，亦从十七帖入手，胡在临帖之前，默读数回，心领之余，下笔有神，所谓驱情使笔，俾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渗情入法，以创立自己独特风格。胡与朱书法妙处，在于字有神韵，他曾说过，“书贵有神”，笔者也亲自见过胡氏所书屏条，苍劲淋漓，神韵均足，观之使人情随字移，堪称妙品，卒于三十年代初，书法传世不多。

严正衡，字秉钧，号同谱，清拔贡，住西门花门墩，书法端庄，有静穆之气。法赵孟頫，光绪年间为西门城楼书一木刻大匾《丽泽兑》悬于城楼正向西门大街，与东门之《出乎震》皆为《周易》《说卦》指方位之词，又柳侯公园罗池上旧日建有《落镜亭》亦称水波凉亭，乃陆荣廷所建，勒石纪其事，碑即严公所书，今毁，严曾书一联赠笔者之祖父，惜已散失。

在晚清科举人物中，有副榜莫汝封，号樾楼，其子举人莫伯璜，皆善书，俱业儒，旧更新亭及莫家祠等处有题书匾对，今已难寻。

谷埠街有周京尚，号春台，邑生员，教书为业，民国初年任县劝学所长，后随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为秘书，书法颜体，圆润苍厚，亦具风格。

塘头村朱卓峰，亦邑秀才，其人聪明雅静，宣统年间，开办河南小学，校址择谷埠码头东边北帝庙内，朱任第一任校长，喜书《正气歌》，拉堡双桥等乡人皆仰慕其名。

莫萍舟，住莫家祠，善行书，师承赵孟頫，笔墨灵活，

秀劲有致，气韵淋漓，旧日公园中思柳轩及船厅等处的对联横额，如“四时佳兴与人同”“此地有名山作主，令人想刺史当年”等，皆其手笔也。

周煥章，住黄竹巷，宅院颇广，称望族，辛亥革命时，柳州同盟会员起义推翻清道台及知府等官，夺取了政权，成立“右江国民军总机关”，周煥章任秘书长，其人精于书画，尤擅钟鼎文，在柳州堪称独步一时。钟鼎文较甲骨文粗，线条不是直来直去，而以象形取胜，后来又发现石鼓文，石鼓文即籀文，原为大篆，字仅数百，非有深厚书底不能作也。周煥章所书之钟鼎文，多书屏条，得者珍藏之。亦善画梅兰竹菊，以水墨胜，但不多作。周曾任公园管理主任，对园林培植规划，建树颇多，今柳侯祠所存《剑铭碑》，世传原碑失落，或云已在巴黎，或云民十七年大火所毁。周以拓片重刻，得将原迹保存，今公园入门处两排桂花树，浓阴匝地，花时香飘远近，亦周煥章手植也。

龙怀枢，字鉴平，世居东门，潜心柳体，字法端庄严谨，尤工小楷，喜书中小楷条幅，民国初年任过柳州统税局长，更新亭上有他所书《冠冕龙城》石额。其子龙孝坚，书学魏碑，参以柳骨，端庄秀雅，亦为时人所重。

关铁舁，前清举人，住龙角街，讲学训徒。其子关伯安，父子俱以书法闻于时，书重汉魏风格，苍老挺秀，为邑中有数之魏体书家。

阙宗驥，字德轩，前清末科拔贡，民国初年任广西高等审判厅长，后任西南大理院长。家住中山东路，诗、书皆妙，书法淳朴端厚，多书匾额，桂柳一带，尚有手迹流传。

郑承典，字兰荪，清庠生，书香门第，曾任县长及广西边防督办等职，善画墨竹，亦工花卉，清新雅丽，书法亦潇洒纵逸，俱为时人推崇。

朱奇元，清生员，曾任马平、迁江等县知事，书法亦有名，笔力雄厚，有坚凝风格，工花鸟，所绘花鸟扇面，清新妍丽，惟不多见。

熊少愚，辛亥革命时之同盟会员，对古文词甚有研究，尤邃于易经，书法以小楷为佳，多书手卷，端妍简静，自具风姿。

赵思雨，字春轩，聪颖好学，从事教育工作，曾代其父入匪窟为人质。为人风度潇洒，嗜酒，待草兼善，笔姿豪放，有宕逸神韵，自出一格，惜中年已逝，笔者曾获册页数幅，今已佚焉无存。

覃连芳，柳州人皆知其名，覃好书，法康南海，康书特点为“重、大、拙”，以刚雄之气势夺人，独树一帜，覃武德专心以学，甚有造诣，亦具刚劲拙厚之意，柳侯公园曾有覃所书碑额数处，如“罗池”，“罗池胜迹”等。

张启芳，家住北门大街，好学，笔不离手，其行书功力甚深，浑厚淳朴，时人重之。

柯传滨，字起渭，家中山东路，从事教育及军政界工作，书法柳体，端庄刚健。

张汉文，天津人，民二十年间来柳创办中华书局柳州分局，张任经理，其书法宗自汉隶，敦朴古拙，天性流露，自具逸趣。昔柳州书画界朱午迟及何如坚等曾到张府作客，据张自述学书用功四十年如一日，除舟车病卧之外，无日不作

书。所长汉隶，功底很深。何如坚曾获得张书赠之四条屏，乃奖何应题作画得第一名之赠品。但此书已于文革时损失。但盛德堂先生昔与张汉文为同业至交，今仍藏有张汉文所书条幅数件，解放后张返天津病逝。

咸益书局经理李懋，亦与张汉文同以书法称著于时。

翁振翼，字云衢，原居中山东路，广西法政学堂毕业，从事教育工作，抗战后充任律师，为人慷慨，书学《石门颂》。翁以《石门颂》为主，兼习魏晋，故其书体不拘一格，数体皆精，且浑朴高雅，有奇拙之致，其手迹流传亦多。

周贞白与周道农，二人为伯季，贞白居长，道农行三，俱为柳州著名画家，贞白为杭州西泠画社成员。居罗池路周家祠内。贞白擅二笔山水人物走兽，道农擅花卉，尤工枇杷。贞自称清白道人，民国初年任广东造币厂厂长。后宦游苏杭各地，民国十年以后，兄弟皆崇尚道教，改着道装，椎髻明服，宽袍大袖，飘飘然有神仙之慨。民国十五年率子女回柳定居，笔者当时就读于周家祠书塾，因与道农之子绳祖相善。道人之画，师承董源、郭熙，下及明代唐寅、实父、清代沈铨、麓台诸家，风格古雅，纤细缜密。渲染细微，人物鸟兽、形象逼真，所绘人物仕女，金刚罗汉，及啸虎鸣鹤诸画，形态活泼，傅色典雅，落笔细而不膩，工而不板，山水多清新秀丽之意境，无世俗味。道农所画之枇杷，枝叶苍翠，果实逼真，见者喜之。朱午退说道农的枇杷虽传神，但过于工细，是“做画”，此说不免偏见。盖工笔画多用皴擦之功，笔用侧锋，以干、湿、浓、淡、飞白等多种笔调变化来表现山石树木纹理和折皱。笔墨要匀，水分要少，用墨用色重复

致不单调而有韵味，且有厚重之感。道农的枇杷使人看起来仿佛是一束真的枇杷，就是有厚重感的效果。其实周氏二公亦画大幅水墨山水，昔周家祠堂前有大照壁，周贞白在壁上画大幅水墨山水，峰峦雋秀，烟树隐约，洵是佳作。三十年代西泠画社来柳开画展，曾将周氏之作携至各省展出，其画亦多售出外地。画家蒋国镇曾见贞白题墨梅一幅“一圈一圈又一圈，千圈圈出万万圈。老树无极生太极。得来天上寄神生”并云此画现已流传至美国。如今在柳已难见贞白遗作，闻广西博物馆于六十年代购藏数幅。市博物馆亦藏有道农之画，其家原有历代书画及周氏遗作四箱，连同周氏宗谱于文革时被抄洗一空，下落不明。清白道人晚年息影杭州西湖，解放后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年且九十，卒于杭，其墓今在西湖。道农年八十余，终于柳，有子绳祖，亦长于山水，卒年五十余。贞白有女名周安，号金城女史，居桂林，亦承家学，长于山水花鸟，闻贞白在西湖售扇面画，人士争购，应接不暇，多倩其女代笔云。

张席卿，住龙角街，向任文职，书画皆精，花鸟山水俱长，笔姿简炼，意境清新，有华岩之致，此公多才、善音乐文场，唱青衣，能操扬琴，以琴棋书画自娱。

肖劲华，湖南祁阳人，民国二十九年接朱瑞元之后任柳江县长，至三十三年离任，调省府参议，后任省保部组训处长。其人雅好书法师承《颜真卿麻姑坛》并学王右军《洛神赋》笔势遒劲，豪放泼辣，奕奕有神。当时州人多请其书写招牌及庐室别墅匾额，擅名一时。

朱午迟，原籍柳城县凤山，民国十三年左右移家柳州市

亦是柳州人，先居东门，后居驾鹤山脚构庐，曰“午迟山房”，此人多才多艺，字学汉魏碑体，粗朴且豪放，有独创精神。并善写空心标语字，山水以小幅见长。所作“九头山”山水一幅，曾选送北京全国画展。又善画水墨牡丹，独步一时。对桂剧饶有兴致，前培新路曲园大戏院，乃其设计构筑，卒年七十。

敖起棠，百寿县人，抗战时曾在桂林从徐悲鸿习画，后在柳任教，画花鸟师承张书旂，造形超脱，其创作着眼于写情、写意、写神。绘鸛哥栩栩如生，其画亦参加全国美展，此山水画现为何一帆收藏。

抗战之前，广西局势有数年尚称承平，陆续有人来柳举行画展。最盛大的西泠画社展出。数辆汽车满载全国名家作品，运至龙城中学礼堂张挂，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近代大师如张大千、黄宾虹、傅抱石、齐白石，潘天寿诸家名作，及海内书画家精品，先后陈列，给柳州人士大开眼界，观摩者流连忘返，各画标价出售，任凭选购。如汪亚塵的金鱼，画鱼一尾定价银洋一元，购者亦众。一幅画最贵也不过大洋二、三十元，机会难遇。所以这次展出轰动柳州各界人士。周贞白身着白麻布道袍，几乎每天到场应酬。

嗣后陆续有外地画家来柳举办画展，如杜其章、陆苍夫……等，详情就记忆不清了。柳州画坛活跃，个人或联合展出作品的颇多，如：

欧阳华宗，任柳税捐稽征局长，以花鸟擅长。

沈 樾，桂林人，一九三七年任柳州税捐局长，善画鱼，所绘鱼群如在水中游动，形态活泼，着意渲染水纹，以加

深表现力，使观者有真实之感，是其独到之处。

张芳亭，住李子园，长于山水，法元人倪、黄，笔墨醇厚、勾勒皴染，秀逸古拙。

曹墨侶，抗战时流离柳州，金石书画皆精。长于山水，笔法老练，设色古雅，传统技法功力甚深。亦擅长梅花，书法亦佳，以行草胜，后移居南宁。

抗战期中，文艺工作者多集中桂林，画家来柳展出亦众。笔者当时在桂林从岭南艺苑周千秋先生习画，因而深知岭南派大师赵少昂来柳画展，据说赵之展出很成功，给柳州画界增加动力，吸引各方人士前往参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及柳州军政首要，都亲临观看赵的作品。赵的山水不用传统皴法，而是用墨用色时线条留向的方法，较之用笔墨皴染更显气势磅礴，立体表现力更强，观者认为前所未见，赵在柳展出后赴重庆。嗣后周千秋偕夫人梁灿英来柳画展，周为岭南派花鸟鱼虫专家，功力深厚，下笔灵活，章法新颖，精于用色，所绘金鱼、鲤鱼、孔雀、花卉等，跃然纸上，具备形质美、性情美、神采美之感受。抗战胜利后，周夫妇已赴美办学。

抗战胜利后，柳州经济文化教育逐渐恢复，画家来柳工作亦多，画坛颇形活跃，较著者如：

钟其华，柳州人，世居东门，少年时负笈沪杭美专，精工花鸟，淡雅自然，有华岩之风，晚年以画红棉称著。

龙敬功，桂林画家龙月庐之子，耳聋且哑，山水极有造诣。其画直超乃父，上承元代四大家，山水画登堂入室，书法亦佳，亦善作诗，文革中被斗死。

李漫涛，柳州人，精于山水，皴法灵活，敷色典雅，下

笔随意赋形，所谓墨具五色，笔有生活。曾画棉花并题诗云：

“人画我也画，人笑我不怕，人画梅兰竹，我要画棉花。”

何如坚，柳州人，现仍健在之老画家，精于花鸟，兼作山水，其桃花鳊鱼图立轴，罗池艺苑评选第一名，曾被评为广西民间艺人最优秀作品，此画为黄国仁收藏。

曾亚中，柳州中学职员，擅指头画，花鸟鱼虫，墨韵潇洒，意趣盎然。

陶尊五，原中渡人，来柳任教，书画皆佳，花鸟山水兼长，运笔自然，设色淡雅，书法尤擅名一时。

邓俊群，原在桂林美专任教，来柳亦任教师，以花鸟专长，所作梅花、墨竹、葡萄等，擅名一时。

符少孟，以篆刻著称，广州美院毕业，从事商业广告商标设计，亦兼习国画，光复时来柳开业家私设计，为美术研究所工艺师，篆刻艺术之行家里手，刀法流畅，构思精巧，线条凝重而浑穆，且有空间感，每件作品，皆以严谨处之，且乐意为书画界服务，得者宝焉。

尚有来柳画家胡素石、陆田、余之、陈华、周志清（女）、本市书法家如叶中语，罗沛霖、熊公白等亦活跃于艺坛，各有造诣。

一九四九年，在柳的诗人画家发起成立“罗池艺苑，”地点附设在中山东路旧红十字会内，恭推郑兰生、阚德轩、周道农为艺苑顾问，朱午迟、敖起絮、何如坚、邓俊群、关伯安、曾亚中、刘光汉、陈墨等为理监事。朱午迟、邓俊群为理事长，何如坚为理财。另有会员曾冰涵、欧阳藩、龙启凤、梁镇海、陶尊五、叶倡梅等。联书画诗钟为一体，共约三

十余人。每人每月交会费民银毫二角，由评选小组郑兰生、周道农等出花鸟山水画题，多是以唐诗一句为题，一星期后展出作品，书画琳琅，互相观摩，评选出第一、二、三名，次日在柳州日报发表，并给奖励。另一项活动搞诗钟，当时爱好者参加颇多，推举阙德轩、郑兰生、骆一樵、朱午迟、周汝为、欧阳藩、龙起凤、陈雨甘、刘本等为评师，每比收投稿费银毫五分。每周放榜一次，取录二、三十人不定。最优的列为：冠、亚、殿军，后又增设参军，获奖从优，其余榜中获取者，得回稿费，主办诗钟事务者为罗修五先生。

诗钟题目，以旧体诗由艺苑出句首召对，以后按古格调式如“鹤顶、燕颌、鸳鸯、蜂腰、雁足、魁星点斗、碎锦、笼纱……”等。诸格调由各造就七言对句，每次放榜，民声晚报均在报上发表，在接近解放前，每期都须经过柳州警备司令部审核，甚至删除内容，因此投稿者就由盛而衰了。

现在，市政协尚存罗池艺苑理事照片，过去的《中国美术年鉴》保留有艺苑理监事会的名单。

由清末迄民国，柳州的裱画店，以组云斋最老，此后有莲香斋、李芳华等店，裱画亦兼售画，画家可委托画店出售。而裱画店标明“苏裱”，用料、款式，方法与苏杭相同，但业务不十分兴盛，因而裱画店纸扎也一并兼营，为迷信服务，承扎各式灯笼，遇上中秋和春节、三月三花炮节等扎出各式灯笼，彩花炮屏、台阁故事、狮子龙灯等，争奇斗艳，还专门有一些民间画师，在台阁炮屏及纱灯上绘出山水、人物花鸟，还有整套故事，如“群英会”“花木兰”“穆桂英招亲”“甘露寺”等等，游街时万人空巷，鼓乐喧天，彩灯

照耀，十分热闹。

另有少数民间画师，专门为纸料店绘喜庆对联。清末及民国初年，民间有嫁娶寿辰喜事，亲友皆送喜联，这些对联先用金粉，银粉或彩色粉绘上龙、凤、花瓶等吉祥事物，再用墨书联语，悬挂时有一番热烈祝贺的气氛，也具纪念价值，有些人家婚庆过后很久仍在中堂悬挂这些屏联，民国二十年后，逐渐用玻璃镜画代替，嗣后就蔚然成风了。

以上所述，皆解放前情况，笔者愚鲁，且过去多在外地谋生，遗漏或不实之处仍多，祈请关心文史同志，赐予指正。

争取秦镇等人投诚的情况

高天骥述稿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柳州市获得解放。为了维护城市的治安和支援前线，在军管会 and 市人民政府 未成立之前，地下党城工委征得驻柳部队的同意，于同月二十九日成立了柳州市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我被任命为主任委员。就任后，我写信给躲藏在里雍、运江一带的国民党柳州警备司令秦镇（秦镇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半夜弃城逃跑到乡下的），向他宣传我党的政策，晓以大义，鼓励他弃暗投明。走投无路、四面楚歌的秦镇接受了我的劝告，于十二月五日带着十多个随从和枪支向解放军投诚。十二月十二日，柳州市军管会成立，十九日，市人民政府对外公开，治安委员会宣告结束。我被任命为副市长和柳州专区改编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栗在山政委和魏伯市长，当时柳州市属柳州专区管辖），专署公安处处长周海如为主任秘书。

改编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武装力量进行统战和敌工工作，争取他们向人民政府投诚或接受改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由于我是柳州人，对地方上的人事情况比较熟悉，也有那么一点影响。党组织指示我利用

这个关系和争取秦镇投诚的经验，开展这个工作。

解放初期，一些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隐藏在柳州地区的一些地方。国民党桂绥二支队司令、柳州地区最大的土匪头子林秀山又其胞兄林燕山、雒容县县长王公吾等人，都隐藏在鹿寨，雒容一带待机而动。于是我多次写信给他们，讲清形势和政策，规劝他们从速猛醒，向人民靠拢，做个识时务的俊杰，王公吾和林燕山听从了我的劝告，先后在一九五〇年的一、二月间出来向人民政府投诚（王公吾带了十几个伪自卫队员投诚，林燕山摆脱其兄弟的控制独自出来投诚）。

秦镇投诚后政府安排他在改编委员会当改编委员。一九五〇年一月间，秦镇写了一个报告给我，要求准许他请假去香港与其妻子团聚。当时柳州地区的土匪开始暴乱，我担心他反水，“放虎归山”后果严重。经和周海如研究后，我以治安方面的理由以及他在旅途中的安全没有保障为托词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劝告他安心下来为人民做点好事。过了不久魏伯市长拿着秦镇的报告对我说，秦镇想去香港。我说，他已找过我，我不同意去。魏市长听了笑了笑就走了。大概是春节后的一天，秦镇满腹心事地恳求我，要到我家和我谈话。我想，秦镇一定是为去香港的事想搞点什么名堂。为了防备这一手，我事先通知市人民政府秘书李立民以及沈章平、陈如平等同志，在约秦镇会晤的时间先到我家等候，当秦镇一进门看见客厅里坐满人时，皱着眉头，客套一阵之后，他便拉我离开客厅走进内室。他从口袋里掏出十几根金条放在桌上对我说：“你对我恩重如山，这点薄礼，请你收

下，还请你高抬贵手，成全我到香港与妻子团聚吧！”我预料的事终于发生了。面对着秦镇和这堆黄金，我感到人格受了侮辱。共产党员不是金钱的奴隶，你秦镇看错了对象，打错了算盘。我本想怒斥他一顿，但考虑到统战政策，于是便压下火气大声地朝外面一喊：“喂，大家进来呀！秦镇先生自愿献金条给政府啦！”李立民等闻声入房后，我说：

“我代表市人民政府接受秦镇先生献出的金子，并感谢和表扬他的进步……”接着由李秘书当众清点金子的数量，嘱咐他明天亲自携金子到市政府物资接管科缴交。此刻的秦镇只好笑着讲了一些客气话。事后，我们立即将此事向组织如实汇报。第二天，秦镇到政府交了金子。大概又过了一段时间，魏伯市长根据党的政策和秦镇的具体情况，才批准秦镇出境到香港……。

1974年2月25日于南宁

（刘道文记录）

附录：

《广西日报》1949年12月9日的报道伪柳州警备司令携金投诚

【本报讯】本月五日原敌柳州市警备司令亲自带黄金三十两，投向我军。

《假凤虚凰》引起的一场风波

张正民 蒋霖

1947年11月柳州金门戏院(红星剧场)上映一部《假凤虚凰》影片。这部影片在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大城市上映时,都曾遭到当地理发工人强烈的抗议。当此片将要到达柳州时,金门电影院在浮桥头胜利大厦旁,张贴出的海报广告被理发工人李惠初、窦永源、苏宝球等人几次打跌,同时在影院附近,有苏宝昌、陈椿业、李秀初、太山王等人所率领的一批批理发工人,在街上传播:“如果影院上映这部片子,我们就举行罢工示威游行砸烂影院。”

《假凤虚凰》是部喜剧片,由石挥和李丽华主演。影片的主要内容是由一位技术高超的三号理发师(石挥扮演)在同行友人的怂恿支助下,追求一位漂亮年轻而颇有风度的“小姐”(由李丽华扮演)而展开的。而这位“小姐”其实是一位贵妇人家的佣人,由于年轻漂亮,聪明伶俐深得贵妇妇人的钟爱,执意要帮助她找到一位年轻英俊有钱有势的丈夫,因此,把她打扮成一位“小姐”,一切的挥霍穿戴均由贵妇人负担,男女主角双方都互相隐埋自己身份,可是,在相互交往中,又不知不觉在行动上流露出各人职业上的习惯

动作。如男主角将外衣当成理发的围布搭在腕上；把领巾当成围领毛巾搭肩上；把领带当成烫刀布使用，到“小姐”家作客，看见贵妇人在梳理头发，自己也不自觉的帮上了忙，

“小姐”也同样在行动上暴露出自己是佣人的动作。石挥、李丽华的演技自然而逼真，每当他们暴露渲染自己本能习惯的镜头时，都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过份的渲染的确有一些丑化理发工人形象的镜头。

影片到达柳州，上映期迫近。金门映院的经理（忘记了姓名）着急了，他的海报广告几次被人打落，理发工人在映院周围活动，罢工进行示威游行，还要砸烂映院，经理逼着去请求国民党政府支持调解。负责处理这事件的是两个机构：一个是柳江县府社会科，科长是王继光；另一个是国民党柳江县党部民运股，股长是农超能。这两人发动召集金门映院经理，理发工会理事长林启明、周献禧和妇女会的罗炳炎，在党部会议厅进行初步会谈，商讨调解方案。其结果是：（一）召开有机关、团体以及理发工人和妇女会推选出的代表，参加金门映院首场试映审查，看完影片后马上召集会议，由大家提出哪些是丑化理发工人和妇女的镜头，展开辩论后决定剪去，但不能使整个影片肢离残缺；（二）影片放映时，每场都要送一定的入场券给理发工会及妇女会，进行监督；（三）放映此片的收入，要捐赠一部分给理发工会建造会址。（四）在放映的过程中如有什么意见，即速向两个机构反映，不准闹事，由工会负责向理发工人传达，发现有闹事行为，即以破坏社会治安论处；（五）将处理过程行文上报县府、党部、专署备案。

在这个时候，新经泰美容院的李国强、苏保昌理发店

的苏保球，曾到专员公署找到保安副司令张正民陈述意见，张嘱他俩转告全市理发工人：“政府会妥善处理此事的，希望你们遵守社会秩序，不要将事态扩大！”张并下到县府、党部了解处理过程。

看完首场放映后，专署秘书室主任俞肇傅及各机关、团体、理发工人妇女会等代表均集中在金门映院楼上会议厅进行座谈，提出那些需要剪去的镜头，经过讨论定案后，交由映院执行。第二天将会议决定剪去镜头的影片再行放映，大家认为符合会议决定后定案，以后每天各场放映，都要送入场给券理发工会和妇女会进行监督。

影片放映的第一天，为了防止闹事，柳州保安司令部、警察局、宪兵队派出大批武装和便衣布置在映院内外，映院对面民房楼上的窗口，还安放有两挺机枪，直到放映结束，终未发生事故。

经此一闹，映院一天连续放映数场，场场暴满，连两旁的通道均站满观众，散场和进场观众，秩序井然，映院获得了巨额利润，也如约给予理发工会一笔筹建会址款项，在尚未找及地基时，理事长林启明将这笔款拿去放债，以后在青云路买得地基建造成会址时，林则以映剧院所给的数目结算，未将所得利息一并列入。

瞻仰烈士陵园回顾剿匪斗争

蒋宝礼 段润田

八九年元旦，回到故乡，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故地重游，思绪万千。来到龙潭公园，快步走向陵地，瞻仰最后几排的146师78名烈士，他们来自436、437、438团，师警卫营、师教导队（军干校）。有67人是在剿匪战争中重伤不愈牺牲的。有11人是在艰苦的剿匪战斗中积劳成疾病故的。

走到管在和同志的墓前，使我回忆起50年土匪暴乱的最初岁月，这位28岁的山东籍连指导员，是来沙塘军干校一中队深造的。三月的一个晴天，他和两名战友拉板车去长塘买菜，返回过山坳时突然遭到土匪袭击，管在和同志奋不顾身地和敌人夺枪，两名战士脱险，自己腹部被击中，重伤而故。在陵地上，找不到436团一营营长的陵墓，也看不到三营机炮连火箭炮班战士和其它牺牲战士的陵墓啊！有更多在剿匪战争中当场牺牲的烈士，没有进到烈士陵园。

登山远眺，环视群山，四十年前的剿匪战斗重现眼前，在那崇山峻岭中，有无数老战士的足迹，有他们洒下的血和汗，还有许多烈士们的忠骨英灵。

解放柳州仅仅一个上午，然而，剿匪战争却历时一年半，牺牲负伤的指战员成百上千，他们为柳州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献出了生命和鲜血，四十年后的今天，柳州已成为广西工业的中心，经济繁荣、交通发达，这不就是烈士们为之献身的目的吗？烈士们安息吧！

纪念烈士，怀念战友，庆祝柳州解放四十周年，使我回顾起剿匪战争的片断。

解里雍之围

1950年7月上旬，里雍周围各村土匪暴乱。农会会员被杀，所余百名会员，逃到里雍区公所，据栅死守，二千余土匪包围了里雍，占领三面制高点，炮击墟场引起大火。并不断发动攻势，区政府及百名农会会员危在旦夕，王区长星夜泅水过河，送出情报。

436团三营七连闻讯自柳南赶赴营救。436团二营五、六连奉命自三都出发救援。

1950年7月10日，我和4名军干校学员，由二营通讯员护送三都，追上行动中的二营。次日晚就随部队出发，冒着倾盆大雨，雷鸣电闪，向里雍进发。

七连提前赶到，土匪让开山口，七连未察觉，冒然进镇，土匪依仗人多，重新抢山头，占山口，将七连也包围在镇内，七连指战员怒火万丈，但三面是山，一面是水，土匪居高临下，仰攻不成。三名战士负伤，二名农会会员负伤，只得据守。当夜，七连向山口发起夜间突袭，60炮、掷弹筒一齐轰击制高点。土匪毕竟是乌合之众，一击即溃。

7月13日拂晓，当五、六连赶到时，土匪已逃之夭夭，二营埋怨七连性子太急，否则就可以包饺子，歼灭敌人了。

进剿大瑶山

1950年7月底，五、六连在穿山休整。

1950年8月初，盘据在大瑶山的两千多名土匪，占据了榴江县城（现寨沙），切断了桂柳公路。县府人员依托高大坚固的石砌炮楼，固守待援。436团二营四连机炮连自柳北首先驰援，二营五、六连自穿山经柳州车运鹿寨，冒雨夜进。但土匪已撤回瑶山。

我们二营集结县城，据情报不断出击，但都扑空。每当集市日，土匪又进城捣乱，民匪难分，我军只能固守营门，同志们义愤填膺。

1950年8月中，孙副师长带警卫营三连及电台来榴江，亲率二营剿匪。他先用诱匪攻城之计，匪未就范，后率全营近千余人出城西，折东南，迂回瑶山中部，经两天三夜急行，前卫四连在甲江、长二间咬住敌匪一部，经一上午激战，歼匪三十余人，然匪首林秀山使金蝉脱壳计，率另一部向相反方向脱逃，我们二营沿瑶山山脊，自六段向北追去，越过桂柳公路，直抵驾桥岭东南之黎村南源地区。虽准确扑捉到敌群，但未能完成合围，匪已趁星夜散逃，只俘零星散匪。据俘敌供，林匪并未北上，仍在瑶山中。我军又连夜出发，分四路返回瑶山，沿山脊两侧搜索前进。我所在之六连，自忠良沿瑶山东侧，从北向南搜索前进，在大垌附近搜山时打响，俘敌20人，击毙1人，我右臂下负轻伤。全营进

至罗丹、桂田、长垌、同庚，一线撒网设伏，并以小分队搜索，但土匪藏枪化民，难以区分。此时战士多病，疟疾、拉肚、吐血尤以烂脚者最多。1950年9月底，全营沿瑶山西侧返回，在头排以西沿公路经四排返回榴江县城。

剿匪战争的重要转折

1950年10月后。剿匪战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是志愿军出国，连战告捷；二是毛主席亲临广西部署，由疲于奔命的普遍进剿，转为集中兵力，巩固重点，组织庞大武装工作队村村驻兵，清匪反霸，实行土地改革。并调21兵团支援广西。1951年11月，我抽到工作队，在柳江县乐山、思练、三千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大批受骗青年自新登记，顽匪则无处可藏，向偏远山区逃去。

1950年冬，九万大山、苗山、瑶山及十万大山等，山区顽匪跳了出来，大量集结，整编建制，发袖章，建电台，选空降场，九万大山南北，苗山境内，一片喧哗，然而，土匪此举，恰恰形成我军对其大包围之势。

九万大山前的激战

1950年12月，436团二营长由师侦察科长曲春担任，他是山东人，爱人柳州籍。他果断刚毅。掌握匪情，胸有成竹，行动迅速，因而仗仗打响，每战有获。1950年12月中，率二营自榴江猛扑拉洞，歼匪40余。立即闯入太平、泗顶地区，与顽匪周旋追剿于山岭岩洞，俘敌上百，击毙数十人，我军

伤亡十数人。而后回师柳城，留下伤员、俘虏。

1950年1月初，西进罗城。六连在罗城附近的小堡村，捣毁伪县党部（已挂出牌子），匪首等仓促向九万大山逃去，但其小老婆，坐骑被我军抓获，女扮男装之密探被战士击毙，搜山抓住顽匪均就地处决。六连还在搜索，曲营长已率四、五连飞兵四堡。

次日拂晓，四连尖兵班（四班）接近四堡，敌匪确未得到情报，二十余名戴袖章徒手土匪正在村前沟边洗脸，四班不发一枪猛冲过去，想乘势闯入大院，但匪逃回大门，值班机枪立即封锁大门，四班投弹，大门内外留下6具敌尸。此时，大院两端高大炮楼机枪也已射击，四班三面受击，跳入死角，进退不得。十分危急，前卫排赶到，立即以机枪与两炮楼火力点对射。以缓解四班之危。

曲营长来到，即令五连先抢占各山头制高点，完成包围，四连全力主攻。但地形不利于攻而利于守，大院四角炮楼坚固，构筑巧妙，难于靠近，爆破不成反遭伤亡，敌匪兵器较精，训练有素，射击准确，战有章法，十分顽固。四班进退不得，激战一早晨毫无进展。

正在研究战法之时，四班长示意要机枪掩护，他一跃而起，将外墙炸开一个洞，全班跃入，以爆破和火力，逐屋争夺。营长抓住战机，令四连派一个排增援，从屋下打向炮楼底部，午后大院前两炮楼被炸毁，正面枪声已停，道路敞开，四连全连投入，守敌依托后院两炮楼继续顽抗。并使出新战法，逐屋防守，使四连伤亡急增。曲营长令采用连续爆破，破敌新招，又派五连一个排增强。此时炸药用尽，急派

驭手及坐骑取炸药，11小时往返80公里，送到马死。驭手吐血。攻势从凌晨三时重新开始。第三座炮楼被炸时，另一炮楼上下一片骚乱声，沉闷的手枪响声，后又平静下来，继续顽抗，并点火阻挡我军接近，曲营长将计就计，命令将火引向炮楼，以火攻楼，敌匪一片哭叫，但机枪仍拼命射击，直到枪眼冒出浓烟，炮楼成火楼，火光映红山峦，子弹烧炸如鞭炮，焦臭散发满山谷。

战斗结束，四堡大院一片瓦砾，敌匪300余人已成焦尸。四连伤亡三十余人，其中步兵班正副班长伤亡过半，他们掩埋好9名战友的尸体，绕坟一周，唱着战歌，迎着朝阳，告别东去。

围剿大苗山

1950年冬，大量土匪已集结于大苗山。九万大山前敌匪受我军沉重打击后，也纷纷逃向苗山，1951年1月底，全营集结于融水县。

1951年2月的一个夜晚，全营出发，六连前卫，沿河西进，经四合、西荣直扑元宝。沿途被烧苗寨随处可见，三十、二十散匪不时相遇，但我们均置之不理，只顾强行军，次日傍晚到达，立即发起突然攻击，匪窝一片混乱，死伤遍野，电台、袖章、武器满处乱扔，活着的向元宝山高峰逃去，其晚餐糯米腊肉，热气腾腾，喷香扑鼻，为六连所食用，饱汉追饿鬼，翻越海拔两千米的元宝山，直追到黔桂边界的洞头以北一个深谷，敌匪再也走不动了，躲在深谷中，此时，我军掉队也很多，拉开距离十数里，紧紧追在匪群后边的仅一个排，因而只能扼住山头，全连到达时，天色渐黑，约九点

发现深谷对面山上，火光点点，营长判断是友军，命发信号弹，果然，对方也升起信号弹。再命司号员联络，号声传去，对面传来悠悠号声，司号员立刻报告说：营长，他们是521团。全营上下沸腾，欢呼“会师了”。

深谷下，敌匪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听到号声，更是绝望，上吊开枪自杀不断发生，谷底传出阵阵凄凉的哭声。曲营长又命令组织广西籍战士分别用壮语、客家语、柳州语喊话，少数土匪应声而出，但大部不动。营长又命投降的和战士下谷喊话，他们喊着名，有的是喊亲人，喊得最急切最悲凉的是父亲喊儿子。山谷中一片喊声，很象喊魂，催人泪下，这时，土匪十人八人成批投诚，围困三日，全部解决。投诚中有江苏人。战士们领著这些解放过来的同胞，走出深谷，爬上山顶，正好迎着初升的阳光。

匪首何某逃潜，二营全营以班为单位，展开百里范围，撒网设伏达一月之久，我领六班住甲烈，发动群众，组织搜山。一天早晨，天蒙蒙亮，就有一个苗族老人背着两竹筒在三排防区出现，说是赶集去，引起战士怀疑，经排、连盘问，正是何匪。至此，大苗山的围剿胜利完成。接着是休整、评功。

1951年7月，436团全团凯旋回柳。当月，146师全师离柳州南去。不少土匪自新入伍，仅我班达3名。1955年我再次吐血离队时，自新入伍的战士不少已当班长，其中一名已成为六连事务长。他们纷纷成长为我军基层骨干。

1989·3·28·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柳州文史资料 第六期 纪念柳州解放四十周年

作者 =

页数 = 2 3 4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